

【编者按】 乌斯满在新疆民国史中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20世纪40年代他的政治立场曾有多次变化，最早他组织哈萨克部落武装对抗新疆军阀盛世才。盛世才被调离后，新疆省政府与分裂祖国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作战，乌斯满曾与伊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合流但很快又与之决裂，并站在中国军队一边，参加了保卫北疆领土的“北塔山战役”和外蒙古军队作战。在新疆省军政领袖和平起义后，乌斯满变得无家可归，在逃亡中被抓获，以“大土匪”的罪名在乌鲁木齐被公审枪决。我们许多人从50年代就听说过乌斯满的名字，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反共大土匪”。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价值判断都以意识形态为准绳的时代。在教科书、电影和各类出版物中，土地革命时期的国民党都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抗日战争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是八路军、新四军，而国民党军队在日军面前或是“不抵抗”，或是“一战即溃”，在抗战时期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反共”和破坏抗战。

近些年来，人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视角来重新看待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随着一些历史事实的系统披露，中国民众开始了解国民党军队将士的抗战活动。台儿庄大捷、淞沪抗战、印缅远征军等抗战事迹已经被搬上银幕。人们开始认识到有些国民党军人和地方军阀（如滇军、川军）除了曾经参与“剿共”外，也有英勇抗战、血洒抗日疆场的另外一面。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被迫签下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遍布全国各地的“租界”和治外法权使全体中国人都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屈辱地位。在如此残酷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华民族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党派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之争和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利益，此时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件”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促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正是这一行动赢得了全国各族各界民众的人心，并使延安成为全国爱国热血青年的抗战“圣地”。

这些年来，为了促进台湾海峡两岸政治和解与和平统一，我们对国民党领袖人物和民国军队的抗战事迹做出一些客观评价，取得了非常正面的社会效果。但是，还有一些民国人物的评价仍然处于“有争议”的“禁区”中，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如“反共”、“反苏”、“亲蒋”等标签）和建国初期所做评价的影响。因此，非常需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再审查、再评议，从而努力重新全面和客观地认识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历史作用。乌斯满·斯拉木就是一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价的历史人物。

本期《通讯》介绍了摆男关于乌斯满的专题研究论文，这是作者在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这篇论文既不是简单地否定乌斯满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也不是简单地肯定他，而是超越了“非白即黑”、“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的简单评价定式，系统梳理出三种不同的历史记忆，力图多视角地刻画出这个历史人物。为了撰写这篇论文，作者系统查阅了新疆各类档案资料、回忆录、研究文献，并在北疆阿尔泰等地区的户访中开展了口述史调查，通过大量不同来源的档案史料和访谈信息，努力描述和反映这一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的人生经历。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人生和历史作用时，如何在广泛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努力客观和全面地分析和评价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处于特殊环境中的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今天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乌斯满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他既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共”、“反苏”的一面，也有维护部落权益、反对把北疆阿尔泰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面。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蜜月期”和全面肯定“三区革命”（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氛围中，他必然会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是，我们在北疆的户访中发现今天有许多哈萨克民众依然称他为英雄。

摆男撰写的这篇论文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关乌斯满的资料最丰富的研究成果，希望这篇论文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个变幻复杂和极具争议的哈萨克部落领袖人物，同时相关讨论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民国新疆史。

（马戎）

【论 文】

谁是乌斯满

——关于乌斯满的三种历史记忆

摆 男¹

引 言

“国民党又指使哈萨克族败类乌斯满进攻三区，企图重新奴役三区各族人民。乌斯满本是阿山区富蕴县克烈部的惯匪，1940年曾混入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反抗盛世才的暴动队伍中。1941年暴动失败后，乌斯满率领一批土匪，到处抢劫，杀人放火，无所不为。”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48

“乌斯满，新疆富蕴县人，哈萨克族，曾参加反对盛世才统治的富蕴县牧民暴动。1943年成立‘阿勒泰哈萨克族解放委员会’，袭击省军驻阿山总指挥部，全歼灭约一个团。次年10月任清河“临时革命政府主席”。1945年9月，协同三区民族军攻占阿山地区，被三区政府任命为阿山行政公署专员，授“解放奖章”。省联合政府成立后，任委员兼阿山专员。后与三区分裂，三区撤销其专员职务。新疆解放时，发动武装叛乱，被处决。”

田卫疆、周龙勤，2009：67

“哈萨克英雄乌斯满出现，正是盛氏极权的克星，也是新疆六七年来纷乱的扮演者，自从得苏俄支援后，北疆乱局日益蔓延，影响所及，整个全疆的哈族几为之蠢动。事实上；乌斯满也不过是哈萨克中的草莽英雄，可是为了揭竿制服盛世才，无论他是否是劫马大盗，或是民族领袖，在克里姆林宫讲，获得了以夷制夷，获得了资源掠夺，又是乱于境外，不是乱于苏俄境内的一桩好事。”

张大军，1980：5187

“乌斯满是谁，党已经定论了。但不管他是不是土匪，他都是我的爸爸。儿子给爸爸修个坟，有啥不能的吗？”

访谈个案：0101010555

乌斯满·斯拉木（1899-1951.4），男，哈萨克族，新疆阿勒泰富蕴县库尔特人，哈萨克部族军事首领。1940年2月初，乌斯满参加反对盛世才的阿山暴动，1941年6月参加第二次阿山暴动，后率众游击。1943年12月，他建立“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任主席；1945年9月，任临时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任阿山专员；1946年6月，出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阿山专员；1947年2月，被“三区”撤销省联合政府职务；1947年6月，在中蒙边境北塔山与外蒙古军队发生激战。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乌斯满被蒋介石委任为“新疆反共总司令”。1950年3月发动武装叛乱，1951年在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区被活捉，4月在迪化被公审后执行枪决。

历史研究的魅力体现在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复杂性的认识上，民国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民国人物研究。结合中华民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的历史背景，通过考察历史人物在历史关节点的选择取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近代所经历的具体历史进程，为回溯中国社会的近现代

¹ 作者为回族，出生在新疆，中央民族大学2008级社会学硕士。



发展历程、思考当前历史处境提供借鉴。

本研究通过对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及族群口述史中有关民国时期新疆阿山地区哈萨克族代表人物乌斯满的三种历史记忆的考查，还原“三区革命”（Ili Rebellion）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乌斯满作为哈萨克族部落头人在处理哈萨克族群集团与新疆地方政府势力的关系时、作为新疆本地族群成员在处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处理国家利益与国外势力的关系时，经历的具体过程及社会变迁。试图通过对三种历史记忆地比较与分析，思考历史记忆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互动关系、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内部机制。

一、概念、理论与方法

（一）何谓历史记忆

在社会学研究中，历史是“事件通过能动作用和结构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结构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与跨越广袤时空的制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安东尼·吉登斯，1998：256）。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发现，“文明”社会流传下来的公认的、主流的“历史”知识，一般都曾在一定程度上被处于不同位置关系上的人们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需要再次进行诠释和重构（福柯，1998）；当代民族主义语境下的“传统”和“历史”往往是被发明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2000）。历史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安排的，在任何文化秩序中均被呈现的众多逻辑上的可能性（包括自相矛盾的可能性）里、在体现这些可能性的社会能动者带有私心的众多选择中，历史举步维艰地穿过（萨林斯，2003）。如果说，这些观点从宏观角度对于理解“历史”多样性以及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过程、机制提供了框架的话，那么，历史记忆则是搭建框架的基础。

经典历史学研究是以还原“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为主要宗旨，通过对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进行还原以呈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貌。但由于时间、空间的阻隔，人们终究不可能回到过去、完全还原历史，那些用以记录“历史真实”的文献资料及其产品成为唯一可以值得信赖的“历史”，构成了经典历史研究的基础。

“客观存在”是这些“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最主要原因。事件的客观存在、书写者的客观存在以及保存形式的客观存在，构成了坚实的三角型“历史”模式。人们视这种三角型模式为经典，因为这是最牢固的结构方式。

新的“历史”不断发生，而人们回顾历史时却发现他们经历过的历史与当下的“历史”似乎总有差别。经典的“历史”总是只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历史，人们了解的历史也许并不是“历史”。

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人们在寻找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如果说历史象征着“历史真实”，那么“历史”则意味着身份、立场、需求、观念、方式、角度，甚至是兴趣爱好的不同诉求，她是多元因素交融的共同体，有太多因素影响着她的产生机制与生产过程。那些关于人类社会的叙述往往并不必然和真实的过去相联系，个人或集体的“诠释”会掺杂其中，记载和书写中的“历史”是多样且矛盾的。相对于历史来说，“历史”的记述在人们创造的过程中被附加意义，并最终成为了当代史的一部分（刘昶，1987）。原本代表“历史真实”的文献资料成为大众眼中的“历史”，所谓的“历史”只是历史呈现出的一种记忆形式而已，这也就是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是指历史真实在人类社会中的呈现形式。她可能是经历者或目击者对历史真实的记录和回忆，也可能是历史研究的文本、成果；她的形式包括书籍、家谱、官方档案、戏曲、民谣、诗歌、神话故事等，甚至是照片、海报、电影等现代记录方式。历史记忆的形式、性质等属性是依据不同的社会需求、存在形式与现实意义决定的，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进行多元区分与组合，如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文本记忆与口述记忆。每一种历史记忆只是历

史真实与记忆相撞之后产生的碎片，不能孤立地代表“历史真实”的全部进程；只有通过拼合这些碎片，研究者才有可能有限度地对历史进行还原。

记忆意味着对过去的延续、想象与重构。所以，当人们给“历史”附加了意义之后，人们并不总想去关注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更关心这一切对于当下意味着什么。历史记忆就是这样的一种碎片式社会事实：当历史成为记忆，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二）历史文本与族群记忆

本研究根据存在形式的不同将历史记忆分为历史文本记忆和族群口述记忆两部分。

经典的历史研究是以那些用文字记录保存“历史真实”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在不断记录、保存与创造的过程中，历史记忆得以丰满，使人们对于过去的想象得以丰满。个体与社会无法分割，人们总是立足于当下去构建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过程。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当下”决定了人们会思考出不同的解释、书写出不同的历史文本。尽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历史文本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仍会受到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持同一立场的政治史家、经济史家、社会史家，由于学科方法的差异，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会相异。因此，一篇文本史料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历史真实”的载体，它只是“过去事实”（即历史）中的一部分，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和虚构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文本是在人们的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作用下的社会记忆产物。他既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质，同时又具有个体性质。

在面对历史文本自身的学术困境时，当代学者借助族群记忆分析历史文本（刘阿荣，2006）。历史不仅是由文字记载组成的，也是由人们的记忆、口传构成并得以传承的。代际间的口口相传、族群内部的神话传说都是族群记忆延伸、延续的主要形式。通过对“历史”的口传，族群得以产生同一性的族群意识，加深着对于历史及族群文化的认同。但族群记忆的传承者本身也是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因此，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的回忆与再记述难以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当下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族群记忆的个体性质深受社会历史性质的影响与制约。

在近代国家主义研究的模式下，国家主义“历史”书写模式及相关历史人物表述蕴含着国家型集体性的想象与建构。“统一与发展”、“新中国与旧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话语是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基本面相的主旨，为我们勾勒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结构，是记述“新中国”建立、发展、壮大等一系列重要进程必须尊重的前提。但是，“新中国”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具体方式与路径实现她对全社会的“统一与发展”？“新中国与旧社会”又是如何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与过度？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在一些宏大词汇的高度概括下被简略化，人们只能依据所能搜寻到的“历史”充实自己的个体记忆，形成自身对于中国（国家）的历史记忆。

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是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所以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错误的，历史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王明柯，2006a）。在选择与遗忘之间，代表着不同群体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认同；这种认同又促使他们在“历史”的再记忆中，产生不同的归属。因此，对于历史（history）而言，关于“他的”（his）“故事”（story）到底是他的故事（who is he）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历史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将历史文本作为一种历史记忆，那么在历史产生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发现那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表述差异。对文本及其内部关系纠结表述的分析诠释，是一种将不同文本情境化（contextualize）的过程，即要理解历史文本在何种资源分配与竞争背景中，以及相应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下地制作过程。研究者需要思考“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而将族群记忆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则是可以帮助我们在那些“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与“他们所相信的历史”二者之间寻找到历史的共通点，从而加深对于历史记忆、叙述方式和人类社会历史情境之间关系的理解。

因此，对于历史文本与族群记忆而言，族群记忆可以帮助理解历史文本产生的社会情境



(context),特别是在当时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下人们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出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权力关系,“社会”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历史文本为族群记忆提供了可以借鉴并进一步充实的文字基础,使族群记忆在时间向度上的传递得以延续。通过族群记忆中的口述史回忆,我们可以由各种边缘、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中,理解我们所相信的“历史”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补充、深化或修正历史文本表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真实”。因此,“历史”是构建于历史文本和族群记忆的基础之上、与个体、社会密切相关的历史记忆生产过程。

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进行社会学角度的分析、对历史进行解构,而是要将历史文本及族群记忆作为相异的社会记忆遗存用以理解“历史真实”之所以成为“历史”的过程及机制,反思“历史”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分析权力、惯习对于历史记忆的原因。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在历史文本与族群记忆之间,经过怎样的过程产生出记忆之间的差别?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差别在社会身份认同体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充分了解“历史真实”的同时,也透露出当代社会认同体系与权力关系的互动模式。只有理解了历史记忆及其背后的社会情境和思想背景,“历史”才能摆脱单线进化论式的书写模式,以一种理解性、阐释性的形象呈现。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通过对有关乌斯满的历史记忆的考查,呈现乌斯满在不同历史记忆中被“记忆”与“失忆”的形象,加深对历史记忆研究的思考。

(1) 文献研究

乌斯满作为民国时期新疆“三区革命”中哈萨克军事首领,参与了“三区革命”整个历史进程,在民国史、新疆民国史、哈萨克民族史及“三区革命”史中均有所记载。本项研究的文献研究范围也涉及相对应的四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尚无乌斯满研究的专题学术成果,所以本研究通过对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至今)中有关近代中国研究、新疆民国研究及“三区革命”研究的社会历史档案、学术资料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并结合港台及国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历史社会学的文本分析方法,以结构历史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分析、解读,在还原乌斯满这个历史人物的同时,思考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他在民国时期的新疆及哈萨克族群中所扮演的角色,理解其政治行为、身份意识和归属选择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结构演变过程及历史脉络,讨论变迁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社会学议题。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历史书写的过程与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互动关系。文献涉及中、英、哈萨克三种文字,内容包括汉、哈、维等多族群关系,中俄、中美关系,阿山地方与三区及新疆省政府关系,新疆地方与民国中央政府关系等。

在前期研究准备阶段,研究者本人已经系统地梳理了建国以来有关民国史、新疆地方史及哈萨克族史的中文文献(包括港台地区文献)及国外学术界相关研究,对“三区革命”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在实地调查阶段,文献获取的范围得以扩充,丰富了地方文史资料选辑的收集。哈萨克语言文献的梳理得到了访谈翻译的大力支持。

在文献资料搜集过程中,主要依据“可行性”、“全面性”和“多样性”原则,在笔者能力范围内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撒网式的搜索与整理,包括研究著作(白振声、鲤渊信一,1992;厉声,2006;张大军,1980)、史料汇编(“中华民国外交部”,民国档案1990)、文史资料选辑(铁衣甫江·阿迪,2005)、学术论文及期刊杂志(《永安月刊》,民国1937年105期)、报纸(《新民日报》民国1936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1947年6月20日)等。除公开出版物之外,也尽可能的将文史资料、历史档案等“内部参考资料”进行了整理。

历史研究的主体是专家学者、党政军领导、地方及族群名流等精英人物,很少见到普通民众



对过去历史经历的叙述。鉴于这种实际情况，全国及地方各级政协均成立了文史资料办公室进行文史资料的征集，在“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开展“抢救”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1986）。《文史资料选辑》的内部发行拓宽了研究者视野，并且因为刊载的主要是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所以也体现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及创造者的重要意义与价值。通过对这些“小人物”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事迹地回忆与记录，可以进一步理解社会转型对人民群众及个体生命的影响，打破了过去在研究中对社会大众生活、个体人物命运高度概念化理解的单向思考路径。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前提之下，个体的、区域的、族群的记忆得以进入到国家或地方的历史政治话语建构之中。

（2）口述史访谈

本研究采用个人口述史方法，通过对“三区革命”历史过程亲历者、记忆传承者的深度访谈，回忆历史进程中行动者、记忆者的经历。访谈对象涉及伊、塔、阿三区哈萨克等族老者；在族群划分、地区归属、部落归属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口述史的比较与分析，在描述乌斯满历史形象的同时，理解族群内乌斯满被记忆的过程。

口述史是本研究的难点。因此，为了加深对访谈对象的深度认识，本研究将参与口述史的“历史行动者”的个人生命历程作为变量进行了分析，以理解“谁在什么情况下说了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这种方式符合了族群记忆的多样性需求。

本次调查共访谈个案 14 个。通过族群、地区、部落、年龄等变量的差异，对所有个案进行了编码。其中，“地区”以“三区革命”发生时，访谈者所在地为标准；年龄以 2010 年 7 月为标准。下面是具体编码方法：

族群：哈萨克：01，其他：02；

地区：阿山：01（柯克托海：0101，青河：0102，承化：0103，布尔津：0104，哈巴河：0105，福海：0106，吉木乃：0107） 伊犁：02；塔城：03；

部落：姜太凯(Jantekei)：01，贾迪克(Jadik)：02，杰鲁西(Cherushi)：03，哈拉哈斯(Qaraqas)：04，莫勒合(Molqy)：05，其他 06；

年龄：以实际年龄为准。

个案编号：01020170、01020442、0101020178、0101030177、0101040279、0101020168、010104047、0101010586、0101010555、0101030171、0101030548、0101010480、0101040375、0201030670。

2. 研究对象——乌斯满的历史记忆

历史真实的行为主体都是个体或群体。因此，承载历史研究的基础单位是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人”，任何研究可以说都离不开对行动主体的关注。然而仔细追究下去，我们不免疑惑“人”到底在哪里？那些真实的人如何成为历史记忆中的“人”？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成为不同的“人”？

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乌斯满，经历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阶段；不同时期历史记忆中的“人”——乌斯满——呈现出的历史形象也均有所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 年 10 月 1 日至今）的历史表述中乌斯满被定义为“土匪”；在中华民国时期及后来台湾学者的表述中，他是一名“哈萨克族英雄”（张大军，1980）；在国外的研究成果中，他又是一名克里斯马型的部落首领（charismatic leader）及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Linda Benson，1990，1998）。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不同的记忆者会根据社会政治环境、写作诉求等，在历史文献资料中不断进行“记忆”与“失忆”，生产出不同的历史记忆。对于乌斯满而言，这种选择性的构建涉及国家史、政治史、学术史、民间史、民族史等多个层面。

二、记忆与失忆：历史记忆的多元分类



（一）国家史与政治史：民国史研究的两种历史时间分野

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距离今天最近的一个历史断代。近年来，有关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研究极其活跃。当前的民国史研究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研究路线：狭义的民国史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史研究；广义的民国史研究涉及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与政党斗争等各方面，在时间维度上也考虑到了与民国重大历史事件前后关联的晚清及共和国时期。无论狭义或是广义的民国史研究，都是采用了力图还原历史真实的研究路径，或从国民党的角度出发，或从共产党的角度出发，在呈现民国社会基本面貌的同时，着重对国共关系、国民党政权性质以及边疆民族政策等议题的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0；李新、陈铁建，2001；张宪文，2005）。

中国现代国家体系的确立，经历了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对待民族关系的态度、处理国家内部亚文化群体的政治、文化地位的方式上，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存在着巨大差异，分别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措施。这使得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群体划分和民族关系既不同于大清帝国时期，也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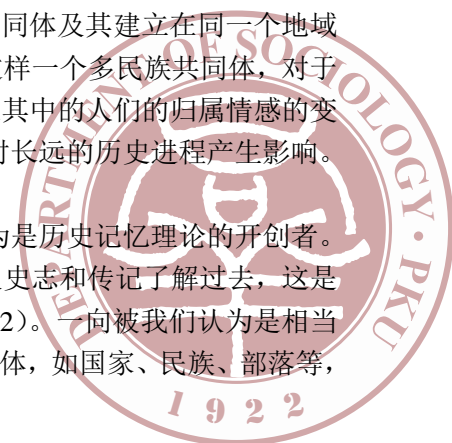
人们通过寻找过去，发现或者建构被认为是塑造了民族共同体得以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历史记忆在重划国界和确立国家地位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China）的历史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同时期的中国，由历史书写出来的“中华民族”具有不同的内部结构及涵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之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旨在加深国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并且，国内主流学界的历史研究路径采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即“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解释框架：按照生产力条件和水平，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也是按照这一发展逻辑进行学术生产与制造。要求做到取其所当取，舍其所当舍，详略其所当详略，褒贬其所当褒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容许任何的主观随意性（钟民和：2009）。那么，在“取”与“舍”、“详”与“略”、“褒”与“贬”之间，整个中华民族形成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记忆便具有了“共和国”烙印。这些具有“共和国”烙印的研究在反映民国历史的总体面貌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方面，难免有不够深刻与全面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对“中国”及“中华民族”纠结互动的发展过程的历史表述中，存在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种表述形态。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言，因为要塑造不同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即使在所记录下来历史文本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记忆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在“记忆”与“失忆”之间，中华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采用不同的标准。也就是说：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历史记忆建构中，强化着对于中华民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而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则强化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来看，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人民共同体及其建立在同一个地域上的国家机构，差别只存在于特定的短时期之内。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对于同一个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历史表述，可能反映出的是卷入其中的人们的归属情感的变化，这些历史表述的矛盾可能直接导致现实社会认同的混乱，从而对长远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二）历史书写与民间记忆：历史记忆的书写与口传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被认为是历史记忆理论的开创者。他的“集体记忆”理论认为，人们主要通过象征符号、仪式研究以及史志和传记了解过去，这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性行为。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国家、民族、部落等，



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强化这种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而这种记忆本身就是一种立足现在而对过去进行的建构。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对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保罗·康纳顿，2000：13）。他看重“在口述史事件中，看到把从属群体的历史和文化，从沉默里解救出来的可能性。口述史寻求恢复个人的生活史，让那些即便留有踪迹，但原本一直保持缄默的对象说话”（保罗·康纳顿，2000：15）。景军通过描述中国西北某个农村中孔庙的重建过程，以理解村庄的过去是如何作用于村民的生活的（JING Jun, 1996）；王明珂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探讨羌族社会的神话和历史（王明珂，2006b）。

历史记忆理论、或可称为研究视角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社会学视“讲故事”在认识论上与研究方法不可兼容的局面，将个体记忆引入到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中。在历史形成过程之中，唯一不变的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其行为与记忆不仅会影响历史的发生，也会将历史进程中所蕴涵的意义与象征得以保存和传递。无论是参与过的个体记忆、还是口口相传的家族记忆，都是基于个体及社会底层角度对生活经历事实进行详细叙述的族群记忆，反映着政治运动、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影响。结合历史文本与族群记忆的历史记忆将叙事性表达与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综合分析，使社会学的历史研究以承认历史多样性为前提。社会科学的解释与叙事非但不应相互排斥，甚至可以相辅相成。

（三）国家史与族群史：“三区革命”研究中的“主体性”思考

在新疆民国史研究中，白振生、厉声等均对“三区革命”进行过研究。部分研究较为详细地叙述出整个事件的历史进程（如白振生、鲤渊信一，1992；厉声，2006），也有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进行关于历史进程细节的描绘与制作（如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在研究假设上，他们都将“三区革命”放在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以“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为基础，通过对原因、过程、结果及意义的分析，得出“三区革命”是一场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具有自觉性、目的性的少数民族运动的结论（如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这些历史研究通过对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回忆”及“记忆”，为以新疆为切入点理解民国时期新疆地方社会政治体系的演变过程、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不同文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互动和协调机制，提供了参考。这些研究假设和结论预先设定的书写模式，不仅是学术生产行为，也是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之下的政治性集体行为。

在近代世界体系话语中，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强化国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始终都是一股强有力的势力。这种力量试图重划国界、重组政治体制、重构社会关系并转变根本归属。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解读，是民族史/国家史这一范式（尤尔根·科卡，2006：21-32）。人们一般会通过神话、传说及文本资料等历史资源追寻族群起源，产生族群认同，也就是所谓“同历史同族群”。族群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继续创造着历史，在传承族群记忆的同时深化族群认同。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族群“历史”的产生会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会出现某一族群的历史被谁创造的历史境遇。并且，历史境遇的可变性对于族群认同也会产生影响（杜赞奇，2003；菅志翔，2008：138-146）。

对于“中华民族”与“汉民族”、“满民族”、“哈萨克民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学界一般采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进行解释。他以中华体系卷入现代性社会历史变迁为界，指出“中华民族”（Chinese）的认同意识经历了从历史上的“自在的形式”到近代以来“自觉的形式”的演变过程（费孝通，1989：1-19）。那么，对于中国（China）而言，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之中如何协调“中华民族”（Chinese）与“中华各民族”（ethnic groups of China）的关系，成为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定义的“主语”。从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到共和国时期

的“56个民族大家庭”，非汉族群一直扮演着边疆地区少数群体的角色，处于地理位置的边缘。传统史学撰写所采取的单线进化论模式，使得非汉族群在历史叙述中逐渐被边缘化。虽然学术界也进行“少数民族史”的专项研究，但正是这种“专项”使得边缘化进一步加深。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社会中，少数民族“多元”强于“一体”。

新中国的日益强盛为55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各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方面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从“民族识别”开始，各少数民族不断强化着本族群“民族史”的构建。此时，少数民族“一体”又强于“多元”。

因此，在“历史”与族群、民族的纠结互动中，“历史”的记忆哪些部分被吸收进“民族”的历史构建？哪些部分又为纳入到“族群”的历史构建？“族群史”与“民族史”的互动关系是何以产生？构成这些“历史”的素材是怎样被选择、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又是什么人在构建“民族”的“历史”、什么人在构建“族群”的“历史”？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来构建自己的“历史”？（菅志翔，2007：22-31）这些问题启发着我们去认识“历史”的多样性以及“历史”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更好的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蕴含的深渊内涵。

（四）民国新疆史与新疆民国史：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地域史研究

以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新疆民国史研究的时间范围涉及公元1911-1949年。近年来伴随着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疆民国史研究也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杨策，2007），并且也产生了由单一历史学研究向社会学、政治学、边疆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向（如杨建新、马曼丽，1990）。当前的新疆民国史研究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社会面貌，强调历史事实的“情境性”。并且，还侧重于对民国时期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如维汉族群关系、美苏在新疆的力量角逐、西北军阀对新疆的影响等（如陈慧生、陈超，1999）。这些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在中华民国建构的过程中，新疆地方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其背后的社会动力，也为当前研究新疆问题提供了参考。

新疆民国史与民国新疆史不能在简单意义上等同起来。1884年（光绪10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将迪化（乌鲁木齐）直隶州升为府，迪化成为新疆的军政中心。1914年2月，伊犁镇边使撤销，改为镇守使；1916年塔城参赞撤销，改设塔城道；1919年6月，阿尔泰办事大臣撤销，并入新疆省，设置阿山道，以办事长官原辖地为区域。至此，才形成了今天我们脑海中新疆所具有的地理版图。而之前，阿勒泰、伊犁（包括塔城）、新疆均直接隶属于中央。1955年4月，中共中央在新疆建立以维吾尔族为自治主体的省级民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就是说，从民国时期开始，新疆就在经历不断的地理行政整合过程，其行政建制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在有关新疆的历史研究中要避免断代史与地域史的混淆：新疆民国史是指新疆在民国时期（1911-1949）的区域断代史研究；民国新疆史是关于民国时期新疆省的地域史研究，其中要区分1914年、1916年及1919年新疆省行政版图所发生的变化。将新疆民国史与民国新疆史进行区分，是以社会学视角对民国时期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涵盖的区域范围进行研究的前提。

（五）关于本项研究：有关乌斯满的三种历史记忆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构成了历史记忆的多元划分体系。本研究以历史进程、存在形式为标准，将乌斯满的历史记忆划分为民国记忆、共和国记忆及族群口述史记忆。通过对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的文献资料进行细致梳理，并结合口述史访谈资料，呈现出在民国与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中对于乌斯满的三种历史记忆。这种以历史进程为参照、结合历史文本与口述史资料、经历记忆与传承记忆的比较分析方法，在还原乌斯满原貌的前提下，试图连接起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历史文本与历史记忆，理解不同历史背景下国家建构与族群认同、社会结构与文化表征背后的历史动力机制。本项研究力图在三种历史记忆表述的基础上，跳出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思考路径及书写模式，以“第四只眼”的表述方式记忆乌斯满，呈现关于乌斯满的“第四种历史记忆”。

对于共和国记忆和民国记忆的选择范围，本研究均以中文文献资料为主；英文文献和哈萨克

语文献以辅助性参考为主，不作为分析材料引用。在关于共和国及民国历史记忆的划分标准上，主要采用的指标包括：作者身份、出版年份和书写时间。针对一些回忆性传记，在难以根据出版信息进行划分时，引入作者的“历史身份”（即作者在历史事件亲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区分。历史文本的划分参加附录一。

三、共和国记忆：公元 1949-2010 年

共和国时期历史文本对于民国新疆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表述，往往是通过“回忆”那些作为历史关节点的重大历史事件来实现的。乌斯满作为哈萨克军事首领，在“三区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在民国史或哈萨克族群史中也包括乌斯满的历史记忆，但以“三区革命”史中的表述最为全面及详细。

“三区革命”从开始至结束历经阿山暴动、青河会议、“三区临时革命政府”的建立、新疆省联合政府的建立与破裂、迪化“二二五”事件、北塔山事件及新疆和平解放等过程，相关历史文本的描述也是以通过对以上历史关节点的“回忆”而产生出“历史记忆”。结合乌斯满作为阿山地区专员的社会身份，本研究在共和国记忆部分的“回忆”以其身份角色变迁为切入点，通过对阿山暴动、青河会议、三区政府的建立、新疆省联合政府的建立与破裂、北塔山事件、新疆和平解放等事件中乌斯满的描述，呈现共和国时期的乌斯满历史记忆。

在历史记忆的涵盖范围上，涉及笔者搜索到的共和国时期所有历史文本资料，相关作者以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及党政领导人为主，也包括编写或口述文史资料选辑的普通民众；出版日期为 1949 年 10 月之后，出版地点均为大陆。由于出版政策等方面的要求，这些历史文本的指标体系符合共和国时期记忆的界定标准，能够较为全面与客观地呈现共和国时期对于乌斯满的历史记忆。

由于不同的历史文本在写作目的及文本性质上不尽不同，因此在章节结构、陈述重点上各有侧重。对于“共识性”知识笔者采用标准化的表述，而对于乌斯满的历史记忆，笔者选取最具代表性、表述最为详细的历史文本进行组织陈述，力求还原最符合共和国记忆的乌斯满。并且，通过分析文本中描述乌斯满身份、行为变化的逻辑结构，理解共和国历史记忆中乌斯满的“记忆”过程。

（一）阿山暴动：是土匪还是巴特尔？

阿山暴动是阿山地区哈萨克牧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前奏。

1940 年，盛世才政府在阿山地区收缴民间枪支，成为可可托海牧民首次暴动的直接导火线。2 月 12 日晚，哈萨克族头目叶斯木汗带领牧民杀死可可托海（富蕴县）县长徐海麟、阿山视察委员王明阁、清枪委员王成林等 7 人，夺走了枪支。另一头目阿合特开比也带人杀死了前来收枪的 6 名警察。叶斯木汗和阿合特开比成为暴动的首领。至 2 月底已聚集 2000 余人，百多支枪。暴动队伍攻打了可可托海县城，控制了青河至承华的交通要道。（陈慧生、陈超，1999：388）

“暴动”开始之初，乌斯满便是“暴动”队伍中的一员。

乌斯满原是一个贩卖牲畜的商人。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清枪”运动，激起了牧民的反抗。阿山地区出现了许多反抗组织，其中在富蕴县有一支叶斯木汗领导的队伍，乌斯满混迹其间，负责管理伙食。但他拉了另外一帮人在富蕴通往承化的公路旁抢劫行旅。

（杨策，2008：274）

在盛世才“剿匪”过程中，乌斯满的力量逐渐壮大，实力大增；“暴动”中的“土匪”因为反抗盛世才的统治，被阿山地区的牧民授予了“巴特尔”的称号。

阿山哈族群众第二次暴动失败后，富蕴县境内毛拉湖部落的牧民乌斯满·斯拉木率



领哈列力台吉的残部进入富蕴、青河一带的山林中继续坚持武装斗争。1942 年底扩大到 80 余人，并多次攻击当地的警察局和前来“进剿”的盛军。（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21）

1940 年 9 月间，乌斯满部已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并与叶斯木汗、苏来曼、艾尔斯汗等部汇合一起，将省军多次击败，一度还包围了柯克托海县城。这年秋，暴动队伍与省政府达成协议，交出了 1000 多支枪。一般牧民手里几乎没有了武器。而在 1941 年第二次柯克托海暴动时，人们发现乌斯满隐藏了部分武器，在不少人心目中他成了有胆识的“英雄”。第一次柯克托海暴动结束时，他竟与叶斯木汗、苏来曼一起，被授予“巴图尔”称号。（白振声、鲤渊信一，1992：360）

10 月，盛世才派他岳父邱宗浚前来和我们谈判。

谈判还决定：群众手里的枪全部交归政府。我们把群众所有的武器一千多支枪全部交出了。从此，群众手里再也没有武器了（可是到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事变时，人们发现乌斯满隐藏了一支枪和一个望远镜。后来富蕴群众认为他有“胆”，是真正的“英雄”）。

谈判以后，我们给三个以巴图尔（英雄）称号：第一个是苏来曼（切肉其部落人），第二个是热斯汉（卡哈拜部落人），第三个是乌斯满（莫力合、阿衣吐汉部落人）。（拉提甫，1979：98）

作为中央统治力量的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的盛世才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利益，镇压哈萨克牧民反抗统治的“暴动”，作为“暴动”中一份子的乌斯满必然以“土匪”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记忆之中。但由于盛世才在新疆实施残暴统治才使得哈萨克牧民不得不选择揭竿而起，所以对于普通的牧民而言，与压迫自身的力量进行对抗的乌斯满，必然是族群内象征着勇猛、威武的“巴特尔”。地方政治力量盛世才象征着国民党及新疆省政府的统治权威，因此在阿山暴动的历史记忆中，乌斯满是哈萨克牧民的“巴特尔”、盛世才政府的“土匪”。

（二）青河崛起：是帕夏尔还是主席？

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乌斯满在青河县建立了“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并担任首领。

1942 年阿山组织了一个“阿勒泰哈萨克族民族复兴委员会”。于是哈族人民在这里的反抗斗争在新的规模与水平上重新开始了。

1943 年（民国三十二年），新疆省政府改组，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新疆。阿勒泰哈族人民举行暴动，攻下精河并南下昌吉、奇台。

“阿勒泰哈萨克族民族复兴委员会”提出了“打到盛世才政府”的口号。这年阿山的哈族人民进攻了驻在精河的盛世才军总指挥部，几乎全歼盛军。4 月，攻下了精河之后，南下向阜康、奇台、孚远（今吉木萨尔）、乾德（今米泉）、昌吉等县北部进攻，昌吉、阜康、巴里坤等地的哈族起来响应。1944 年 7 月，吉木乃县成立了以达列力汗为首的“民族解放社”也积极参加了斗争。据 1944 年 11 月阿山警察局的统计，参加这次的哈族人民仅承化、吉木乃、哈巴河、福海四县就有二万多人。参加暴动的哈族部落：奇台八个，四千五百人；阜康四个，九百人；沙湾一个，三百人。（杨宗禹，1987：154-156）

达列力汗与乌斯满各自率队于 10 月在青河县布尔根牧场召开大会。苏联和外蒙的顾问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乌斯满和达列力汗被选为正负首领，乌斯满散发了带有浓厚反汉情绪的信件。外蒙给该组织提供了“包括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枪等约 1700 多件”武器。（阿勒泰行署档案，转引自《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P366）

青河会议后，以乌斯满为首的反政府武装与政府摆开了对垒的阵势。当时，吉木乃、哈巴河、布尔津等地的反政府力量也以游击队的形式逐渐活跃起来。面对阿山地区日益



严重的时局，进入新疆不久的国民党军队就将镇压阿山暴动作为主要的任务，共调动了2100名兵力；加之省军1400多名以及当地驻军，总共4600多兵力。配备了飞机、坦克、大炮等装备，由省军128师师长柳正欣统一指挥，指挥部设在乌河设治局。

1944年3月，在苏联、外蒙支持下，乌斯满率3000余人在阿山与政府军激战。苏联、外蒙的飞机入侵中国领空侦查并轰炸乌河设治局，仅3月15日一天就出动六七十架次。政府军损失惨重，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吴国桢，分别向苏联驻迪化领事普希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先后提出严重抗议。4月下旬，国民党第18混成旅夏禹卿团开赴乌河设治局所在地沙尔托海驻防，马平林团也开赴阿山大布逊地方驻防。5月，乌斯满在富蕴兵败，分两路撤退。一路往东至青河；一路往西去攻福海，未克，再继续往西。6月底，乌斯满又率千余人进攻承化县境，战火一直未息。与此同时，以司马义洛夫、毛拉斯拉木为首的游击队在吉木乃县周围活动，7、8月份两次围攻了县城。哈巴河县牧民在玉素甫昆带领下进攻了县城，包围了警察局，他们使用的都是苏联武器。总之，在三区革命爆发前夕，整个阿山地区均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陈慧生、陈超，1999：387-391）

1942年，在青河县的外蒙边境建立了“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乌斯满任主席，提出“打到盛世才政府”等口号，宣传东土耳其斯坦主义。在苏联和外蒙的支持下，阿山哈萨克族牧民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可以与盛军正面作战的队伍。1943年初，乌斯满、达列力汗率领哈萨克族部队向乌河盛军总指挥部发动进攻，几乎全歼当地驻军。4月，攻占青河，接着向阜康、奇台、孚远、乾德、昌吉等县进攻，各地哈萨克族民众纷纷响应，声势浩大，北疆震动。（杨策，2007：251）

1943年5月，乌斯满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情和支持，接受了苏联赠送的枪支、面粉和布匹。7月，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杜布敦会见，建立了联系。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持下，乌斯满部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1943年12月中旬，乌斯满在青河县布尔根河流域的大本营成立“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推举乌斯满为会长。

委员会下设游击队总司令部，苏鲁拜任总司令，征兵400名加上原有兵力编成十个大队，还设立了组织、宣传、民政各部，并向牧民发出公开信，提出八项主张：

- “第一、争取自由、挽救哈族的危机；
 - 第二、阿山东部各县由哈族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组织政府；
 - 第三、阿山区组织哈族军队；
 - 第四、释放被捕的人；
 - 第五、禁止政府随便动用牧民的牲畜；
 - 第六、取消苛捐杂税；
 - 第七、阿山禁止汉人居住和不许汉人军队驻扎；
 - 第八、从前亲善的邻居国家仍要用土产换布匹，迅速运到当地，并准许商人经商。”
- （《阿勒泰地区革命斗争大事记》，阿勒泰地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这8项主张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盛世才反动统治，争取哈萨克族的自由和自治。其中“阿山禁止汉人居住”的错误主张，反应了当时的民族复兴委员会未将盛世才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同汉族人民群众区别开，笼统地反汉排汉。

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成立以后，在整个阿山地区发动哈族人民开展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声势越来越大。

1944年4月下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巴山等军政领导以视察边境为名在中蒙边界会见了乌斯满、苏鲁拜等阿山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枪支弹药、通讯器材和参谋人员等方面给乌斯满部提供大力支持。1944



年4月5日，乌斯满部攻打阿拉通别，歼灭盛军一个团。4月13日，国民党青河县县长陶百川放弃清和县城向奇台逃跑，被哈萨克民族武装击毙，占领了青河县城。随后多次围攻富蕴县城。6月初铁木尔汗等一批苏联顾问随同在苏联避难、学习的达列力汗从苏联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到青河县三道海子哈萨克民族武装营地，同乌斯满会合后，参加民族复兴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决定将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推向承化、布尔津、福海等县。随后，派出游击大队指挥官华尼西拜率400余名武装人员组成宣传队经蒙古国的科布多、巴彦诺乐盖到达承化、福海、布尔津等县北部山区夏牧场宣传，同时，又派游击大队指挥海大尔、特斯肯拜、木海和苏联顾问热甫汗、胡尔马什等率250余名武装人员前往吉木乃县。在吉木乃县哈拉善特夏牧场受到当地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举行了吉木乃县和塔城专区和丰县、额敏县的哈萨克族、蒙古族部落首领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此后，吉木乃县游击队迅速发展发展到500多人。（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21-23）

“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成立之后，乌斯满的政治诉求不断扩张，开始以“巴特尔”自称，并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

到了1943年的秋天，盛世才彻底背弃了苏联，驱赶了富蕴的苏联探矿队。因此，苏联的盟国外蒙派来名叫卡木卡西的哈萨克人和乌斯满联系，开始向乌斯满提供军火援助，乌斯满一伙也由此开始壮大起来。1943年12月，盛世才由乌鲁木齐派哈里曼、莎力和当时任哈、柯文促进会会长的麻合木提等人来到夏哈尼尔哥兵营，首先由麻合木提与莎力前往乌斯满处讲和。但乌斯满却将麻合木提交给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将莎力留了下来。国民党当局见到这种情形，再也不敢派人去讲和，把哈里曼带回了乌鲁木齐。这年，乌斯满在青河中蒙边界的布尔根度过了冬天。一九四四年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雪叶巴勒森亲自到布尔根与乌斯满进行面谈，并且还援助了很多枪支弹药（包括机关枪、迫击炮等）。当时，乌斯满以“阿勒泰民族解放战线主席巴图尔乌斯满”为名签发过告示。（哈再孜·阿合提，1988：94-95）

1943年10月，乌斯满、达列里汗领导的队伍在青河的布尔根牧场召开了大会，这里距外蒙只有十几公里。与会者除乌斯满、达列里汗的部属外，还有一些部落头人、牧民以及苏联和外蒙的顾问人员。外蒙顾问组以哈拉哈巴为首。会上号召牧民们拿起武器，反抗盛世才政权，并成立了“阿勒泰哈萨克族复兴委员会”，首领为马斯满，达列里汗副之，委员有苏来曼、卡箴勒买力、拉提甫、开列斯、阿克索干、瓦提汗、卡里甫等人。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民政及司令部，以苏鲁巴依为司令，将部队编为10个大队。他们制定了军事计划，接受了外蒙援助的各种武器，包括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枪等约1700多件。会后散发了以马斯满的名义写给各部落牧民的一封信，信中号召牧民起来造反，并提出八条政治主张：（一）争取自由挽救哈族的危机；（二）阿山东部各县由哈族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组织政府；（三）阿山区组织哈族军队；（四）释放被捕的人；（五）禁止政府随便动用牧民的牲畜；（六）取消苛捐杂税；（七）阿山禁止汉人居住，不许汉族军队驻扎；（八）从前做亲善的邻居国家仍要用土产换布匹迅速运到此地，并准许商人经商。信中最后说：“争取民族利益的英雄随我来，快骑马拿武器来，不然就违背了我们祖宗留下的风俗习惯。我上天，你们是我的翅膀；我下地，你们是我的尾巴。一个土地、一起生长的亲爱牧民，你们的任务是：（一）忠实诚恳地参加我部；（二）全体反对汉族，不借给他们马匹和骆驼，不执行汉族人的指示，同时把汉族军队的情形随时报告我部！”（白振声、鲤渊信一，1992：367）

作为政治组织的“阿勒泰哈萨克族复兴委员会”，也被称为“临时革命政府”。明确的政治主张、健全的政治组织和完备的军事机器壮大了乌斯满的实力。

同时，在青河县布尔根河大本营成立了阿山革命临时政府，选举乌斯满、达列力汗、拉提甫·木斯塔帕、热马赞·勃力里木等 12 人为政府委员，乌斯满任政府首脑，达列力汗任政府副首脑及军事总指挥。将哈萨克民族武装整编为 9 个大队。（**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24**）

1944 年冬季，乌斯满、达列力汗的阿吾勒居住在布尔根冬窝子，同年 10 月在乌斯满、达列力汗的组织下召开了会议，阔克赛根比、达列力汗台吉、艾山乌库尔台、阿德力汗比、热苏勒扎楞、阿斯哈提贝子、叶金贝子、赛甫拉依麻木、沙木赞格、乔海哈吉、贾那提扎楞、哈合什比、曲克勒泰扎楞、阿布杜热苏勒、玛再提·萨比、卡买勒、胡安什拜英雄等各部落首领和英雄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推选了乌斯满与达列力汗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副主席、达列力汗兼任游击队的总指挥，并选举产生了乌斯满、达列力汗等革命政府的 12 名委员。（**阿克兰别克·贾帕拜，2005：67**）

牧民们转移到青河县已是 9 月下旬，10 月初接到通知各部落首领人物去布尔根开会，青河县境内的各部落首领人物全部到会，我们的部落由我、叶金、赛提哈孜老师前往参加。我们去后一两天，大会才开始举行。乌斯满、达列力汗以及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顾问都出席了会议。大会由达列力汗主持，他在会上做了讲话，他分析了阿山地区革命斗争形势，指出革命斗争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势力正在减弱、衰败，革命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阿山人民的百分之八十已投入到革命行列，在吉木乃县已建成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迪化至阿山的交通线已受到监视，吉木乃游击队向阿山地区的哈巴河、吉木乃、布尔津等县发动了围攻，盘踞在这些县的国民党军队已自顾不暇。这些，为我们解放承化县提供了有利条件。

他还说：“要加强人民的团结。为了使革命事业有计划地向前发展，要建立一个领导机构，今后的革命斗争要依靠这个领导机构来统一领导和指挥。”

与会的人员大都表示拥护和支持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的提议，一致同意将这个机构称为“革命临时政府”。会上选举乌斯满·斯拉木、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拉提甫·木斯塔帕、阔克赛根·恰库、瓦提汗·阿木尔、阿德力汗、克列斯、热马占·布木、卡里甫、毛拉斯拉木·依孜马伊（维吾尔族）、阿斯哈提·满凯、卡买勒等十二人为“革命临时政府”的成员。选举政府成员的条件是：第一、能代表各县；第二、按当时的惯例从各大部落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拉提甫、阔克赛根、瓦提汗代表青河县；阿德力汗、卡买勒代表柯克托海（富蕴县）；热马占、毛拉斯拉木代表吉木乃县；卡里甫代表福海县；阿斯哈提·满凯代表承化县的各部落。乌斯满·斯拉木被选为“革命临时政府”领导人正职。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当选为副职，兼任军事总指挥。

游击队撤回到革命根据地以后，又召开了“革命临时政府”成员会议，达列力汗在会上介绍了阿山地区的柯克托海、清河、吉木乃、布伦托海（福海）等县获得解放，国民党残余力量只盘踞固守哈巴河、布尔津、承化等县城的情况。还讲了伊犁发生革命和伊犁地区获得解放的经过。他分析了当时阿山地区的整个形势后指出：“奇台交通线已被切断，布尔津交通线也被吉木乃游击队所控制，国民党残余力量已陷入困境，向承化县城进军的有利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我们集中全部力量围攻，就一定能够夺取承化县城”。政府各成员一致拥戴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的提议，并通过了立即行动的决议。（**阿斯哈提·满凯，2005：43-47**）

乌斯满在“阿勒泰哈萨克族复兴委员会”任主席、“临时政府主席”，也称为“汗”、“帕夏尔”（王）。

乌斯满从 1943 年 7 月到 1946 年 7 月这三年中，以十来名的小股土匪发展成为独霸阿山地区的巨寇，自称为哈萨克王。1946 年 8 月，投靠了国民党。（**拉提甫，1979：103**）



(1943年)12月,在外蒙古支持下,乌斯满在布尔根河成立了“阿尔泰哈族复兴委员会”,征兵四百名,与原有兵力共变成十个大队,乌斯满被推举为“帕夏尔”(王),以苏鲁巴依为总司令。委员会下设总司令部和组织、宣传、民政各部。复兴委员会向牧民发出公开信,提出争取自由、自治、组织哈萨克族军队,号召牧民“忠实诚恳参加我部”,“全体反对汉人”。乌斯满用掠夺牧民牲畜的办法,迫使他们参加反对盛世才政权行列。(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347)

(乌斯满)1942年因力量弱小,被整部逐出承化,退至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塔音库尔,并设指挥所。1943年任阿山哈萨克族解放委员会委员长,后武装攻占阿山全境,任阿山人民临时政府委员长。(张君超,2003:209)

1943年7月,住在外蒙古得利文地方的穆华西(即木哈什,哈萨克族)等人来见乌斯满。之后,乌斯满又以抢劫所得换取外蒙古的枪支。同年9月,乌斯满在与盛世才部交战中负伤,退至中蒙边境一带。1944年2月,外蒙古送交乌斯满各种新式枪支近400支,并为他派了助手和参谋,乌斯满的势力大增,自称为哈萨克的“汗”。(杨策,2007:274)

“阿勒泰哈萨克族复兴委员会”是乌斯满在反抗过程中的建立的政治机构,代表着他在不断的斗争中实现了由传统的部族政治向现代行政体制的转向;“阿山临时人民政府”则在此基础上又显示出对于独立、自主的政治要求。作为同一组织在历史记忆中的不同表述,他们象征着在历史记忆形成过程之中,组织性质及其建立者乌斯满的认同选择。

作为首领的乌斯满,被赋予“主席”、“临时革命委员长”等称号;但其自称却又是哈萨克族群内部原始的“帕夏尔”、“汗”,在他称与自称之间,历史记忆的差别得以形成,为历史记忆塑造的现代性转向是否成立提供了参考。

(三)“三区”政府:谁的专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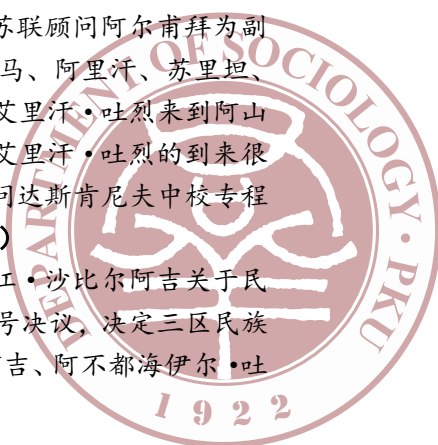
“三区”政府建立后,乌斯满被任命为阿山专员。

(1945年)9月12日,艾力汗·吐烈至阿山任命乌斯满为阿山专员,达列力汗、夏木塞、阿尔甫拜(苏联顾问)为副专员。(陈慧生、陈超,1999:397-398)

1945年9月6日,民族军和阿山哈萨克族武装力量攻占承化县城后,阿山专区全境解放。艾力汗·吐烈等人来到承化,同阿山哈萨克族民族复兴委员会的领导人达列力汗等人协商后,9月23日召开临时政府流动会议。会议决定:第一,阿山专区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第二,增补乌斯满、达列力汗、扎克依汗·艾林等三人为临时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三,组建阿山专署及下属各科、局。任命乌斯满为专员,阿热甫拜·阿里木江(苏)为副专员,后来又增加了恰米希·马米也夫为副专员,任命胡马尔·加开(苏)为秘书长。第四,任命了阿山专区各县县长、副县长。(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87)

(1945年)9月12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主席艾里汗·吐烈来到阿山,通过协商组建了行政公署。任命乌斯满为专员,达列里汗、夏木塞和苏联顾问阿尔甫拜为副专员,还任命了专署各局局长和各县县长,苏联、外蒙人员胡尔马、阿里汗、苏里坦、堆山拜克等人分别在专署各处、局任副职。这中间有一插曲:当艾里汗·吐烈来到阿山时,乌斯满正在他的冬寓于——富蕴的吐尔公。他对于民族军及艾里汗·吐烈的到来很不高兴,据不参加在承化举行的行署成立仪式,后经苏联军事顾问达斯肯尼夫中校专程劝驾,才答应到承化任职。(白振声、鲤渊信一,1992:404-405)

1946年4月22日,三区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关于民族军整编和省府组成问题谈判情况的汇报。这次会议通过271号决议,决定三区民族军可编为6个团,总数为12700人,并授权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阿不都海伊尔·吐



烈、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与国民党政府在达成的上述协议上签字。同时，还决定：三区方面出任省政府的具体职务和人员为：1. 省政府委员兼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2. 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副厅长：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3. 省政府委员：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4. 省政府委员兼阿山专员：乌斯满；5. 省政府委员兼喀什专员：伊斯哈克伯克·穆奴诺夫；6. 省政府委员兼伊犁专员：艾力汗·吐烈；7. 省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8. 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赛福鼎·艾则孜。（**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118**）

乌斯满拒不到任，是不履职的“三区”政府阿山专员。

三区革命胜利，三个专区连成一片，三区政府改组，乌斯满拒不参加；被选为阿山专区的专员后，仍不肯到任。请他到迪化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他仍旧不予置理，只是派了拉提甫为代表住在伊犁，对三区革命始终采取了抵制和反对的态度。（**杨策，2007：268**）

三区革命，阿山解放，1945年10月阿山进行选举，乌斯满拒绝参加。但人们还是选他为阿山专员。乌斯满并未往承化到任，还留在富蕴吐尔根家里。12月10日伊犁来人通知要乌斯满去参加三区和迪化谈判会议，他也不去。后来我代表阿山出席了谈判。（**拉提甫，1979：103-104**）

乌斯满与国民党方面暗地勾结，背弃“三区”政府。在他投靠国民党后，开始公然反对“三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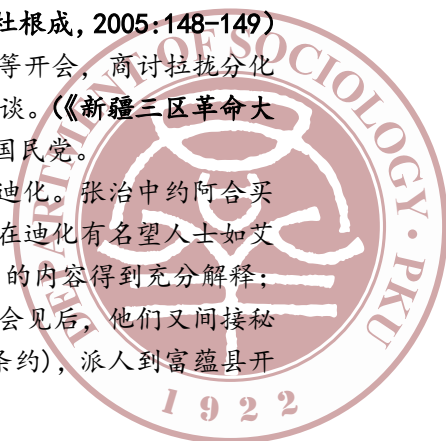
经过达列力汗的多次促请，乌斯满从可可托海搬至承化。他对达列力汗接受伊犁方面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深为不满，对游击队按民族军方式改编大为恼火。他借口有病，要在家里办公，提出要按宗教仪式处理政务。政府人员必须到他家中请示汇报。达列力汗为顾全大局，统一他在家里办公等要求。但在政府、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始终坚持正确主张。为此，乌斯满深为嫉恨，经常出难题、挑岔子，并企图向国民党靠拢。国民党乘机进行策反，授意贾尼木汗写信，派努尔和加衣潜回阿山密见乌斯满。努尔和加衣在福海一带被抓获，但其密信已转交乌斯满。达列力汗及时将这些情况电告伊宁。

4月初，乌斯满借口“休养”，从承化搬回富蕴县，并立即召集亲信，决定以组建自己“卫队”的借口成立了100多人的“独立武装”。并以“和谈”为理由，下令释放了努尔和加衣。乌斯满野心不死，他通知阿山行政公署官员到他的牧场胡玉开会。达列力汗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召集政府官员、各县县长赴会，诚恳劝道乌斯满以全区人民利益和革命大局为重，应搬回公署办公，处理全区问题，乌斯满虚意应付，但又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我住在哪里，公署就在那里办公。青河、富蕴两县的税收，公署不得征收，全交我本人。不许收缴武器”。“和谈”中，伊犁方面通知，以盛世才下台（1944年）为界，以后的苏联武器装备一律上缴，以利和谈。阿山骑兵团要增加哈帕斯（乌斯满亲信）为副团长，那哈提拜衣为副参谋长，吉勒合阿依达尔为警察局长。（**杜根成，2005：148-149**）

1945年2月中旬，吴忠信、郭寄崎召集警务处处长胡国振等开会，商讨拉拢分化乌斯满、哈巴斯等人的办法，决定派胡赛音前往承化与乌斯满会谈。（《**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48）同年八九月份，乌斯满两次派人到省府联络，投靠国民党。

8月上旬，乌斯满派代表哈那提拜、卡克夏·苏里坦等到迪化。张治中约阿合买提江、包尔汉共同会见，他们向张治中提出如下要求：哈萨克族在迪化有名望人士如艾林郡王、贾尼木汗、苏来曼等人回阿山工作；希望《和平条款》的内容得到充分解释；阿山地方经济困难，请求接济；阿山边防重要，请派国军进驻。会见后，他们又间接秘密向张治中表达了两点：一是苏联借口条约（指与盛世才签订的条约），派人到富蕴县开



采钨矿，乌斯满反对，想用武力驱逐；二是速以边卡部队名义派部队支援阿山，并接济枪械。张治中告诫乌斯满对苏联切不可采取武力行动，以免引起意外纠纷。关于边卡部队问题，一时不能派遣，须与三区军队改编问题同时解决。事后，张治中密令刘孟纯提供一些物资和武器，让卡克夏·苏里坦带回，哈那提拜留迪化继续商谈。

9月3日，乌斯满又派拉提甫到迪化，向张治中提出如下要求：(1)请政府派军队开入阿山；(2)请政府拨枪1000-2000枝；(3)请派代表和电台常驻阿山区；(4)请将阿山区之经费直接拨给；(5)请政府拨发粮食、布匹、茶叶等。并要求政府授予管理全疆宗教权和批准世袭王位。

张治中认为：“这两次代表来意很明显，是反对苏联和反对伊方(三区)的。”(《张治中回忆录》下册536)因此，在处理此问题时一方面显得很谨慎，约请阿合买提江、包尔汉共同会见乌斯满的代表；另一方面又做出决定，将阿山经费直接拨给，不再通过伊犁转发，并拨给一部分粮食、布匹、茶叶。又让警备司令部拨给步枪三四百枝，电台一部。(陈慧生、陈超，1999：423-434)

阿山行政公署成立时，乌斯满·斯拉木任行署专员，但他没有忠实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而是一意孤行地搞独立活动。1945年底，与国民党新疆财政厅长，曾任国民党政府阿山区副专员贾尼木汗秘密取得联系。1946年初，阿山代表拉提甫·木斯塔帕，被乌斯满委派前往伊宁，他与艾力汗托列取得联系，经过秘密会谈达成共识。1946年5月，他带着艾力汗托列给乌斯满的信返回阿勒泰。此时，乌斯满已从承化回到可可托海，拉提甫将信交给了乌斯满。乌斯满勾结串通各地反动分子，开始了反对三区革命的活动。1946年6月，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带领阿山行署领导和部分部落首领来到乌斯满所在的胡玉(地名，在富蕴县)，我坐为达列力汗的秘书一同前往。乌斯满搞分裂的野心不改，一夜之间将达列力汗的秘书一同前往。乌斯满搞分裂的野心不改，一夜之间将达列力汗一行包围，欲逮捕达列力汗，还想派人抢夺骑兵团的1050匹战马。后来，在部落首领们的调和下，局势有所缓和，胡玉会议不欢而散。自此，乌斯满彻底暴露了其反动面目，公开反对三区革命。(斯灭开·胡夏巴耶夫，2005：105-106)

乌斯满有两个好友：苏力曼和努尔和加衣(都是卡哈拜部落的)，在三区革命前曾出力打过仗，在三区革命后，没有给分配工作，他们心怀不满，于1945年8月带着十几个人投降了国民党，随即搬到沙漠地带过冬。1946年1月，他们派努尔哈生木(是努尔和加衣的弟弟)，到迪化与贾尼木汗联系。他们给贾尼木汗的信上说：“阿山变成赤色了，乌斯满待我们也不好，如果我们到迪化，会不会对我们有好处？”贾尼木汗将此情况报告了他的国民党上司。国民党上司通过贾尼木汗写信给哈帕斯(和苏力曼、努尔和加衣一伙的，是乌斯满的亲信)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1946年2月，哈帕斯把贾尼木汗的信带给乌斯满。同时，贾尼木汗另外写信给乌斯满，让努尔哈生木带回。信上说：“如果决心叛变(指反对三区革命)的话，可派代表来。联系地点是九龙街附近，靠沙漠的地方有一个单独的村庄。村长叫大石，回族人，你们的代表找到大石，就可以和我联系了，你有什么要求，张治中都会答应。这里有我可以代你办理”。(拉提甫，1979：103)

乌斯满一面不懂声色地住在牧区，一面把大石送到富蕴库尔特种大烟，掩藏起来。8月，他派哈那提拜、哈哈夏、大石三人带他的信到迪化。贾尼木汗报告了宋希濂，宋当然欢迎乌斯满投靠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所以送给乌斯满不少礼物：一架收发报机和两个管理机器的技术人员(汉族)，一件皮大衣，五百块砖茶，四十匹呢绒，五十匹绸子，一百匹各色布，用十峰骆驼驮着，派回族人居尼斯护送到哈热洞克。同时迪化方面又派胡赛音县长和三名汉族职员来协助乌斯满工作。贾尼木汗就作为乌斯满的驻迪化代表。



贾尼木汗因拉拢有功，当了新疆税务局局长，不久又升为财政厅厅长。（拉提甫，1979:104）

“三区”政府任命乌斯满为阿山专员，乌斯满不但不接受、反而投向国民党政府，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阿山专员。这段历史记忆中的乌斯满是多疑、落后、保守的形象，甚至还“种大烟”。这种历史形象的塑造也与他暗地里主动勾结国民党相匹配：乌斯满是不称职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阿山行署专员

（四）新疆省联合政府：阿山归谁？

在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之后，乌斯满代表“三区”出任阿山专员一职，阿山在政治权利版图中依旧属于“三区”。

《和平条款》签订后，原新疆省政府进行改组。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此前，省政府名单已由南京政府命令公布。省联合政府组成的名单如下：

兼主席：张治中

委员兼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维吾尔族）

委员兼副主席：包尔汉（维吾尔族）

委员兼民政厅长：王曾善（回族）

副厅长：赖希木江·沙比里（维吾尔族）

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卢郁文

副厅长：马廷骧（回族）

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

副厅长：蔡宗贤

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穆罕穆德·伊敏（维吾尔族）

副厅长：顾谦吉

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

副秘书长：阿布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维吾尔族）、萨力士（哈萨克族）

委员兼社会处长：赵剑锋

副处长：尔德尼（蒙古族）

委员兼卫生处长：达列里汗（哈萨克族）

此外，委员还有：屈武（迪化市长）、伊斯哈克别克（兼省保安副司令）、艾力汗·吐烈（已被遣送回苏联）、乌斯满、艾沙、阿布都克里木·买合苏木、钟棣华、管泽良（未到任）。（陈慧生、陈超，1999：409-410）

1946年4月22日，三区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关于民族军整编和省政府组成问题谈判情况的汇报。这次会议通过271号决议，决定三区民族军可缩编为6个团，总数为12700人，并授权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阿不都海伊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与国民党政府在达成的上述协议上签字。同时，还决定：三区方面出任省政府的具体职务和人员为：1. 省政府委员兼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2. 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副厅长：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3. 省政府委员：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4. 省政府委员兼阿山专员：乌斯满；5. 省政府委员兼喀什专员：伊斯哈克伯克·穆奴诺夫；6. 省政府委员兼伊犁专员：艾力汗·吐烈；7. 省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8. 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赛福鼎·艾则孜。（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118）

在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全力支持之后，乌斯满彻底投靠国民党、反对“三区”政府。之后，达列力汗接替乌斯满任阿山专员，乌斯满开始全面武力反攻。

（1945年）11月，得到国民党支持的乌斯满即派部队攻占福海县，骚扰三区。1947



年2月，三区宣布撤销乌斯满阿山专员，由达列里汗代替。随即派出3个骑兵团，由伊斯拉克别克指挥，讨伐乌斯满。经过激战，乌斯满败退至北塔山一带。后来他一直得到国民党的支持。乌斯满问题是省联合政府破裂的又一因素之一。（陈慧生、陈超，1999：434）

阿合买提江等返回伊犁后，即致力于三区革命政权的巩固和三区经济文化的发展。1947年10月，民族军在苏联的帮助下，打败了再次占领阿山几个县城的乌斯满叛匪。随后又镇压了沙湾县县长哈力伯克反对三区的武装叛乱，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利用乌斯满等颠覆三区政府的阴谋。此后，加强了民族军的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素质。还采取种种措施，整顿三区的财政、金融、税收，加强对农牧商业和手工业的指导与管理，促进三区经济的发展。（《当代新疆简史》编委会，2003：32-33）

在三区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乌斯满开始同国民党方面暗自勾结。国民党军方先后两次援助了大量的步枪、轻机枪、子弹，还有一部电台（配备三人同往）。联合政府成立，乌斯满被任为省府委员兼阿勒泰专区专员。乌斯满与国民党的勾结引起了三区方面的强烈不满。1947年2月，伊犁政府撤销了乌斯满的职务，任命达列里汗为阿勒泰专员，并出动三个骑兵团，由当时的民族军副总指挥伊斯拉克别克指挥进兵阿勒泰。乌斯满每战必败，4月退败库尔图。为此，联合政府曾派行政调查团前往调查，阿勒泰群众向调查团愤怒揭露乌斯满匪帮至少7000只羊和3000只大牲畜，使20000多人无法生活的罪行，一致拒绝乌斯满回阿勒泰，强烈要求省政府给予严惩。当时乌斯满处于孤立的境地，即使他手下的阿德里汗等11名部落头目所管辖的1000多户群众，也反对乌斯满的领导。但由于宋希濂的支持，不仅使人民要求严惩乌斯满的愿望落空了，而且使其得以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杨策，2007：270）

不几天，乌斯满的代表又向刘孟纯单独谈了两点，（一）苏联借口和盛世才签订的条约，派了一批人到富蕴县开采钨矿，有近百辆卡车昼夜不息地在装运矿石，乌斯满想用武力驱逐；（二）请求迅速以边卡部队名义，派部队往阿山区支援，并接济枪械弹药。宋希濂、刘孟纯等力主充分利用阿山与伊犁之矛盾，尽可能接济乌斯满，但无须直接派兵进入阿山区，因为根据和平条款，这个问题属于三区问题的一部分，需与三区军队改编问题同时解决，至于苏联开采富蕴钨矿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慎重处理，切不可采取武力行动。张治中怕支持乌斯满会引起阿合买提江等人的反对，发生摩擦，因而曾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给了一些物资和武器，于8月26日让乌斯满的代表带回。

9月3日，乌斯满派的第二个代表拉提甫，到迪化向张治中提出更具体的五项要求：（一）请政府派军队开入阿山区；（二）请接济枪支一、二千支；（三）请派代表和电台常驻阿山区；（四）请将阿山区之经费直接拨给；（五）请省府拨发粮食、布匹、茶叶等。此外，乌斯满还要求政府授予他统治全新疆的宗教权，并封他世袭王位。对此，张治中召集有关方面多次商讨，决定改变先前之犹豫态度，尽可能予以支持。他指示刘孟纯把阿山区专员公署的行政费直接发给，不再经过伊犁方面转发，把阿山行政区的专员印信交代表带去，并拨发阿山专员公署一部分布匹、茶叶及其他日用品等。同时，张治中又指示陶峙岳和宋希濂，发给乌斯满部步枪、轻机枪、弹药和电台，以便随时联络。至于对乌斯满要求授予全疆的宗教权和世袭王位一事，张治中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表现，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封建部落式酋长人物”，是“草莽英雄”、“土皇帝”，而予以拒绝。国民党对乌斯满的支持，是联合省政府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方面利用和支援乌斯满的行动尽管十分机密，但不可能不为伊犁方面所知。1946年10月26日，在张治中、麦斯武德、阿合买提江联名邀请一千余名各族代表的座谈会上，就有人质问张治中阿山为什么派代表到迪化来？谈了些什么？结果怎样？张



治中矢口否认对乌斯满的支持，并斥提问者“造谣诽谤，挑拨离间”、“信口雌黄”。1947年12月9日，张治中在给阿合买提江和赖希木江的信中又说：“你们说我方曾经对乌斯满给予军事上的援助，那是完全与事实不将的”。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支持乌斯满，还支持沙湾县长哈里拜克骚扰三区。哈里拜克投靠国民党后，率众窜入沙湾县南山中，对三区进行骚扰和抢劫。乌斯满和哈里拜克这两股土匪对人民烧杀虏掠，无恶不作。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保护人民生命财产，1947年2月，来自伊犁、塔城的民族军三个骑兵团，在副司令伊斯哈克别克指挥下，向阿山乌斯满部进击。当时乌斯满只有一千左右人马，抵挡不住民族军的锐攻，用电台不断向迪化求援。国民党企图利用乌斯满与伊犁方面的厮杀互相削弱，没有出兵援助，只是从驻奇台的骑一师中抽出一个连（马希珍连）进驻北塔山侦察作战情况，并与乌部取得联系；如果民族军从阿山区东部南下进攻奇台，可先在北塔山抵挡一阵。

乌斯满战事不利，2月间退出承化，至清河以北的温都哈拉附近，3月，又退至库尔团，4月中旬，再退至大石头、北塔山附近。宋希濂电告马希珍与乌斯满联系。并予以必要支援；又致电乌斯满，慰勉有嘉，闻其暂时就地整休，不要急图反攻，所需粮秣及日用品当迅即救济，并要他尽可能地侦察伊方军事行动，随时电告。伊犁方面在军事上打击乌斯满的同时，又撤销了他的阿山区专员职务，派达里力汗继任。与此同时，三区又于1947年11月30日打垮了哈里拜克；其残部逃到了巴里坤。

省政府为了解事情真相，并打算说服伊宁方面让乌斯满返回阿山任职，遂派包尔汉、党必刚等人组成调查团前往承化。4月4日至8日，调查团在五天中作了大量调查，带回了大批控告乌斯满罪行的信件，并集中民意，要求撤销乌斯满的专员职务，交给人民公审，但省府对此置之不理。在反动派的支持下，乌斯满部于1947年8、9月间，把阿山地方政府彻底捣毁，抢去了机关中的全部物资，杀死了大批无辜牧民，抢走了他们的大批牲畜。阿合买提江等在1948年2月17日给张治中的信中，充分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和乌斯满、哈里拜克洗劫三区的罪行，指出：“对这件事是不能再忍耐了，应该将乌斯满及其亲近的伙伴从速管押，同时为了他们无数的残暴行为，应由阿山人民自行公正处理，应该把他们交给阿山的政府机关。”阿合买提江还在1948年10月《同盟》杂志上，愤怒地控诉了乌斯满的罪行，列举了阿山区所遭到的惨重损失：人民财产损失达一百零五亿七千五百二十六万七千七百三十一元新币，政府机关损失达二十九亿四千二百三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九元新币。受难户三千六百六十四户，人口一万七千八百十三人，被劫走马三千八百四十二匹，牛六千五百五十五头，羊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只。（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479-482）

“三区”政府任命及撤销乌斯满的阿山专员一职，是基于乌斯满的“匪行”、“与国民党勾结”等原因。以此产生的历史记忆对于“土匪”乌斯满行径的描述使自身决策的合理性得到解释。

（五）北塔山事件：国家利益还是自卫反击？

“北塔山事件”是外蒙军队入侵新疆北塔山引发的一场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国民党却利用该事件反苏反共反三区革命。“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迪化分社发了夸大其词的消息，内地各报争相转载。《大公报》、《申报》的文章称该事件是“伊方（指三区）仿吴三桂借兵故伎，意欲假外蒙军之手消灭乌斯满”。宋希濂等亦认为该事件是伊、蒙配合，目的在于消灭乌斯满的势力；是要胁迫国民党答应伊方所提各项条件最终驱逐国民党军队出新疆。（宋希濂，《北塔山事件的实况与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34）

可见，国民党方面有意将“北塔山事件”和三区方面扯在一起，矛头针对三区革命。时值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屡遭失败，全国各地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不断



高涨，为转移大众视线，国民党对“北塔山事件”大肆渲染，《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称“北塔山事件”是所谓“西北的‘九一八’”；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外交部长王世杰电令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并通过苏联向外蒙古提出严重抗议。蒋介石决定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到新疆视察，但被张治中回绝。同年6月至9月，美国和法国新闻记者罗伯逊、麦斯特逊、兰德、派克(女)、沙瓦莱力等云集迪化采访，有的还去了北塔山。

乌斯满在北塔山一带得到宋希濂的支持。被民族军打败的乌斯满退至大石头和乌龙布拉克一带，“这两个地方均在北塔山西端，距离骑一师马希珍连据守的阵地约有20多公里。我(宋希濂)当电飭马连长与乌斯满密切联系，并予以必要支援。同时我又电知派在乌部工作人员转告乌斯满，表示慰勉”。(宋希濂《北塔山事件的实况与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29)在国民党支持下，同年8月下旬乌期满向阿山民族军反攻，占领了青河、富蕴，9月中旬占领承化(阿勒泰)，后又攻占了哈巴河、布尔津等。三区民族军不得不再次向阿山进军讨伐乌期满，经过激战，再度战胜乌期满，将其逐出阿山地区。11月下旬，民族军还击败了与三区对抗的沙湾县长哈里别克、警察局长塔曼克。(陈慧生、陈超，1999：425-427)

1947年6月，新疆又发生了北塔山事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别有用心地渲染，北塔山事件一时成了国际上瞩目的事件。在解放区战场上的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开动全国宣传机器，力图扩大这一事件，转移人民视线，引起国际关注，打击苏联和中共力量(在新疆则是打击三区革命力量)，以争取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苏势力的同情和支持。

前已说过，乌斯满在四月中旬退居于大石头、北塔山附近，继续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援助，并准备向伊宁方面进击。5月，乌斯满部进入蒙古境内，捕去蒙古兵八名；骑五军一师(师长韩有文)二团(团长韩藩)所属马希珍连在驻地北塔山执勤时，又与蒙军发生遭遇战，对此蒙古边防军发出通牒，称“五月十二日有汉哈部队非法越过蒙境白特色同山，并捕去蒙古兵八名，这是破坏蒙古边防和中蒙友好的行为，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把驻在刀塔头尔特山东北对山胡芝尔特河上的野营撤退，并交还失踪的士兵马匹，否则应由该连长负责。”驻在奇台的韩有文市长命令将蒙古兵放回。

当晚，马希珍即向军长电告冲突经过，电文中指明那四架飞机是苏联飞机。6月6日清晨，宋希濂根据马呈祥的报告，立即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一)命驻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即率该团主力(留一个连在奇台北面担任警戒)前往北塔山增援；(二)派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前往奇台负责办理对北塔山部队的补给事宜，抽调一个汽车连(卡车十多辆和一个骆驼大队)并组织当地的一部分大车，专任运输；(三)命骑五军驻在迪化附近的部队，立即调一个团开往阜康，筹备支援奇台方面；(四)为预防伊、蒙互相勾结向我大举进犯，立即命令各部队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五)组织一个参谋组(由总部及骑五军参谋人员组成)前往北塔山了解情况，并调查自奇台至北塔山一带的军事地理；(六)嘉奖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马希珍连，发给该连官兵奖金；(七)将蒙古军队向我进犯情形分别电告南京国防部及兰州西北行辕。

宋希濂在作了如上部署后，又去见张治中等。他们分析，蒙古的军事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配合伊方消灭乌斯满势力；二是在消灭乌斯满部后，由北塔山南下，袭扰奇台、镇西、七角井一带，截断甘新交通线，然后从玛纳斯河发动攻击，胁迫国民党答应伊方所提各项条件，最终驱逐国民党军队出新疆，达到他们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目的。宋希濂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蒙军在6月6日进行了一天的调整和准备后，于7日晨8时重新发动进攻，先是飞机侦察、轰炸，继之以大炮轰击阵地，随后步兵在重机枪掩护下向驻军阵地突击。马希



珍士兵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奋力反击；乌斯满也率部参战，战斗持续到黄昏。次日，蒙军又发起进攻。这时骑二团援军已陆续赶到，午后开始反攻，蒙军撤退到北塔山边高地。几天来，蒙军被打死三十余人，受伤人数约百人左右；驻军共伤亡二十余人，损失军马十多匹。

事件发生之初，国民党中央社迪化分社发出夸大其词的消息：“顷由军事方面证实，苏联飞机四架，于（6月）5日中午轰炸我北塔山驻防国军，并掩护外蒙军队向该地驻军进攻，飞机低飞轰炸扫射，投弹甚多，我军民死伤颇重。现外蒙骑兵两营已侵入新疆境内六百华里，正与我守军激战中。”蒋介石得到来自国防部的电报后，决定利用这次事件，开动全国宣传机器，把矛头指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以转移全国人民的故意力，掩盖其在内战中的失败。蒋介石自从1946年7月发动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一年以来军事上遭到惨败。人民解放军共歼灭了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在经济上，由于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大规模掠夺和国民党四大家族对财富的榨取，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国民经济达到总危机和总崩溃的阶段，反对美蒋统治的斗争遍及全国城乡，学生界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反对腐朽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全国范围内革命时机成熟。为了摆脱困境，转移目标，反苏反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指示《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报转载上述消息，发表反苏社论，称北塔山事件为“西北的九一八”。国民党中央党部指示各地的所谓“民意机关”、“社会团体”等纷纷发出通电，要求中央采取强硬外交政策。6月12日，蒋介石又决定派著名的反共反苏人物、国防部长白崇禧专程去北塔山视察，在新疆制造反苏局势，受到张治中的抵制。国民党外交部又分别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严重抗议。苏联政府于1947年6月21日，由其驻华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递交南京外交部复文一件，否认苏联政府参与北塔山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于6月22日，由其驻莫斯科公使以复文交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坚持北塔山系蒙古疆界，抗议中国军队侵入蒙境。

国民党政府还为美国领事和新闻、报刊记者提供条件，制造反苏舆论。美国驻迪化领事马克南在乌斯满的陪同下，亲上北塔山最高峰绘制地图。1947年6月至9月，先后有美国国际新闻处记者罗伯逊、美联社记者麦斯特逊、《纽约每日报》女记者派克、《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兰德、德新社记者沙瓦莱力等人到迪化采访消息，有的还去过北塔山。（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488-493）

对于北塔山事件而言，与还原历史真实相比，历史记忆的重点更偏向国民党政府以转移国内焦点为目的对于乌斯满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塑造：对蒙军的自卫反击上升至为了国家利益、保卫边疆的“英雄”。这样就体现出国民党政府对于北塔山事件本身的捏造与夸大。

（六）新疆和平解放：败后东逃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了尾声，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党中央对于解放新疆进行了周密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进军，最终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迈开了新的步伐。但与此同时，美国策动了反革命武装暴乱，美国派驻迪化代表会见乌斯满，并亲自布置了暴乱计划。

与国民党顽固派和国外反华势力纠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有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在哈密、镇西、伊吾等地胁迫两万余名哈萨克族牧民暴乱；乌拉孜拜、司的克等胁迫万余名哈萨克族牧民暴乱。乌斯满叛乱，得到美国及国民党势力的支持。美国驻迪化领事曾派克斯顿和副领事马克南在新疆解放前夕，直接与乌斯满等接触，鼓动其对抗新疆和平解放，许诺供给其武装装备。

从1950年3-12月，乌斯满等在昌吉、呼图壁、玛纳斯、阜康、奇台、吉木萨尔、

木垒、哈密、巴里坤、伊吾、乌鲁木齐南山等地发动叛乱；乌拉孜拜、司的克等在绥来（今玛纳斯）、景化（今呼图壁）胁迫万余名哈萨克牧民暴动。1951年2月，乌斯满被人民解放军捕获；9月，贾尼木汗、乌拉孜拜、司的克等先后落网。乌斯满等匪首被惩处，叛乱被平息，其残余势力的分裂叛乱活动一直延续至1958年。这股势力被清除以后，北疆地区的社会才得以稳定。（陈超，2009：22-23）

新疆和平解放后，趁我忙于建党建政，恢复生产之机，1950年3月，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勾结起义部队中少数反动军官、特务分子和少数部落头目，制造暴乱，到处抢劫、烧杀、残害人民。这些土匪来势凶猛，利用宗教欺骗群众，煽动民族对立，裹挟上万牧民，流窜于迪化、哈密、阿山一带牧区，并袭击驻守哈密东北的解放军，围攻伊吾县城。据不完全统计，这几股叛乱土匪仅2月上旬到4月初，就杀害地方干部及群众130余人，金银近500两，衣物800多件，烧毁汽车7辆，房屋40多间。各族人民纷纷要求党和人民政府为民除害。

新疆军区迅速组建了剿匪指挥部，王震任总司令，北疆前线指挥由六军军长罗元发担任，剿匪部队以六军为主。为保卫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社会秩序，1950年3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根据《施政方针》发布了治理社会秩序布告，要求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帮助军队肃清叛匪。从1950年3月起，驻疆人民解放军陆续投入3个营、8个连，16辆战车共3000余人参加剿匪。首先歼灭了窜扰奇台县东北牧场的叛军，粉碎叛军企图与乌斯满、尧乐博斯联合的计划。接着兵分两路，奔袭乌斯满匪帮的老巢红柳峡。乌斯满带领残兵逃入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企图与天山格尔达坂的乌拉孜拜匪帮会合。此时，乌拉孜拜已被另一支解放军歼灭。尧乐博斯则流窜至伊吾，疯狂围攻伊吾县城，并把县城群众劫持到山上。驻守伊吾的我解放军第十六师四十六团二连指战员，在著名战斗英雄胡青山指挥下，同数倍于己的匪徒浴血奋战40天，保卫了伊吾，牵制了敌人。至我增援部队赶到后，歼灭了尧乐博斯匪帮，尧乐博斯只身逃窜。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授予保卫伊吾部队“钢铁二连”的英雄称号。

匪帮主力被歼后，乌斯满、贾尼木汗在哈密大红柳峡一带集结残兵，准备从甘肃、青海逃亡印度。解放军沿途截击、活捉了贾尼木汗。乌斯满率残部500余人逃入甘肃境内，1951年3月被解放军围歼，匪首乌斯满被活捉。与此同时，新疆军区还奉命派出骑兵团至青海铁木里克和西藏阿里地区，围剿哈利伯克、胡赛因残匪。

1951年，乌斯满长子谢尔德曼，不甘心失败，在镇西县北山集结残匪，并在木垒县三泉子、阜康、阿山等地抢劫。人民解放军组织4个步兵支队和一个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进行围剿。在人民解放军的围剿下，谢尔德曼于1951年9月投降，并得到了宽大处理。至此，在新疆历时两年七个月的交费斗争基本结束。

在剿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军事围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区分匪首与胁从、反动头人与一般的部落头目，对广大受欺骗、裹挟的哈萨克牧民，始终坚持团结原则，帮助他们摆脱土匪控制，让他们带回各自的牲畜、财物，重建家园。新疆军区在剿匪中还组织工作团，携带粮食、茶叶、布匹药品等受土匪洗劫的农牧区慰问，进行救济，帮助农牧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据统计，在剿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小120余次战斗，解放被裹挟的牧民3.1万余人，夺回被抢劫的牲畜17万头。

剿匪的胜利，使长期危害北疆地区的匪患得以消除，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牧区，对安定新疆社会起了重要作用。（《当代新疆简史》编委会，2003：94-96）

1951年春，根据中央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在全疆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正确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重点打击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子，摧毁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取缔了一些



反动道门，惩办了一批反革命首恶分子。在处理少数民族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时，还注意通过少数民族干部和代表人物做工作，召开阿訇及各民主团体会议进行宣传教育。1951年4月29日迪化市各界召开了8万多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将杀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及中共党员毛泽民、林路基等烈士的凶手李英奇、富宝廉以及土匪头子乌斯满，处以死刑，执行枪决。（《当代新疆简史》编委会，2003：96-97）

正当新疆的和平起义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之际，美国策反了反革命武装暴乱。美国驻迪化领事巴懋勋（派克斯顿）会见了乌斯满，并亲自布置了暴乱计划。副领事马克南给乌斯满发放了武器、炸药、电报机和活动经费。1949年8月，他们在切别河上游的渠根大夏季牧场乌斯满的家里，举行了有15人参加、为期3天的会议，策划煽动迪化及附近各地哈萨克族叛乱。他们的计划是：由贾尼木汗等负责指挥昌吉、呼图壁一带的叛乱；由萨力士等负责指挥迪化南山一带的叛乱；由乌斯满等人负责指挥吉木萨尔、奇台、木垒一带的叛乱。会后不久，贾尼木汗胁迫迪化南山一部分牧民，把南山官牧场约3000只羊全部赶走，跑到乌斯满那里去了。9月，马克南窜到巴里坤的山里，召开了民族主义分子首脑会议，作了关于扩大反革命暴乱的详细指示，并要求乌斯满与尧乐博斯（时任哈密专员，哈萨克族）、贾尼木汗、萨力士等联合。同时，还布置了大批特务分子潜伏下来，伺机而动。他们的种种反革命阴谋都被粉碎了。新疆实现和平后，乌斯满等继续作乱，乌斯满、贾尼木汗受到人民的惩罚，萨力士死于逃往国外的途中。（杨策，2007：274-275）

由于新疆是和平解放，在社会大变革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地仍有少数顽固分子妄图依靠境外帝国主义势力，用武装暴乱的手段对抗新疆和平解放。主要有：1950年3月-1951年9月发生在昌吉、奇台、哈密等地的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为首的武装暴乱；1950年7-11月，乌拉孜拜登为响应乌斯满暴乱，在绥来（今玛纳斯县）、景化（今呼图壁县）、昌吉及乌鲁木齐南山一带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1-9月乌斯满的亲信胡赛因、哈利伯克等在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3月-1952年9月乌斯满之子谢尔德曼在镇西（今巴里坤县）、奇台、孚远（今吉木萨尔县）、木垒县一带发生的武装暴乱。

这些武装暴乱主要由乌斯满及其亲信策动，时间较为集中，暴乱的地域也主要在新疆东部的山区和牧区。暴乱分子流动性大，往往波及数县，且带有土匪流动抢劫的性质；首恶往往以氏族部落为单位，以教规为纪律，裹挟成千上万的牧民跟随其暴乱；此外，牧民手中保留了较多的枪支，暴乱团伙武器有来源，由此给局部牧区的社会稳定和畜牧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武装暴乱也提出了个别分裂性质的口号，如1950年乌拉孜拜在暴乱前即叫嚣要“赶走汉人、赶走解放军”，建立“哈萨克斯坦”，但从乌斯满及其亲信所策动的武装暴乱的整体看，其主要性质就是反对和阻挠新疆和平解放。对暴乱的围剿和平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斗争的继续，是推进新疆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乌斯满及其亲信策动的武装暴乱平息后，对于投诚的重要人员，人民政府根据党的政策分别予以适当的安置。（厉声，2006：293）

“土匪”乌斯满受国民党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的煽动发起武装叛乱，阻碍新疆和平解放进程。他不仅要“赶走汉人”、“赶走解放军”，甚至要“建立哈萨克斯坦”。逆历史潮流的乌斯满一路东逃，在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记忆中，以“叛逃”、“被剿”、“死刑”的形象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民国记忆：民国1929-1999年

民国时期的历史记忆主要包括1921年-1949年间的民国政府档案、报纸新闻稿件等。这些文



本的书写时间均为1949年之前，符合民国记忆的划分标准。

1949年10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华民国的统治。国民党撤至台湾时，将不少档案资料等文献资料一并带走；并且，在时间记忆、政治诉求上也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准则。因此，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也生产了部分延续民国历史观的历史文本，其中包括文史档案及学术研究成果等。与此同时，1949年之后，国内经过搜集、整理，也出版了部分书写于1949年之前的文史资料。本研究将这两种历史文本也归入民国时期的历史记忆范畴之内。

民国时期的新疆研究以现代区域研究为主，在中苏关系研究、边疆研究中也有一部分成果，但没有“三区革命”专题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国时期对于历史真实结构角度的不同所造成的。有关乌斯满的历史记忆主要出现在新疆地方史、档案资料汇编及报纸杂志等中。因此，对于民国时期的乌斯满历史记忆的考查，笔者以时间发展为序，通过阿山起义、北塔山事件及解放军入疆的历史文本内容进行“回忆”。在分析方法上，也是通过分析文本中描述的乌斯满社会身份、行为取向的逻辑结构，理解民国时期历史记忆中乌斯满被“记忆”的过程。

（一）起义中的土匪

阿山事变第一、二次均告失败，许多反盛领袖多被拘押。前两次事变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义者为了身家性命和利益的反抗运动。第三次的事变，便充分证明已含有外力掺杂其间了。当时，乌斯满于第二次叛乱失败后，曾于民国三十年率领着哈萨克十余人，枪四、五支在青河及北沙窝一带以劫掠为生；并到处裹挟哈萨克牧民，手段是卑鄙的，先抢游牧的牲畜，继之掠夺哈族眷属，强迫游牧的壮丁参加。至该年秋裹胁渐众。省府派兵进剿不支溃窜。但过去曾经参加暴动的头目多与乌互通声息，清剿部队因在游牧中拘捕通叛份子，哈民均怀恐惧，最后因沙以甫（海里力台吉第三子），纠众拒捕，即引起哈民叛变。乌氏此时率着大小头目逃到外蒙边境的布尔根河上游，盛氏势力不及的地方。布尔根本系新疆的一部，前曾论及于民国被外蒙划入科布多及颜巴乌康吉两个马克以内，虽然当时新省政府派沙里福汗行政长及秘书长满凯向外蒙交涉，又与外蒙科布多行政长贡布在岳而毛草原会议，但终于在外蒙坚持系外蒙领土无法归还。此一空虚的三角地道，乌斯满率大小头目逃亡后，苏俄格外垂涎这哈萨克新生的民族英雄，遂促使外蒙派员向其联络，共有三次乌斯满未有表示其今后动向。盛世才也于第一次派卡提力克里木，第二次派哈提目哈皮都拉，第三次派哈提木热海木、扎里木劝其交出武器，乌氏均严加拒绝，最后却欲派兵捉捕，乌率苏来满等六人逃往外蒙边界住了八个多月，时已到民国三十一年春。时逢国际情势转变，盛苏交恶，在新疆的顾问专家等均对盛世才敌视，乌也与外蒙的边卡队长冲突，捕获了外蒙的士兵两名，外蒙为报复乌斯满的野蛮，于是开到大批的军队围剿，乌氏战败被捕押到外蒙去，被囚囚达四个月之久，到三十一年七月被释，经过此一风波后，乌斯满反变成了外蒙古的友人，苏俄的工具。

按理，乌斯满与外蒙和好，应当是和乐相处的，但他的英雄色彩浓厚，又返到二尺子河岸与由富蕴回来的苏俄矿工接洽，要求援助枪支，苏俄矿工答复他容后再说，他又迫不及待的带人深入外梦境，打死四个外蒙兵，抢来四支步枪，外蒙又派两名代表与乌斯满谈判，乌斯满又将外蒙的两个代表扣押，马枪均经没收，令其徒步返回。第二次外蒙又派莫里合部落的人哈木哈什前来与乌再度交涉，乌也派四人代表到外蒙去。

后来这四个人带回来四支枪，乌斯满第三次亲自带领六十人到布尔根地方与外蒙军官及苏联教官尔孜伊洛夫相见（该军官过去因公到过新疆），又与外蒙长官莫牙而及哈萨克斯坦首领那司而汗相见，并在那里住了一天返回。当时苏俄教官曾在宴会上对乌斯满说：

“苏联向来是愿意援助弱小民族的国家，并且列宁有遗嘱援助东方之弱小民族之训示，我们乘着列宁遗嘱并根据国家援助东方弱小民族的原则，愿意援助像你们这种受



汉族压迫而要求解放的弱小民族。同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任务，所以你们要多少支枪，我们便给你们多少枪支。……”外蒙首领莫牙而及哈萨克斯坦首领那司而汗向乌斯满也曾云：

“外蒙苏维埃政府是与苏联一样也是民主国家，同时哈族与蒙族都是游牧生活，而且我们又有血统关系，所以我们愿意帮助要求本民族自由的人士。由查尔努尔昆山起一直到哈拉马勒哈腾沃巴吉尔纳尔止，过去都是外蒙的地方，不过到后来被汉人占据去了。也就是说阿山也是我们的地方，我们为了收复疆土，牺牲我们的生命财产在所不惜。”

苏俄教官又说：

“现在全疆人民都知道了你的勇敢，将来援助你的人一定很多，你的前途是很光明的，要从现在起发展你的事业，扩大你的范围……。”

此次乌与外蒙签订了协定，该协定有蒙哈文二种，其内容如下：

“（一）外蒙向乌斯满所提出之要求：

（1）要求乌斯满派其子谢里曼及其弟哈巴斯并其伙伴艾里克山得开（归化人）赴外蒙留学。

（2）要求乌部所有游牧眷属牲畜财产越过外蒙界，其本人回阿山领导下对新疆政府作战，并保证过界之眷属牲畜财产由外蒙代管。

（3）要求乌斯满向外蒙聘请顾问一人，军队二百人。

（4）要求乌斯满将哈腾沃巴一带划归外蒙并在外蒙政府援助之下由乌自己管治阿山。

（5）为外蒙军队前来驻扎便利起见，要求乌斯满占领青格里河、富蕴两县交外蒙军队驻扎。

（6）要求乌斯满个人到阿山七县地方去进行吸收民众工作并普遍的攻击阿山。

（二）乌斯满要求外蒙苏维埃政府意见：

（1）乌斯满将全哈腾沃巴交给外蒙，以后要求外蒙政府不要阻碍乌所管辖游牧之宗教（阿山游牧之宗教）。

（2）要求外蒙政府不要在阿山实行共产主义及没收财产。

（3）要求外蒙政府不要逮捕哈族头目。

（4）要求外蒙政府乌斯满需要多少枪支就供给多少枪支。

（5）要求外蒙政府如果乌斯满能够将全阿山征服，则需许可乌自行管理，亦需管理其他。”

此一条件签订后，虽然外蒙给了些枪支；但乌斯满对外蒙要求之一、三、五项等均未实施，而外蒙又要求乌斯满去开会，其获得枪支后，即准备倡乱。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苏俄又直接邀请乌斯满，到哈拉额尔齐斯河东吉别提地方洽谈，请其勿阻苏俄考察团的汽车，并送乌氏许多礼物又鼓吹乌的革命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乌斯满于三十二年六月同达里力汗等开始叛乱时，起初仅十余人。后潜至二台山中，乌与二台警所所长长杯酒交饮，表示毫无他意。一天晚上乘其不备，袭击警所，全部警员被害，二十余枝步枪被劫去，在黑夜仅一马夫逃命。盛世才闻变，急派奇台驻军进剿，又损失步枪二十余枝，轻机枪二挺。更在迪化续组保安大队三百余人（一律犯人），前去游击，这些久经押解的犯人，一旦发放对哈民不分良莠一齐捕杀，反更激起哈民的怒火，霎时间聚齐二三千人公开的向政府军开仗。到是年九月十三日乌氏又以马匹一百八十四，沙金五两，毯子十八条，自外蒙换来三八式步枪三十八枝，弹药六箱，匣枪六枝，白洋布六十尺。外蒙派将官马克吉协助乌斯满成立“阿尔泰哈族复兴委员会”，并



征兵四百名，成立司令部，以苏鲁巴依为司令，旋又协助连珠枪三百五十枝，机枪三十挺，手提机枪七十挺。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民政各部、总司令部属于委员会下，将哈族编成十个大队，配合着各种轻重武器势力为之大增。当时乌斯满曾有致哈萨克牧民的公开信件这样说：

“一起生长的亲戚和老少近人，

写此信的原因，因为各位牧民给我英雄的名义，在这四五年以来，白天不疏懈，夜里不睡觉，冬天受冻，夏季受热，睡的时候铺以马毡，枕以高石，着靴渡河整日与敌人战斗，我并不是为了私人利益，或者政府逮捕我来斗争，是为着牧民大众的利益而战斗。

十一年来督办统治全疆，实行六大政策，宣传哈族和其他各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同时说组织好的地方政府，派好人来管理。并且组织军队保障宗教及私有财产，提高文化，减少纳税，改良牲畜。十年来哈民从没有反抗政府的，但是现在看一看，政府所作的，都与所说的相反，政府以坏人把持地方政府，逮捕好的头目。不但不组织哈族军队，而且还缴了哈族人的枪；不但不保障宗教，反而破坏了我们的礼拜寺，逮捕哈族的阿吉、毛拉，捐税有价无减。不但不改良牲畜，反而随便使用哈族人的牲畜，牧区商人少了，私人财产也没收了，我们并不是牲畜，是同任何民族一样的人，看一看督办的言不顾行，怎不叫我们为哈族的利益而战斗呢？

我对管辖的军队牧民，现在提出的主张是：

1. 争取自由，挽救哈族的危机。
2. 阿山东部各县由哈族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组织政府。
3. 阿山区组织哈族军队。
4. 释放被捕的人。
5. 禁止政府随便动用牧民的牲畜。
6. 禁止苛捐杂税。
7. 阿山禁止汉人居住，和禁止汉族军队驻扎。
8. 从前做邻居亲善的国家仍要用土产换布匹迅速运到此地，并准许商人经商。

以上是我们的主张，能否贯彻，还在你们牧民的身上，争取民族利益的英雄随我来，快骑马拿武器来，不然就违背了我们祖宗留下的风俗习惯，我上天，你们是我的翅膀，我下地你们是我的尾巴，一个土地，一起生长的亲爱牧民，你们的任务是：（1）忠实诚恳参加我部，（2）全体反对汉族人，不借给他们马匹骆驼，不执行汉族人的指示，同时把汉族军队的情形随时报告我部。

写信人 英雄将官 乌斯满印”

这真是一篇卧薪尝胆的文告，也是他的心声，哈萨克民族的呼声。当时他们确实是太痛苦了，曾有哈族木海与警察局曹局长的信中也说：

“现在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说明我并不是想消减政府，而是恨乌斯满的，牲畜才信仰乌斯满的，才向政府军打枪的。因此我们游牧，如回来怕乌斯满枪决和抢劫，我们如投诚又恐怕他们抢我的牲畜，我们附匪的原因是为了保护青河的游牧，我们现在的要求释放被捕的人，人名列下：

（1）布开汗扎愣，（2）阿克木，（3）哈山，（4）哈叶木毛拉，（5）木哈特，（6）哈吉，（7）木合买提，（8）阿布都拉，（9）沙铁列汗，（10）努尔尼尼哈拜，（11）木沙衣天臧根，（12）扎尔和木，（13）索台，（14）达来汗，（15）哈的斯汗，恳请将以上的人释放，不要到我这里来见面。

第二个要求是：政府暂时不要收我们的枪，因为我们无枪，乌匪来了非把我们枪决



不可。希望政府原谅我们的错误……。”，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乌斯满的意图，他是不分良莠一齐裹挟抢光，若不参加，诚如乌斯满说：“抢光牲畜自然也革命了”。（张大军，1980：5187-5195）

自从奇台派去的一连兵力和组织的犯人保安大队进剿失败后，鉴于乌斯满的势力已不可辱，于是不得不改变进剿计划，因为当时乌斯满的部队在清河、富蕴、承化三县的山地一带盘踞，此剿彼出，飘忽不定，难以消灭其主要的部队。当时，除令承化的宛凌云司令和彭专员等相继进剿外，又因春夏之际不宜大批的军队集中，遂决定于秋冬游牧向冬窝移动时，一举歼灭。所以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以后，部队先后向指定地点乌伦河集中，共动员第一二八师的三个营（张学高等营）及一个特务连，工兵一排，迫击炮一排。暂编第三师的两个营（昌生祥等营）三个骑兵团（骑兵三十一团李贵，三十二团戴奎一，内一团专负押运之责），两个步兵营，四个保安大队（第一、二、三、四大队）炮兵一连，坦克车一排。飞机一架，警察队及民国（约三百余人），以上计正规军二千一百七十四员名，地方军一千四百七十一员名共四千六百四十五员名。主力部队于十月二十五日集中完竣，十月三十日由柳振欣指挥官率领向哈拉春克前进，乌部已渐由盘踞苦而图一带向福海方向乌河两岸移动，部队由十一月十六日由哈拉春克向乌河之云都哈拉前进，于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两日近迫于多罗鄂木及哈拉布鲁公一带双方展开激战，均有斩获。当时据传乌斯满负伤，柳又令驻防福海之曹团形成对乌包围态势，乌于二十四日黑夜向乌河以南沙窝地带逃窜，其余均纷纷投诚，又加飞机轰炸，乌于十二月八日便逃至布尔根河与乌河汇流处一带。

当时柳振欣率所部追击，到乌河弯曲部又令清河之保安第三大队进出于布尔根河予以截击，同时散发传单，劝其投诚。

在哈萨克文传单中称：

“各位善良的牧民们：我们要想避免这空前的浩劫，全家安居乐业，重过幸福康乐的游牧生活，必需要：

- (1) 帮助政府剿办乌匪。
- (2) 被乌匪裹挟的良善牧民，赶快弃匪归家，过团聚的日子。
- (3) 打击哈民公敌的匪徒乌斯满，携枪投诚政府军队，才是真正英雄。
- (4) 将乌斯满行动随时报告政府军队才真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 (5) 拥护政府，建设新疆才是国家的良民。
- (6) 笃行宗教，严守教规，才在忠实的教徒。

本指挥官奉命剿办乌匪，职在保护牧民，所以不惮繁琐，投诚相告，希望我全体哈族同胞，共体斯旨，切实遵行，倘有勾结匪徒，破坏宗教，违背国家利益者，一经察觉当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令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也。

指挥官 柳振欣印”

同时又电驻大石头的骑兵第三十一团李贵团团长，星爷赶赴红山头截击终于三十一前到达，十时电到，李贵已睡，传令兵将电报放于李之枕旁，拂晓叛民已窜至银牛，继之清河，虽有接触但很快便退向外蒙去了。柳振欣虽论继续追击，盛世才则获得外蒙经过苏俄的授意，向新疆当局警告，伐乱部队倘越过外蒙边界，外蒙必将采取断然行动云云，如此盛世才只有命令停止进军，旅派忠实哈族代表到乌斯满初劝降，然而阿山英雄如何接受投降名义，而甘受盛氏之鞭撻？

此次战后双方均损失甚大，乌部被击毙约二百余人，损失毡房约三百余顶，企图逃往外蒙的哈萨克首目以及民众四十余人也全部被枪杀，同时被裹挟的牧民这时也乘机散逃了。柳军伤亡官兵共八十八员名，阵亡马匹有一百三十余匹，羊有八千余只，马驼



共七百余匹。

到三十三年初春，乌斯满又大举来犯，围攻开清河、富蕴两县，并裹挟大批牧民返回叛区，经省军追击退向布尔根河一带。不意于是年三月二日下午二时，忽有机翼缀五角红星徽号飞机一架，出现于青河县南汇合口盛军驻地的上空，翌晨八时又出现同徽号双翼驱逐飞机一架。三月十一日晨八时三十分，突然来轻轰炸机六架，驱逐机二架，侦察机二架共十架，更番轰炸扫射。到三月十二日晨又来F-5式飞机来炸，当日十二时十四分轰炸机四架投弹并扫射。此后每日多次轰炸，尤以三月十五日，轰炸四小时之久，先后共出现机数达六七十架之多。同时乌斯满也率众三千，杂外蒙军及苏俄军官，如入无人之境，企图歼灭柳振欣部之突围部队。双方经三日夜惨烈激战，处在三千英尺高地上四面受敌的孤军，战到三月二十日，骑兵三十一团，三十二团，暂三师的第七团，三个团的兵力均蒙受了重大牺牲。（张大军，1980：5197-5199）

四月二十三日，守富蕴的孙立动、白铠、翟德发、马沛云等，发现由吐尔公大道乌部向索衣团移动并扬大白旗一面，上书“不怕死之英雄”字样，二十四日上午十时便开始猛攻富蕴县包围西，南北半面。守军告急，盛以无线电指挥要发扬大无畏精神，沉着固守，静待援军等语，二十五日富蕴孙部守东南大山失守（县府东北一千五百公尺），至下午三时则占据第二山激战，乌部以三四百人，轻机枪六七挺、掷弹筒、自动步枪等猛扑。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六时，叛民伤亡三十余名，矿工考察团房屋已放弃，仅固守市区及南岗一带且人数用到十分之九。当时孙部向迪化盛氏呼领请派飞机轰炸，不然，则有全部牺牲可能。盛氏指示：乌河援军即到，如稍有动摇则即被歼灭，应共同死守阵地才是唯一生路云云。二十七日七时十分孙白等又电盛氏云：

“二十六日晚，匪环攻南山，已受压制，是否能救仍不可知，只有尽最后一滴血耳。”盛氏回电中说：“应为国家尽忠，民族尽孝”。

二十八日拂晓匪猛进攻，考察团房屋焚毁，到上午六时，势稍弱，事后则知系派队劫堵援军所致。二十九日敌大队退至五泉沟一带。综上五日之战斗，双方伤亡极大，我方伤亡官兵五十余名，马驼百余匹，武器无算。嗣后调查蒙哈叛军所用之弹药似含有毒质成分。

到五月十八日，暴民又回窜富蕴，占据东南大山三道桥头，西北山及大阪山一带，又来一次环攻迪化是以飞机送去的子弹均投落在敌区附近双方不得利用。此时增援部队已到哈拉春克。又在五泉沟附近与叛民开展。五月二十一日以后富蕴守军尽可能未曾放弃，但弹尽粮绝，无法出击，维族士兵亦大量的搁枪潜逃了。

五月三十日又发现叛民围攻，晨又集中东南大山，并有小口径炮多门攻击，弹下如雨。五月三十一日援军夺回吐尔公，六月二日富蕴之围始解。（张大军，1980：5203）

到五月十九日，伴攻部队已全部占领五泉沟口，但盛氏又令撤回，伴军部队屡进屡退，一直延迟到五月三十日，援军发挥极神速战斗力量夺回吐尔公，留哈拉木墩者系张毅步兵营及徐团的骑兵二连，总共兵力六百人以上，统归张毅指挥。吐尔公攻占后留三十二团阎团全部及昌营全部，共兵力八百人以上统归阎团指挥，并建筑工事。严加驻守。这次富护县能得以保守可谓孙立动、白县长等人之功绩。乌斯满因攻富蕴县未逞，一部退清河，一部窜新金沟，杀汉族金夫三十余名。至于福海县方面，于七月经过阿布拉热苏尔、马拉提等抢劫后，已陷于惊恐氛围内之小城已岌岌可危了。（张大军，1980：5204）

牧民当时目的，是裹挟游牧扩大其范围，拼命打击忠于政府的游牧首领，牲畜被卷走，不能不随着乌斯满倡乱。当时仿佛如烽火一样烧遍了阿山西路，又到天山东路。

在中间承化一带之所以平静的原因，乌斯满鉴于阿山方面的行动虽然顺利；但不甚满意，又派了数股兵力到奇台，木垒河、孚远、阜康、乾德等县抢劫，以至天山东路陷于惊恐、纷乱的局面。（张大军，1980：5212）

前曾提及，在吴忠信未就任新疆省主席以前，阿山已被哈萨克族掀起了倡乱，当时的口号是反对汉人政权，争取民族自由，取消公安局，换言之，是反抗盛氏政权。倡乱的首领是吾斯曼，三十三年六月前，他在阿尔泰山西路各县已扰得鸡犬不宁，大批的游牧壮丁哈族青年都被他强征而去，盘踞在大青河、察汗河、勿实库尔一带，外蒙派军官格赤热而也在勿实库尔担任指挥官。当时乌斯满的计划是进攻承化寺，格赤热而的计划是骚扰迪化的后方，扩大叛乱的范围，当然这不是格赤热而的主张，虽名义上他是外蒙派遣的军官，实际上，莫斯科专在外蒙设有机构，他要听从外蒙的话，于是乌斯满因为仰赖他们接济武器和弹药，也不得不听从格的话。所谓骚乱后方，即是派一部分兵力到阿山东路，由奇台至阿山交通线上的哈萨坟、六棵树一带；一部分兵力直窜天山东路的奇台、阜康、孚远、镇西、哈密一带骚扰，抢劫，动摇迪化的军事准备和行动。（张大军，1980：6313）

蒙哈联军攻击乌河、大不逊两地的信号，使各地的官兵警觉，于是大修碉堡以自卫，因为盛世才的部队作战素不注重防守，均是以强大的兵力做机动战，乌河等地的队伍是中央入新的部队，而且守在万里无人烟的据点上，不修碉堡防守，敌人来攻是无法可以凭借的。各处的碉堡修好后，虽然乌部后来曾数度来攻，因为没有攻击碉堡的武器，所以也未得手。这种攻击的举动，也是苏俄人的一套战略，既然阿山的西路承化附件已被掠得遍地狼烟，牲畜牛马、粮食已抢得精光，而东路各县尚未抢劫，自然，为着使乌斯满的势力扩大，必须使其先向这些地区攻掠，只要得手，那么自然阿山西路承化的守军将必自毙，幸而汤部、夏团的部队能够在艰困中用命，牢守着那几个据点，所以此一计划未有实现。可是后来伊犁地区苏俄已掀起叛乱，阿山的情势更紧，不仅令乌斯满到处抢劫为主，必须正面的截击省方增援承化的军用物资的军车了。（张大军，1980：6315）

果在同年七月四日，有由迪化派第三八四团的范祥力营押送给养的军车赴阿山承化，在哈萨坟遭到乌部的奇袭，范营极力死敌，战争达十余小时，计伤亡官兵四十九名，损失步枪二十余枝，面粉被抢去五千余斤，被打死的士兵，衣服均被哈萨克人剥去，死尸剖开肚子，倒挂在树上，残酷情形惨绝人寰。（张大军，1980：6315）

可是到民国三十三年伊犁情况及阿山东路动乱后，各县为补给阿山的守边军队，不免有些骚乱，但未损元气。同时由于所有的兵力集中在阿山的東西路以应付阿山事变，东路极为空虚，在奇台仅留有骑兵营一个营和两个步兵连，所以到了乌斯满派兵来攻时，便无法应付那飘忽不定的铁骑了。加之，这些游牧民族一旦侵袭到农业民族地区，自然露出了贪婪的天性，说的明显一点，他的军队到东疆农业地区，不仅将蒙哈民族卷走以扩充实力，而且将牧畜抢光，甚至回、维各族的粮食，家禽也不幸免，尤其对于汉人，杀人、放火，珍贵的衣物、钱财都在被卷走之列。（张大军，1980：6319-6320）

十一月中旬，指挥部获得情报，乌斯满急于向外蒙换取武器、弹药，欠外蒙羊十五万只，所以向奇台方面系哈族队伍，向木垒河、镇西方面者系蒙族，到孚远、阜康县者多蒙哈归化族，因而天山东路变成一片糜烂的池沼，奇台四周一直乱到三十四年春，不惟四乡被劫掠一空，而飞机场也遭窜扰，难民聚集在城内，粮食缺乏，疫病流行，自卫队以穷败的枪支保卫着家乡，发挥了极大的力量。

除了奇台县外，在奇台县西的孚远县，因为西联阜康县，东靠奇台，北为北沙窝，南临天山，距天山较近，山内的大东沟便是哈萨克族的冬窝子。本来乌斯满派兵于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窜到奇台北部的沙山子，二十五日至东西地，五马厂，二十六日有一



部窜孚远县南山的泉子街，串通当地哈族叛乱。三十日即到孚远县西三台镇东北约二十五公里的东地一带，以百余人四处劫掠。（张大军，1980：6323）

蒙古头目满金曾携酒到县政府会见朱县长锦泽，流涕淋漓诉说哈族的野蛮的情形云：

“我们不愿附匪，乌斯满我们都知道他是土匪，这点牲畜他都看在眼里。在他部队里有外蒙人，我们游牧里没有坏人；但是没有武器，希望县长发给我们枪支自卫。”

醉中谈话或许是真的，他带着十几岁的儿子，愿交给县政府充国民兵。经朱县长拒绝。允蒙族迁三台镇的庆阳湖，二工河附近驻扎。后来用白马虔敬的将佛像由南山喇嘛召驼下来，供奉在蒙古包里，那种虔敬心情祷告哈萨克不再攻击他们。

到十一月上旬，乌又派第二批苏哈蒙混合军六百余人前来，口号是“蒙哈各族联合起来消灭汉人！”，先行抵孚远县庆阳湖——蒙族的驻地。一群喇嘛由满经率领脱去红袍，捣毁佛像，于十一月四日先攻庆阳湖汉维各族，陷落，又攻三台镇，与警察及自卫队战斗。并将三台北警察所包围，蒙古王宫清亦被暴民勒令牵马，王妃也被拖上白马强行架走，许多蒙古妇女也牵马等候裹掠。（张大军，1980：6324）

事后检讨，这次天山东路各县遭到如此的浩劫，有人谓是将兵力全部调往阿山，后方空虚所使然，事实上，苏俄指使乌斯满有目的的滋扰，也不能不说无因。正由于乌斯满的倡乱有国际背景，更可以查出苏俄对新的政策，过去一向是支持汉人政权压抑土著民族革命，其原因前曾说过，但现在又支持乌斯满倡乱，这是苏俄政策的转变。吴忠信深切的的了解此一阴谋，所以他针对时弊提出各种治新的基本主张，在方法上，是刷新政治，收拾人心并身体力行，不如此，诚无法使新疆走向真正的和平与繁荣。（张大军，1980：6325-6326）

由布尔根南下之匪，分股向沁城、镇西、木垒河、奇台、孚远、阜康、乾德、昌吉各县乡间劫掠财物，裹去哈民数千人与牲畜近二十万头，皆向清河布尔根逃窜，匪首窝斯满并已亲至北沙窝指挥，当时东起奇台、西至乌苏，沿公路各县，交通濒于断绝，前曾叙述其窜扰经过。（张大军，1980：6347）

阿山已被哈萨克族掀起倡乱，牧民起义反抗盛世才的统治；盛世才的地方政权与民国中央相抗衡，因此哈族倡乱实为起义。而起义中哈民却又被乌斯满裹挟，不得不附“匪”求生。哈族起义被土匪乌斯满的倡乱所代替。历史记忆中充斥着掠夺、烧杀的乌斯满匪徒形象。

（二）弃苏投新向中央

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起，大批暴民自东方向承化寺攻击，动则数千，并配有轻重机关枪、小钢炮、迫击炮等。这一批暴民系乌斯满部，此一哈萨克英雄前也提过，吴主席在初期任职时即唱出增进宗教互信，保障宗教自由口号后，乌斯满即有弃暗投明之意，可是其仍充伊犁伪东土共和国的马前卒，主要他是热衷苏俄人的武器。

当时虽未到宰割他的阶段，不过他了解苏俄人不是善良的民族，尤其他与外蒙间发生关系时，苏俄人对他的苛刻要求，以及乌过去反俄的事实，终有一天俄人要结束他的生命，所以他的态度是游离的，以后再述。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率领着大批的哈萨克族围攻承化寺，攻击的猛烈，不像游牧民族的作战，因为他内部是有外人指挥的，可是第一次攻击被驻军击退。同年六月二十日乌又率队猛攻，又被击退，守城的指挥官系盛世才时代的战将宛凌云师长，他不仅有坚强的意志，而且有协调军民的本领，军民能合作一心，固守承化的勇气，最遗憾的是粮、弹、医药均缺，这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张大军，1980：6354-6355）

当七月末塔城被攻陷后，八月一日波里诺夫、列斯肯部队攻扰哈巴河（在承化西）的西郊，又有外蒙军三百余人开到哈巴河县沙吾尔山盘踞。乌斯满被俄人指使他将部队



开回布尔根、清河下游与北塔山的北麓整补训练去了。这也是苏俄人清除乌斯满的先声，利用他打天下，用完像棒子一样折断他，诚可谓悲悯的哈萨克族，也感叹我国家不强，无法保护我边疆同胞，又复何言？

三十四年八月五日，艾林郡王、苏来满、贾尼木汗等人乘机返迪化，高伯玉留于承化寺。据苏来满在迪化向吴主席忠信报告，谓乌斯满兵力约有十余队，每队百余至三百余人不等，总计在二千五百人以上，于今春在外蒙领取枪支后，便召集游牧进攻承化寺。并由苏俄人任指挥官，自第一、二次攻击失败后，俄国人认为他的军队训练不够，便命令他开回清河一带，再召集游牧准备再攻承化。不过乌斯满土匪性极大，苏俄人也不满意他，所以又利用他的第二个头目达里力汗。（张大军，1980：6356）

前曾述伊伪组织利用和谈期间将军队改编和加强，但到民国三十五年秋冬，政治上的肃清工作成为当时主要的任务，整肃是剔除异己，强化组织，也是俄共内部斗争的一环。过去伊伪政府初成立时，苏俄是利用民族主义相号召，利用土著有声望的艾力汗条热充主席，利用艾尼瓦尔、法合提、伊斯哈克别克、哈族乌斯满等打前锋，这些人不是草莽英雄，便是失意的军人，及至占领三区和政治斗争争取成功后，遂排除土著民族主义分子，调格别乌警察五百人到伊宁加强指挥，不惟军事大权操在马伽罗夫、毛拉奴夫、沙依克等俄人手中，而政治上则派阿合买提江、赛福鼎等人攻向七区心脏外，在三区以满素而（俄共）任塔城专员，木合西拉为伪政府总顾问，衣明而为伪水利局长，阿布拉为伪教育厅副厅长，苏来满（满素而弟）充伪监察厅长，凡过去参加“革命”的人物，不是被清除，即被暗杀。艾力汗条热反对此种行动，密与玉斯英、于斯甫阿吉、阿布都海伊尔吐烈、阿合买阿吉、米娜瓦尔和加、居买阿洪、力衣木江、玉山卡里等抵抗苏俄派势力，终被苏俄派来的如阿合买提江、赛福鼎、木合买提江等所压服，艾力汗在苦恼之余同艾尼瓦尔终日以酒消愁，退出政坛，同时为代苏俄打天下的哈萨克族，包括阿山的乌斯满在内也被清除，并收缴他们的枪支，因此便相携逃亡。（张大军，1980：7093）

查新疆自伊宁事件和条款签订后，于三十五年七月一日改组省政府，伊方即荐乌思（斯）满为阿山专员。同年八月间，乌思满因不堪伊方之压迫，携带印信，退出承化。本年（民国36年）三月间，将退至北塔山，收拾残部，待机而动，以期挽回颓势。因此伊方达列里汗（阿山副专员）勾通外蒙军侵略北塔山，意图一鼓而翦灭之，遂造成中蒙冲突事件，蒙方自知理屈，故于占领松树沟及白杨沟之后，即赶筑防御工事，不再进攻。因此两月以来，北塔山方面，再未发生战事。（台北“外交部”，2001：343）

顷有友人自新疆来，谈述乌思满部进驻承化各情形颇详。兹记载如下：“本年（民国36）八、九月间，达列里汗（阿山副专员）鉴于青格里河一带哈萨克多逃亡北塔山，因此议将青格里河之哈萨克游牧哈巴河，将哈巴河之哈萨克移牧青格里河，于是激起青格里河哈萨克之反感，于是密函乌思满，请其进攻承化，彼等作为内应。乌思满据情报，请示西北行辕，张主任恐因此引起伊宁方面之借口，发动军事政变，未予核准。但乌氏受部属之包围，以为有机可乘，遂由二百士兵保卫北塔山阵地，遣大军一千五百名进攻承化，里应外合，不数日收复五县，前军入驻承化，驱达列里汗部队于哈巴河及吉木乃一带。省方问询，曾声明此为乌个人之意见，国军并未协助云云”。（台北“外交部”，2001：344）

外蒙内部边防处处长多而吉将军，偕同驻布尔根内务部特派代表西喇叭杂而上尉、参谋长桑雅、排长巴图瓦其而、医生依希苏伦并有哈萨克少尉、班长吉雅嘎偕同卫兵二十三名，用大卡车两辆，绵羊三十只、骆驼四十头，且载有货物如大米、茶、烟、洋火等物，分送给达里里罕及乌斯满二氏，剩余物品送给其他秘密工作人员。当时达里里罕回礼送给多而吉将军两个毯子等物，但乌斯满并未回礼。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根据切



巴拉桑将军命令，多而吉将军和苏联将军普包天、特务班长（上尉）阿尤仕、医生依喜苏伦、巴图瓦其而、桑吉雅、并有内务部科布多等五科苏联指导员喀基考夫（少尉）等与乌斯满等，共同住了一个时期，但不知谈判内容。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初旬又来了大小车辆两辆，一方由伊犁方面来的伊犁反动领袖和苏联驻伊犁领事以及俄国指导员顾问等，另一方面有外蒙多而吉将军偕同随员等，在该处双方谈判，内容不详。但据一般人推测，伊犁方面奉史达林之命，蒙古方面奉切巴拉桑之命，共同计划侵略新疆领土。同时，他们双方谈到外蒙与伊犁分界问题，大概结果将达里里罕所管区域分给伊犁方面，乌斯满所管区域和领土分给外蒙方面。并且他们双方有军事秘密协定，内容是军事进攻计划氛围达里里罕在伊犁反动派援助和指挥之下，由西部和伊犁方面同心协力直取迪化，乌斯满偕同蒙古军队和蒙古游击队，并援助乌斯满枪械子弹，偕同蒙古军队进攻迪化。为此问题，苏联运至科布多大批军火以备外蒙、乌斯满之需，该大批军火现仍存在科布多保存，以备将来之用。因此，要发给乌斯满枪械子弹，但必须乌斯满亲身去领，否则不发。所以马上派人去请乌斯满前往领枪，但乌斯满始终拒绝亲自领枪，并说若发给枪时可以派人去领，何必小题大做。所以八月又派人去请乌斯满，如果再来时就预定逮捕乌斯满送至乌兰巴图尔（库伦），在此时期仍被乌斯满拒绝。所以当时外蒙统帅切巴拉桑下令边防处处长多而吉将军指挥外蒙西部驻军如：

- 一、扎盆罕第四旅、
- 二、科布多第二十五营、
- 三、布尔根洛素图之第四营、
- 四、西啦苏木之第四营。

令上述部队开至澳什根，并令科布多飞机场四架军用飞机在飞机掩护之下，偕同上述军队进攻乌斯满军队，最迟不能过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必须全面进攻，必须想外宣传：“我们并未向中国侵犯，而中国向外蒙侵犯，这样可以避免世界舆论，在此情形之下应侵占我们目的地，这是我们主要任务。这样我们向外宣传我们非为侵占他人领土，而为保护自己领土而战。对此问题每人向最高将领宣誓保守秘密，除此而外应当用种种办法，利用种种机会，在乌斯满军队内作我们秘密和底下工作，将来乌斯满部下自动逮捕乌斯满，以备利用乌斯满部下共同进攻新疆，并与伊、塔、阿方面发生密切关系作共同计划，以得到最后胜利为目的。尤其是与达里里罕发生密切联系，以备共同作战，这是我们主要任务”。除此而外，一方面用政治，一方面军事，必须达到自己目的，这是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所作的计划。我们必须严重执行计划，将此计划科布多内务科长所宣布的，这是侵略新疆计划。

科布多第五边防大队长班赞拉克齐说：

“现在美国与中国有军事协定，美国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帮助任务。同时，中国所用飞机、坦克车均由美国供给，所以必须注意保护秘密工作。在乌斯满部队内底下工作人员必须小心，现在乌斯满被中国利用，假使让他们拿住的话，乌斯满送给中国，中国又送给美国，美国拿着这个做宣传品，向世界宣传，到那时候不但不能成功，而且要失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因此各方面必须对付美国有适当政策，必须提高政治警觉性，同时我们要利用哈萨克氏族，同时还要严防哈萨克氏族。除了队长而外，在十月间布尔根河开工作检讨会”。（台北“外交部”，2001：14-15）

“草莽英雄”乌斯满终究满足不了苏联的野心，苏联转而支持第二个头目达列里汗以控制其在三区的势力。乌斯满也深知苏联的宗教政策，于是退出承化，退至北塔山，以期挽回颓势。乌斯满弃暗投明，与民国政府统一了立场；“哈萨克英雄”与中央合作的历史记忆成为乌斯满作为“英雄”的转折点。

(三) 北塔山：中华民国巴图鲁

【迪化八日电】苏机及外蒙军队进攻我白塔山守军事，据悉系导源于某方不满阿山专员乌斯满所致，阿山系三十四年秋为事变军队所占领，当时进占阿山之军事指挥，即为乌斯满。后伊宁事变和平解决，伊方即请求派乌斯满为阿山专员，惟某方始终不信任乌斯满，时加压迫，并派达里列汗为副专员，强加控制。阿山军事结束后，某方即派八百名矿工，在阿山之富蕴县，开采煤矿与金矿，并有三百名武装兵保护开采，阿山全区百分之九十五，均为哈萨克族，平日对某方种种作风深感厌恶，年余以来，某方因开矿关系，甚觉不能事事如意，遂促使伊宁向阿山用兵。本年二月初，伊方即派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率装备精良之军队五千人进攻阿山，乌斯满力战不支，乃退至白塔山一带，乃某方仍不以为足，必欲置之死地，遂由外蒙出兵侧击。北塔山原有我国军一连驻防，外蒙军六月二日深入我边境，约六百余华里，向我军及乌部进攻，激战结果，除死伤数十名外，并生俘八名，遂恼羞成怒，增派两营骑兵，于本月五日，向我军猛攻，苏机四架亦同时出动，轮番向我白塔山防地轰炸扫射，我军民闻讯，极为愤怒，一致要求制止此种侵略行为，保卫国土，望全世界民主国家，一致起来制裁侵略，现白塔山一带正在激战中。(台北“外交部”，2001：182-183)

查阿山区民百分之九十五为哈萨克族，当盛世才亲苏时，哈族对共产主义深为痛恶，表示反对。其后盛氏态度转表，苏方乃利用阿斯满与伊犁方面结合，造成二十三、四年之伊塔阿三区事变。和平告成，阿斯满被任为阿山专员，但苏方因过去之夙恨，不予信任，另以苏籍之(立)里汗津之，控制一切。阿不甘压迫，乃于上(三十五)年八月退出承化，向我方输诚，同时并以苏方派遣武装矿工，开采富蕴矿产等等情报供给我方，因此消息外布，益触苏方忌恨，遂唆使伊方向阿山用兵。自二月开始节节退逼，乌阿部卒以众寡悬殊，于四月中旬，退抵北塔山，经过情形敬电呈报在案。职原飭阿斯满本人经来迪化或暂驻奇台，阿以安顿游牧及整理残部为词，请缓其行。曾经迭次派员携带计书前往宣慰，不意苏方必欲置之死地，复唆使蒙军从东侧击，以达其全部消滅之目的。(台北“外交部”，2001：185)

据我新疆驻军司令报告，外蒙军队于本月二日约我国界，侵入新疆境内，并于五日增加骑兵两营，向奇台以北白塔山我驻防军攻击，同日苏机四架飞至该白塔山上空轰炸扫射，掩护外蒙军队进攻。该白塔山在迪化东北约二百余公里，距中蒙界线亦二百余公里，其为侵越，无可异议，该地为国军及忠于中央之哈族首领寓斯满部队现驻扎地。苏蒙目的原系以武力压迫该首领与国军，我政府对于此种动机，虽暂不必作何表示，但对苏机与蒙军越境攻击之事实，我政府决定向苏联及外蒙抗议。(台北“外交部”，2001：186-187)

三十五年八月间，阿山专员乌斯满，因不甘受伊方达里(立)汗之压迫，退出承化。三十六年一月下旬，曾有外蒙军二千余人，入据布尔根，并有二百余名侵入北塔山，据我方人民拷打，探询我方军情。二月初旬，伊方指挥官伊斯哈克·江，率武装精备部队五千人进攻阿山，乌部节节败退。三月十七日，乌部放弃温都而哈拉，退至北塔山，我方派骑兵第七旅连长马希珍率两部于北塔山收容，在乌部未到达北塔山之前，其哈族保长钦海与外蒙搜索兵遭遇，击毙二名，获马十匹。五月十二日，马连在白杨沟与外蒙侦察兵五名接触，击毙二名，马一匹，获苏造步枪一支，马一匹，俄蒙文化一本，乌部又俘获蒙兵八名。六月二日，北塔山发现外蒙军五十人，同日外蒙古边防军科布多中校队长班子而克沁，致函乌龙布拉克我驻军马连长云：“五月十二日，有汉哈部队非法越过白特色同山，并捕去彼方士兵八名，马一匹，此种破坏蒙古边防及中蒙友好之行为，限于四十八小时内，将刀布尔特山东北对山胡艺而特河上之野营部队撤退，并交还失踪士



兵及马匹，否则事态应由该连长负责”等语；六月五日，宋司令希濂始截获报告，旋即电飭释回，并派员查明处理，正办理间，同日（六月五日）午刻，外蒙骑兵一营，配合军用汽车多辆携带轻重武器，并有苏联标志之飞机五架掩护，向我北塔山驻军进攻，投弹轰炸扫射，经马连猛烈抗击，达十小时之久，我方阵亡中士班长一名，保安队员一名，伤亡及失踪之马三十余匹，粮食、帐篷均被炸毁，此役计毙敌四十余人，马二十余匹，夺获转盘机枪一挺，乌部闻讯增援，夺获轻机枪二挺，马二十余匹，略晚因恐敌断后路，我军撤出北塔山，退至库普（离北塔山十里）。六月六日，马、乌联合搜索前进，敌已退出，敌机仍侦查并轰炸我军旧阵地。六月七日复往搜查，自卫队寻得转盘轻机枪一挺，手提式机枪二挺，并由尸体上搜出地图、米尺、相片、日记本等物，判断该尸体为参谋人员，乌部寻得小型话报机一架，已损坏，高射机关枪一挺，火药一箱、弹药五箱、步枪树枝，并于另一尸体搜出金质奖章两枚及党政相片文字，判断该尸体为指挥官，是日及八日，均有敌机侦查并轰炸我军旧阵地。六月九日，本部电张主任治中、刘特派员泽荣，查问事件真相。（台北“外交部”，2001：196-197）

查阿山窝斯满部，以忠于政府，致遭伊方（达）立里汗之攻击。三月二十七日，放弃其基地温都而哈拉，仅余官兵一八零名、民众一一零名，退抵我方地区。宋总司令为争取逐渐内向之数十万哈族信心，乃著骑七旅派兵一连，在北塔山予以收容。兹据宋总司令转据骑兵指挥官马呈祥转据驻北塔山附近之骑兵连连长马希珍五月十六日电略称，窝斯满部近俘获蒙军八名等情，当电飭马指挥官转飭马连长通知窝斯满将所俘蒙兵释还。又据马指挥官六月五日转韩旅长电称，蒙古边防军科布多中校队长致我北塔山驻军马连长文件称。有汉哈部队非法越过地界，并捕去蒙兵八名、马一匹，此种破坏蒙古边防及中蒙友好之行为，限四十八小时内，将塔头而七里山等地之野营部队撤退，并交还失踪士兵及马匹，否则事变责任，应由该连长负责等语，马连长当将送文件之蒙军代表扣留一名等情。（台北“外交部”，2001：200）

又据宋希濂已佳{六月九日}电密，此次苏机助外蒙军进攻北塔山守军，业经电呈计蒙均察。查事之导源，实由于苏方不满阿山专员乌斯满所致。山区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为哈萨克族，苏方时利用乌斯满与伊犁方面结合，造成三十三、四年之伊、塔、阿三区事变。和平告成，乌斯满被任为阿山专员，但苏方因过去之夙恨不予信任，另以苏籍之达流（立）里汗津之，控制一切，乌不甘压迫，乃于上年八月退出承化，向我输诚。同时以苏联派遣武装矿工，开采富蕴矿产等等情报，供给我方，因此消息外布，益增匪方忌恨。遂唆使伊方向阿山用兵。自二月初开始，节节退避，乌部卒以众寡悬殊，于四月中旬兵力抵北塔山，经过情形敬电呈报在案。职原飭乌斯满部本人经来迪化或暂住奇台，彼以安顿游牧及整理残部为词，请缓其行，曾经迭次派员携带给养前往宣慰，不意苏方必欲置之死地，复唆使外蒙从东侧击，冀达其全部消灭之目的，谨将前因再电缕呈。（台北“外交部”，2001：201）

新疆省政府和伊宁和平条约成立后，乌斯满被中央任命为阿山专员。那时某国以宰制伊宁的姿态，想操纵伊宁、塔城阿山等地区，但是乌氏坚决表示反对，三十五年八月间，苏联人在阿山区内采掘金矿的要求给他拒绝了，外蒙方面派几个武馆到阿山游历，让他保护，他也拒绝了，同时他又派亲信哈拉提巴依到迪化进谈张主席治中，请求援助，并表示倾向中央的赤诚。后来又派鱼苏尔巴依携带一个“统一阿山计划”来，请张主席帮助他实现，张氏向主和平，虽然承认他计划中收复富蕴、吉水等是阿山专员分内应做的事，但又恐因此引起伊宁方面误会，所以除了资助他一些军火枪支外，却力戒他不可操切此事。（叶淑渝，1948a：7）

乌斯满保卫国土、保卫全世界民主国家、与外蒙军队激战的历史记忆，使“哈萨克英雄”乌

斯满成为国家的“民国英雄”乌斯满。历史记忆对北塔山事件的表述，通过塑造乌斯满的英雄形象、达到了民国中央政府对国家利益、地域边界的保卫。

五、口述史中的族群记忆

作为无文字的记忆，口述史记忆成为扩展历史文本记忆的有效路径。口述史通过记录并保存历史亲历者或目击者的回忆，从个体角度、微观层面丰富着历史记忆的面相。口口相传是口述史族群记忆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部落、家族、父辈都构成了口述史记忆得以延续的边界。与历史文本相比，口述史记忆在情感性、原始性等方面更体现出群体认同与归属选择。

历史记忆中的乌斯满具有多样的社会身份，在哈萨克族群、阿山地区及新疆省都扮演者不同的角色，历史文本也偏重对这些宏观层面结构中角色的表述。但在哈萨克族群内部，乌斯满的部落身份归属依然存在；对于家庭而言，他也具有丈夫、父亲、爷爷等家庭角色。这些微观层面的角色身份，是得以全面、真实理解乌斯满是谁的重要方面。产生于部落、家庭层面的历史记忆，更能从生活、交往的互动解释中还原乌斯满的面貌。

在口述史族群记忆中，笔者按照从家庭、部落、族群的递进结构陈述不同人记忆中的乌斯满。在部落选择方面，除了乌斯满所属的莫尔合部落，也包括在历史进程中与乌斯满行为互动、权力互动最为密切的达列力汗的杰鲁西部落，以此比较不同部落间族群记忆的内部差异。

（一）家人记忆

父亲从1938年开始反抗国民党压迫。开始他只是其中普通一员，1940年成为组织者、领导人物。直到1946年底、47年初，一直与国民党作战。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剥削很严重，乌斯满成为反抗斗争的领导人。1946年，阿区哈萨克族将其选为可汗。因为他杀了很多国民党军队，从国民党手中解放了阿勒泰。他的战斗也影响了塔伊地区，促使他们的觉醒。

当时，在维、哈中有一个建立东突厥斯坦的运动。到46、47年时，他们开始向我父亲宣传这种思想，但我父亲反对建东突政府。为了祖国的统一，他重新与国民政府和好，暂时搁置私仇，一直合作到1949年。

1948年，他与外蒙作战。1944、45年，父亲与盛世才作战时，外蒙提出过支援。48年外蒙宣称北塔山是外蒙领土，向我们开战。虽然乌斯满与盛世才作战时得到过外蒙的援助，但他宣称凡是有战堡的地方都是中国的。

当时边境守军属韩友文部，被外蒙军设为他们的驻地。乌斯满的军队收复失地后发现战利品中有外蒙头号人物乔伊的命令：北塔山、哈普德赫、萨维尔、萨勒伯特这些地方是外蒙领土，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还有一个勋章，是外蒙一个军长的。他们回来后，把命令和勋章给贾尼木汗的弟弟达列里汗去看，这些内容就是他读的。1948年将这个命令转交给新疆省主席吴忠信，据说这些东西在国民党档案中有，可能在乌鲁木齐。

当时参加作战的不只有外蒙，还有东突政府。现在所有的功绩都写在了当时要建立的东突政府的头上了。在北塔山战争以前，蒙中边界尚未确定，战后乌斯满做了一些界标，后来的边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定的。

43年国民党在富蕴清枪时，把乌斯满的5个子女扔进井里，还有一个失踪了。这是他同国民党的血仇。48年他放下血仇，与国民党合作，打击外蒙。当时斯大林有把新疆分离出去的阴谋，所以乌斯满与三区开始作战。他与国民党作战时，外蒙给了飞机、武器及军官，其中两个人是莫尔合部落的，乌斯满是从这2人口中知道的这些。当时三区的头是艾力汗，他还劝说乌斯满去三区工作，亲自前往并带了勋章，乌斯满却将勋章扔了。当时斯大林支持的东突政府将他任命为阿勒泰专员。阿力汗曾对那两个外蒙军官



说，一是要说服乌斯满参与建立东突政府，如果不能说服，就谋杀他。哈勒哈拜依将情况告诉乌斯满后说：“我亲眼看到您所做的一切，谋杀您我做不到。您自己要小心”。之后，乌斯满就撤出了阿勒泰，搬到山上去了。

1946年，乌斯满召集包括达力列汗在内的500人在库尉开会。会上，乌斯满说我们不要建立东突政府，我们要保护好哈萨克人。但这个观点没有与达力列汗达成一致。乌斯满说：“苏、蒙的情况我都打听了，那边搞公社化，没有民族平等、没有宗教自由，还是我们中国好。我们反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剥削，和没有民族平等、宗教自由这些状况，但我们不反对汉族这个民族”。

当时，乌斯满的军队已经编入了东突军队，叫东军。原先的军队中有两个军官：哈巴斯、霍尔曼，但组建时将这两个都撤了。之后，已编入东军的人又出来跟着乌斯满，于是双方开始打了起来。1946年，乌斯满取得胜利把东军赶出了阿勒泰后。达力列汗逃亡去了苏联。

1947年，达力列汗得到苏联支援，带40辆车的士兵打回来、重新占领了阿勒泰。当时，这40车人也到了可可托海，自称来开矿。乌斯满派人专查此事，发现他们不是只开矿，而且也没有国民党政府的允许。这些自称开矿的人都是士兵，还拥有武器。

当时吴忠信任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4万军队已被消灭。如果外国人进来，国民党是没有力量进行反击的；当时新疆的情况使得国民政府的人逃的逃、弱的弱，所以外蒙趁虚而入。而另一边的东突也想建立自己的政府。乌斯满都反对这两个力量。

49年解放后，解放军入疆。当时乌斯满在北塔山，解放军派人找他，因为“这个人立过功，应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之后乌斯满从北塔山迁到奇台，准备去乌鲁木齐与解放军进行协议，因为他也觉得这个党是伟大的党。但这时王震的军队打了过来，乌斯满认为自己受骗了，于是又从奇台撤逃到回巴里坤。之后来了马克南与尧乐博斯，尧乐博斯说他要去了印度了，让乌斯满去美国，因为待在新疆肯定没好日子过。当时，乌斯满的部下有俄罗斯人、少数维族和哈族。他对这些部下说：“中国的土地我呆不下去了，我要跟马克南去美国。在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你们立了功，以后是跟我走还是留下，是你们的自由”。有一部分俄、哈士兵要留下，他们拿着自己的武器，骑着自己的马走了。

乌斯满跟着尧乐博斯和马克南到了印度边界，并且过了境（乌斯满孙子纠正：是到了甘肃的海子，没有到印度。只是派人护送马克南去了印度）。在印度境内过冬后，马克南说要走，还要带乌斯满的三个儿子，但乌斯满没有答应。他没有走是因为新中国和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的生活好转了。

当时跟着乌斯满的有500户牧民。有传说王震与乌斯满打仗是因为误会：哈密有一个叫哈巴斯的土匪，他抢了一个哈族妇女，一直躲在山里。在王震军队从甘肃进疆的路上，他把车里的5人杀了，还烧了车、抢走了武器。而乌斯满的堂兄弟恰巧也叫哈巴斯。其实这里可能是一个政治阴谋，这时三区已和平解放了，他们说如果乌斯满与中共合作的话，就会揭露他们的阴谋。所以（抢车）这事要么是东突人干的，要么是外蒙人干的。

乌斯满也知道这个情况，想回到新疆去。那时乌斯满的军队在边境，他的家人在国内。乌斯满通过一个汉族商人给毛主席写信：“听说新的党和政府很伟大，是人民的救星。我要与你们合作”。根据哈萨克传统，毡房的门应该向东方开，但乌斯满说：“我要回新疆，所以毡房门向西开”。但只过了5、6天他就被解放军抓了。被抓前，护送马克南的撒列别克回来了，带了一个美国政府的介绍信，说美国在沿海的一个地方等乌斯满。这封信留在了贾尼木汗的弟弟达力列汗手中。撒列别克回来后，乌斯满又将他派回去，说那封信不能留在别人手里，我们要回归。



乌斯满被抓后，被安排在敦煌。我的三个哥哥都逃出来了，一直逃到阿勒泰。1952年他们与共产党达成有条件的协议。当时达成协议的人叫何家新（注音），是驻阿勒泰的军官。协议中的条件有11项：1、乌斯满活着的话要回来，死的话要看到尸体；2、要把留在甘肃的乌斯满家属带回；3、要把因为是乌斯满手下而进监狱的人都释放；4、要实现宗教自由；5、要恢复正常的生活方式，建毡房、分家畜、保证有草原可以放慢；6、要知道我们是完全信任共产党的，否则不交武器；7、不追究我们的过去，可以让我们开始新生活；8、不再追究与国民党、东突征战时因供给困难而抢了一些牧民的羊、马。

我们的党很伟大，这些条件都接受了。当时共产党的一个条件是过去的事情可以不追究，但如果发生新的问题就要加重罚治；如果有新的反对政府的行为，就会追究过去。

1952年底、53年初时，父亲的尸体运抵库尔特乡。当时政府还给了丧葬费、大米、面粉，我们自己给父亲修了坟；把留在甘肃的家属都接了回来。当时政府也给了我们马、羊，释放了相关人员；恢复了宗教自由。（0101010555）

1937-1939年期间，盛世才独裁统治新疆，新疆各族的领袖人物、知识分子和宗教人物都遭到镇压。38年，哈列哈斯部落的阿合提台吉及儿子被抓，下阿勒泰的布哈特父子也遭逮捕，之后老百姓不信任官方。当时，阿合提在恰库尔图清真寺教经文，盛世才以清枪为借口在1939年12月24日抓了阿合提、焚毁了寺中的书。毛尔合的阿依吐汗布的首领叶斯木汗召集部落中的勇敢者应该来保护阿合提，实施劫救。有人私下给阿合提传话说要救他时，老人说：“我已经70多，现正值冬季地方又有强大的军队，不要让百信遭祸，让我去吧”。

起义开始时，乌斯满是个普通牧民，在当地属于中等富裕程度。40年起义之前有个祖哈巴特尔。他并不富有，但有富人应救济穷人的理念；对不愿进行救济的富人，他就召集年轻人劫富济贫，从而成为有影响的人物。有一次，祖哈派手下抢了上千匹富人的马，返回时要通过乌斯满所在的村子。这上千匹马通过村子的时候，乌斯满的马也跟着马群离开了。当时乌斯满只有18岁，他要求留下自己的马，但他们没理他，于是乌斯满就追赶马队。他们留下一个最厉害的人与乌斯满单挑，结果被打败了。连续打败6、7个人后，乌斯满终于把自己的马留了下来。这些人回去汇报给祖哈，祖哈很吃惊，便问起这人是谁，大家回答说是斯拉木的儿子乌斯满。

当时乌斯满的父亲认为乌斯满不应与祖哈巴特尔作对，会惹大麻烦，。于是便说：“既然这样做了，我带你去给祖哈赔礼道歉”。乌斯满认为自己没有错，但还是跟着父亲去了。在去的路上，他们碰到了祖哈派来找乌斯满的人。他们对乌斯满说：“有人喝多了马奶酒，请帮忙把此人搬到阴凉处”。其实这是祖哈对乌斯满的测试。乌斯满正要搬此人时，那个人遂即出手，两个人扭打了起来。不一会儿乌斯满就不费力气将他扔到阴凉处。于是祖哈认可了乌斯满的力气和智慧，还请他吃了饭，并对乌斯满祝福说：“只要你活着，你就是克烈的巴特尔”。乌斯满的巴特尔名声从那时就传开了。

富蕴县县长徐尔林又带着自己的翻译和下属要抓人了，住在一个叫欧汗的藏根家里。当时乌斯满在山上藏了两支枪，见到这种情景他就去取枪。叶斯木汗组织了60个人，趁夜里到了欧汗家里。他派英斯霍根和霍克斯根从窗户闯入，其他人破门而入。这60个人以莫尔合部落为主，也有其他部落的。乌斯满的三个儿子也都参与了。

事发之后，盛世才从阿勒泰、乌鲁木齐调来了军队进行镇压。那时候是冬天，仗打了很长时间，盛世才一直都没有成功。当时组织反抗的头目有哈拉哈斯部的阿里斯汗等人。从40年起义开始，乌斯满便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组织反抗。

盛世才用飞机发传单，还派他的岳父、在乌鲁木齐省财政厅当厅长的坚铁克依部落



的台吉贾尼木汗等人为代表在恰克姆特与起义各部谈判。后来达成的协议包括：释放被捕人士，还人民以和平；那时有些人已经在狱中去世。停止双方的战争，但前提是政府需完成缴枪行动，于是又开始了清枪。之后盛世才说要在阿勒泰开个会，乌斯满也在被邀之列，但他并没有去。叶斯木汗告诉他说：“你刚砍了县长的头，盛世才他不是叫你赴会，而是叫人抓你”。

大家在恰莫切克集合坐飞机，但飞机直接飞到乌鲁木齐。看到之前的协议已经撕毁，乌斯满就另起炉灶。

当时，盛世才的军队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地方上的军队不能与之相比。乌斯满走后，盛世才抓了乌斯满的家人。当盛军撤退时，将乌斯满的4个女儿、2个儿子杀害。那时乌斯满的游击队已包围可可托海，看到了这一切的发生。乌斯满的弟弟达列里汗也死在国民党手里。

1943-1944年时，乌斯满已是众所周知的巴特尔。

二战期间，苏联占上风后，斯大林有扩张的野心，他指使外蒙古总统来与乌斯满见面，目的是了解需要提供多少武器能武装乌斯满，从而打败国民党。与乌斯满见面的还有一名大使及军队领导人多乐吉。当时乌斯满44岁，带着自己的亲信与他们见面。外蒙古总统很谨慎，在见面的帐篷下挖了地道，保留了伏兵。乌斯满也带了上百人留在后面接应，自己只带十几人前往。这是个正式的外交活动。当时乌斯满说：“我们是阿山哈萨克人，从40年起反抗盛世才的压迫。我们需要枪支、弹药，蒙古人和哈萨克人是朋友”。外蒙古总统同意提供武器。这次会见开始要见乔伊巴尔松，当时外蒙古总统的话是“我们会帮助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这是中国内政，我们不好参与。但你要保护自己的人民，我们可以支持”。然后让在二战中立功的外蒙哈萨克飞行员给乌斯满作飞行表演。后来确实给了许多武器。从外蒙来的军事顾问中就有达列力汗。这些顾问从战略、战术上支援乌斯满的游击队。

1944年底、1945年初在上阿勒泰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这时上阿勒泰三县已经解放了，准备解放整个阿勒泰了。达列里汗参与了攻打阿勒泰的行动。这时伊宁的“三区政府”开始给乌斯满写信。阿勒泰这边起义时，“三区”那边也有人起义。起义时，有苏联派来的各种各样、各个民族的人进行支援。“三区政府”最终的目的是霸占上阿勒泰的土地资源。

这时“三区政府”任命乌斯满为阿山专员。苏联派来的人都受过正规教育，乌斯满的手下仅一人有官职，阿山政府中其他人都是清一色“三区”派来的人，达列里汗任军事领导人。这个任命消息传来后，乌斯满说：“我们为解放阿勒泰流那么多血，现在胜利的果实留给了别人，这样的结果行吗？就像两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实际上乌斯满已经被架空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富蕴。“三区”的人不时要求他回去，包括重要的领导人都过来劝他，还给他带来勋章。后来很多人说，乌斯满重回富蕴，他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文化不高。

1946年底1947年初，乌斯满迁到奇台一带，开始与国民党接触。当乌斯满见到宋希濂时说过一句话：“新疆是中国领土，阿勒泰是我的故乡，阿勒泰也是中国的领土。三区是苏联支持的政府和军队。我知道苏联如何对待我的同胞的，我要与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在奇台为乌斯满提供了武器装备，乌斯满的组织有一千多人。1947年乌斯满打回阿勒泰后，达列里汗逃往苏联。当时在下阿勒泰有一个坚铁克依的胡勒台部落支持乌斯满，达列里汗带领苏军攻打这个部落的人，死伤三四百人。这时，乌斯满与“三区”的冲突达到顶峰。当时的“三区政府”是东突人民政府。据说那时还有一个阴谋：达列里汗的军队穿着民族服装在塔城等地故作土匪行径、败坏乌斯满的名声。之所以有



这种看法，是因为如果下阿勒泰人民也一致反对乌斯满的话，达列里汗为什么要打杀胡勒台部落？

1951年2月，解放军包围了阿吾勒。包围时大家的马都放出去吃草了，但乌斯满自己的白马在。乃比回忆时说，当时早上一醒来就听到有马跑的声音，他出去一看是军人，于是就赶紧回毡房，就把枪藏了起来。之后三兄弟就骑着一匹马跑了。戴白色袖章的解放军立刻就围了上来，他们开枪把围上来的人都打死后逃走了。后来遇到狂风大雪，什么都看不见，天气很冷。他们商量怎么跟阿吾勒联络。当时乃此最小，偷偷回到阿吾勒，藏在羊群里与阿吾勒的人说上话，那个人告诉乃比说，乌斯满及身边的亲信都被抓了，阿吾勒全被士兵包围了。之后乃此带了些茶叶、火柴、茶具，又上路趁夜逃跑了。

之后人们看到乌斯满在解放军的包围中骑着一个大马上被押了回来，乌斯满没有被绑。大家都哭，乌斯满安慰说道：“不是谁抓了我，是安拉的意志。你们不要怕，这个党不会让你们死”。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0101010548)

(二) 莫勒合部落记忆

关于乌斯满的资料很少，达列力汗的资料多，因为达列力汗是台吉，也是政府官员、部落头目。达列力汗与苏联有关，是在苏联怀抱中成长的人，这是乌斯满与达列力汗冲突的原因。乌斯满和苏联没有关系，与别的政府也没有关系，但他有一种思想，就是要维护信仰宗教。苏共领导下，政府与宗教作对，并且反对私有制，但乌斯满不喜欢这样。他没有读过书，对政府没有特别的理解，但他相信安拉的存在和古兰经。乌斯满会念经、也封斋，阿合提讲经时他听得很认真。他是巴特尔，死都不怕，跟盛军作战时面对强敌，敢于以寡敌众甚至孤身奋战。贾尼木汗、哈德万与乌斯满不一样，他们是向国民党投降的人，乌斯满是与国民党打仗的。

乌斯满当时当了阿合提的儿子。阿合提被抓后，乌斯满开始反对政府，这就是乌斯满出来反抗的原因。他虽然是文盲，但很英勇，杀了盛世才的兵，所以是个巴特尔。

乌斯满与国民党交往是因为他没有受过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他只信伊斯兰教。盛世才与苏联合作后也推行反宗教政策，乌斯满很反对这个政策。谁不让他念经、封斋，他就反对谁。国民党这边教育乌斯满说达列力汗是苏联教育的，达列力汗执行的是苏联的政策。之后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方面开始彼此作对。我的父亲被抓时，我15岁，所以我见过乌斯满。乌斯满起初不了解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支持乌斯满的做法，他才与国民党合作的。当时苏联没收财产，搞公有制和公社化，所以后来开始实现“三面红旗”时，大家都认为当初乌斯满的做法是正确的。

解放时，如果有机会的话，乌斯满会留下来，可能也会有官职。但王震认为乌斯满是哈族的顽匪。(0101010586)

乌斯满结婚前后，家庭贫穷，他的父亲斯拉木是乡里的毛拉，教过学生念经。乌斯满会念经，但没有正式的读过书，从小到大一直在放牧。斯拉木的另一个儿子叫达列里汗，参加和盛世才的谈判时被抓走了，后来死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牧民起义最初是各部首领带领的。第一次起义后与盛世才进行了谈判，但后来发现被骗了，这些人要么死在监狱中，要么死于战场，或是伤残。等这些人都死后，乌斯满就成了首领。

起义时，达列力汗还没有出现。据说达列力汗是在1944年4月，乌斯满将盛军打得差不多、军事上已巩固时，被外蒙派来的。那时乌斯满与外蒙的乔巴山关系很好。乔巴山是外蒙古军队、行政、党务方面的一号人物，大概是1943年，他派人传话要求与乌斯满见面。之后在清河与外蒙之间三角地带的乌斯满的牧场，乌斯满带了100多人见了乔巴山，乔巴山也带了十几个人。乌斯满建了新帐房来接待他们，之后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外蒙古为乌斯满提供重轻型各种武器，数量较大，这些所有武器都是苏联制



造的。乌斯满不想欠账，便将与盛世才打仗的战利品 80 匹马送给外蒙古，还有金子和地毯，具体数量不清楚了。至此，乌斯满的军队就有了武器。而之前用的武器都是与盛世才军队交战时缴获的。

1940 年以前，达列力汗是当时阿山县副县长，盛世才开始抓人的时候他失踪了。乌斯满与外蒙友好后，外蒙古派了达列力汗来到了乌斯满的军队中。外蒙古在之前也派过 3 个顾问和 500 人的军队支援乌斯满，还出动过飞机。

外蒙古从空中、乌斯满在地面将盛世才的基地都占领了。之后，达列力汗来了，他与其他 3 个外蒙顾问商量，派游击队去哈巴河、吉木乃，目的是从盛手中解放整个阿山地区。当时的策略是将下阿勒泰牧民迁往哈萨克斯坦境内，上阿勒泰牧民迁往东边，使盛军得不到老百姓的给养。在迁徙牧民之前，他们也攻打阿勒泰，但没有拿下。战斗先占领布尔津，之后是福海、阿勒泰。这时达列力汗已经是军事领导人。也有乌斯满的人和其他巴特尔担任团长、。

1944 年，乌斯满已经有了巴特尔称号。在一次布鲁温河的聚会上，大家让乌斯满坐在白毡子上，意为立他为“汗”。当时一共给 10 个人巴特尔的称号，乌斯满是其中之一。还有尼诗拜依、卡米尔、哈巴斯、努鲁扎伊、苏鲁巴伊、耶斯木汗、苏莱伊曼、克列斯等。他们当时有已经战亡的、还有健在的，都是前几次起义战功卓越者。

乌斯满与达列力汗分开的内部原因是在建三区时，阿山为一区，也建起各种行政机构，乌斯满是专员，达列力汗是副专员。但乌斯满的人被排挤在外，占重要位置的人都是对阿山没有贡献的，只有一个是与达列力汗属同一部落的人任警察局长

外部原因是阿山区建立时的顾问是外蒙人，背后实际上是苏联的支持。乌斯满最初不知道，后来慢慢了解到了这些。1929-1931 年的苏联大清洗，从哈萨克斯坦境内迁回很多人到阿勒泰。这些人被苏联政府没收了财产，通过与他们接触，乌斯满知道苏联是取消宗教、没有人生自由的地方。因此，还没有起义时，他就对苏联形成了这种印象。三区政府中的阿合买提江等都在苏联受过训，那时乌斯满就察觉到三区后面的支持力量是苏联。

我觉得乌斯满还有一个思想，就是他觉得阿山的天下是他乌斯满打出来的。

还有就是富蕴开矿问题。听说乌斯满了解到，最初是盛世才与苏联签订了开发协议，蒋介石却否定了。乌斯满认为只要他在阿勒泰就不同意苏联开矿，是因为这只是盛世才批准而非中央政府批准的。于是乌斯满派代表到矿区驱逐苏联专家。但苏联人说与盛世才政府有协议，就是不走，而且还在矿区大量伐树、盖房、修路。对此乌斯满更不愿意，一心一意要将他们赶出富蕴。开矿问题成为了冲突的爆发点。

1945 年 9 月三区的阿山政府建立，11 月，乌斯满到达阿勒泰。被任命为专员的乌斯满到了阿山后就生病了，可能是因为关节炎而引起的瘫痪。当时苏方派人进行了治疗，还专门给乌斯满做了轮椅。之后乌斯满一直在家接受治疗。待病基本上好了，他要求要到富蕴休假，并且将家属也都带回。据传乌斯满说：“我要把地区政府搬到富蕴去”。当时，乌斯满下面有四个“比”，但是他的这个决定是个人所做或与别人商议的，今天已经无从求证了。

乌斯满从普通百姓那里也抢过东西。但他不会抢什么都没有的穷百姓，抢的都是富人。起义时，哈族中的富人很少，有赞成起义的也有反对的。乌斯满就抢那些反对他的人。赞同他的人都会自愿捐物给乌斯满。称乌斯满为强盗、贼娃子的，都是那些被抢的富人。

乌斯满与外蒙古合作时，那些自称“开矿人”的人中有苏联人、哈族人，他们与乌斯满见面，说要帮助乌斯满与盛世才打仗。乌斯满是个敏感、谨慎的人，把他们的话当



真。1943年，外蒙选了与乌斯满同部落的汗尔卡什，以取得乌斯满的信任。汗尔卡什是在外蒙的莫尔合部落中有头脸的人物，原本就和乌斯满认识，后来勘界才成了两个国家的人。汗尔卡什对乌斯满说：“我们都是认识的人，外蒙派我来，想支援你们与盛世才的战争”。当时乌斯满回答：“我认识你，所以我相信你”。乌斯满告诉他说，1944年会住在布尔津，让他们到时再来。44年的时候这个人履约了。第一次见面时他带给乌斯满带了4只毛瑟枪、一些冲锋枪。第二次见面时，乌斯满就确信外蒙会支援他了。

乌斯满是文盲。那个时候的人都没接受过教育，但因为亲历了清朝、民国的历史，所以很清楚自己的归属。布鲁温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在勘界时划归给了外蒙，乌斯满很清楚中国和外蒙是两个国家，自己是中国人。

达列力汗是乌斯满自己部落的台吉，属于上层人物。1943年，传说他逃亡时有人看到他骑的马拴在苏领事馆门口，而人不见了。他的失踪，不排除他是为了避难而去了大使馆。之后，他被带到苏联。在苏联他接受了包括国际主义的系统教育，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从那边学来。而这之前，他与乌斯满一样，只是地方精英，并没有先进的思想，应该说他受了苏联的影响很深。东突厥斯坦的设计最初就是斯大林提出的，按照斯大林的思想，是要在新疆建立共和国，成立另一个外蒙。这种思想，达列力汗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的。蒋介石派张治中以和谈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正是这个原因。

之后乌斯满脱离了三区转向国民政府。在库而特集会后，乌斯满派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受到了张治中、包尔汉、阿合买提江的接待。当时代表们说阿山人们生活水平低下，希望得到援助。在省政府里，乌斯满是25个委员之一，达列力汗也是委员，任卫生处处长。委员会中有国民党的人，也有三区的人。

乌斯满的代表私下给了张治中一封信，说希望国民军入驻阿山地区、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武器和开展民生支援，同时也希望停止在阿山继续开矿。之后乌斯满又派代表表达过同样内容。至此，国民党在奇台设立了办事处，从那里进行物资供应。阿合买提江知道这件事情后，三区政府开始与阿山分裂，他们将乌斯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当时的边防军是骑兵，外蒙还派飞机参战。当韩友文旅被外蒙包围时，乌斯满在北塔山附近，马西珍派人前来求援，乌斯满派出100多人与外蒙人作战，并将外蒙人击退。据说，战利品中有外蒙的军令状。马克南曾派人来表彰过乌斯满的功劳，还给了很多物资方面的奖励。

现在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乌斯满在边境上发生过土匪行径、到外蒙抢劫。乌斯满的儿子乃比亲身经历过这件事，但他说并没有过抢劫一事。这件事各有各的说法，彼此都相互指责。我觉得如果是外蒙入侵的话，可能的原因是乌斯满转变立场投向国民党，他们以向乌斯满报复为由入侵中国。

马克南对乌斯满确有影响，他们俩见过面，乌斯满还给马克南派过向导。可以说，乌斯满当时是相信蒋介石和马克南的。乌斯满被灌输美国是最强的国家、国民党终究将会胜利、共产党是不可能打败国民党。而且还被告诉说，共产主义是“共产共妻”，吃大锅饭的，消灭宗教，这也是他反对共产党的原因。乌斯满选择脱离“三区”，其实也是为自己找出路。

王震的军队进入哈密后，就派代表见过乌斯满。当时乌斯满在巴里坤，派来的人给他说了新政府的政策，其中还有一个维族人。乌斯满款待了这些人，听说他也说了会投降。后来包尔汉、王震又派了一批代表，这次乌斯满也说会投降。第三次他们派了瓦赫提台吉来见乌斯满，他和乌斯满是亲家。乌斯满每次都说要投降，说等春天就搬回到北塔山，然后回阿勒泰过以前的生活，再不当什么政治人物了。

在回北塔山的路上，乌斯满与王震的军队开了火，起因是王震的军队追赶乌斯满。



当时从哈密到巴里坤有一捷径，那有一个叫哈巴斯的中间派，他也是一个巴特尔。这个人看到罗师长的车一行，就动手开打，还杀了车里的人。王震认为这事是乌斯满干的，非常生气，就派部队追打乌斯满，直到北塔山附近，现在216国道边的一个叫塔郝勒哈斯塔瓦的地方。乌斯满躲到了棘棘湖附近，这样他就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只能继续逃亡。在巴里坤，他又裹胁一些人经过了阿克塞，逃到海子。当时那边的部落头人对乌斯满说可以去印度，但乌斯满没有去，因为还有其他人没过来。传说乌斯满在等一个叫哈巴斯的亲戚，这个人还在奇台，但已经投降了。当然这只是传说。在海子这个地方有盛世才、金树仁时代逃过去的哈族，乌斯满就留在这些人当中。最后在敦煌的共产党军队抓住了乌斯满，然后把他押回新疆。

当时在逃的有100多人，他们都只是乌斯满自己的家族、亲戚，并没有军队。跟他出来的人也有半途留在奇台、巴里坤的，都没有与王震军队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但后来有人认为哈巴斯是乌斯满的手下，所以说是乌斯满打响了第一枪。其实当时乌斯满的一个堂弟也叫哈巴斯，是一个巴特尔，但他是哈巴河人。如果没有此事的话，也许乌斯满就投降回来了。

有些资料说尧乐博士向王震投降后，又与乌斯满联络，计划逃外。乌斯满的堂弟哈巴斯告诉乌斯满说，尧乐博士是国民党，咱们要么被共产党抓了，就不要再和尧乐博士“染”（处关系）。所以说乌斯满与尧乐博士合作是错的，当时乌斯满已没有军队了。

1948年7月底，张治中邀请乌斯满去乌鲁木齐，乌斯满带了70多人前往。张治中在博格达山脚下建起帐篷迎接他。当时，贾尼木汗、艾沙、哈德万、宋希濂等也接待过乌斯满。这些上层人物都与乌斯满认识，有部落关系，也有地域关系。在乌斯满思想中，他总想着他自己的阿勒泰，所以与这些人来往，就是要利用这些上层来保护阿勒泰。听说达列里汗任阿山副专员后，有人带代表团到阿勒泰专门声讨乌斯满、批判他，说他叛变当了土匪。听说包尔汉也是代表团的一员。

乌斯满往东走，主要是考虑到盛世才时期东迁的哈族都在甘肃一带，逃到那里有一定的基础，有回旋余地。(0101040547)

(三) 杰鲁西部落记忆

1949年8月27日，我的父亲达列力汗在飞往北京时，飞机失事。达列力汗在三区革命中与国民党打过仗，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达列力汗是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新疆和平解放不是国民党主动投降，而是“三区政府”通过制约国民党而取得的。

父亲去世时，我12岁。有关三区革命的事情，1989年出版的一本书对达列里汗和乌斯满作出了评价：乌斯满受国民党影响，达列力汗受苏联影响。乌斯满的家族是文盲，而达列力汗在莫斯科上过军校，还会蒙语和俄语。我们家族七代以内都是贵族。乌斯满是反共人物，他脱离了“三区”转向国民党，后来被共产党抓获枪毙。至今政府仍然支持“三区”，对“三区”的评价还是正面的。

乌斯满占领阿山后，死了很多人。我的父亲从政府财政中拿钱去照顾这些人的亲属。总的来说，阿勒泰人民都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达列力汗生长的地方是外蒙古，不过当时外蒙是中国的领土。后来他在阿勒泰这里参加的革命。(0101030177)

当时骚乱发生后，听说乌鲁木齐来了兵，已经开始打仗了。老百姓向东迁移，我还小，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大概3月底，我们一直迁到布伦湖，是现在中蒙边界附近。在北边外蒙方向来了蒙军，不让入境，而北塔山那边又来了盛世才的军队。盛军放火烧人们躲藏的芦苇丛，能骑马的青壮年都逃了，妇幼死亡很多。过了几天，老百姓又回到



富蕴。当年9月份，听说被称为“土匪”的这帮人与政府订立了协议。老百姓受不了盛世才的压迫剥削而起义，却被说成是“土匪”。

1945年“三区”解放阿山地区后，乌斯满任专员，达列力汗是骑兵团团长、“三区”军队副司令。1945年4月他们之间开始出现裂痕。5月乌斯满返回富蕴，达列力汗继续留在阿勒泰，之后两人的关系就没有再好起来。对于当时的政治情况，因为我年轻所以不清楚，听说乌斯满要与贾尼木汗合作，转向国民党政府、因为获得钱物支持而背叛了革命。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两人关系越来越复杂。1946年4月双方打起来了，第一次战役在都热乌鲁巴耶戈壁滩上打响的，战役中乌斯满战败逃往北塔山。

当时乌斯满抢劫的情况的确存在，但并不是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根本上是因为他们走的路线不同：达列力汗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而乌斯满反对共产党。乌斯满之所以反对“三区”，是他相信共产党要实现公有化、强制兵役、共产共妻，而这都是盛世才政府向他灌输的。

乌斯满逃往北塔山后，调整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招兵买马，1947年7月又重新打回阿勒泰。乌斯满回来后，先到青海富蕴宣传，鼓励年轻人加入他的匪帮。达列力汗战败后，先通过吉木乃口岸出境，后来又通过塔城口岸入境去了塔城。这段时期我一直追随达列力汗。

我们从阿勒泰撤退时，乌斯满还没到阿勒泰。每天都有消息说乌斯满快到了，当他临近时，我们就撤了。当时我们先撤到西边的山上，跟随我们的有上千人。达列力汗开会说：“乌斯满不会永远占领阿勒泰，我们只是临时撤退，一定会打回来”。之后许多人就回去了，继续跟随我们的还有300多人。途中我们在布尔津、吉木乃口岸各住过一晚，过口岸时只有250多人，其他50人逃的逃、走的走。这250人中有200人过境后乘车走了，剩余的50人负责看管400匹马，而我也留下来负责管理警卫排的40来匹马。一个星期后，我们到了塔城的特洛布尔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打过仗。

我们负责赶马的人由苏军官带路，都只在夜间行动。那200人不分昼夜赶路，一天半时间就到了塔城。在塔城我们待了15天，在此期间我们招兵买马。第16天又上路开始返回阿勒泰，那些马都留在特洛布尔津。我们一共乘坐了81辆车开往阿勒泰。这些车是从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来的。到和丰县后，那里已经有了两个三区的团，团里有哈、维、蒙等新疆当时13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是骑兵。我们从福海到了富蕴后，计划用汽车运兵从布尔津进入阿勒泰，我在汽车运兵队伍中。当时，我们要保护达列力汗将军、马力列夫（苏）、吐比列夫（维族副团长）和俄国的团长等人。

从和丰县出发后，路过蒙古人的一个宗教活动点，可能要打仗，但最终没有打。晚上9点左右，团长列斯跟在前、60辆车在后，21辆车护卫后方通过了这个地方。当时布尔津的额尔齐斯河没有桥，要用人力牵引轮渡过河。打仗的军队先过了河，凌晨4点就占领布尔津。之后警卫排也过河了。布尔津城在河北岸，我们没有参战，但在河南岸能看到战火。天亮后，我们进城后在当时的公安局门口看到大概30具尸体，应该都是布尔津当地的老百姓因逃生而中弹的。他们是土匪押在监狱里的人，子弹不认人。

在布尔津我们用半天时间建立了临时政府，下午就前往阿勒泰。第二天中午十一二点进入阿勒泰，土匪已经逃走。

当时两个骑兵团从和丰县出发后，在萨勒伯特与土匪交锋。我们的骑兵装备强大，土匪败逃到了北屯一带。军队在当地因误会杀了不少胡勒塔依部落等部的人。具体人数不清楚，四五十或上百人。这是个悲剧，后来纠正了。(0101030171)

(四) 其他记忆

关于乌斯满，有两个说法：有些人说他是土匪，反共、反党、反社会主义，代表最



大的封建头目。三中全会以后，又出现了把乌斯满称为民族英雄、爱国人士的说法。我说这两种观点都片面。

乌斯满是一个普通牧民。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民族压迫、剥削很严重，不光哈萨克牧民，所有少数民族农牧民都反对盛世才。盛世才的三大政策看起来好，但实际上压迫、剥削却越来越厉害。1940年2月11日，乌斯满参加了牧民起义。第一次起义失败了，41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牧民起义。乌斯满的胆量较大。他的7个亲戚被盛世才杀了，为了这个私人的仇恨，他表现突出、涌现出来。起义中乌斯满做了大量的工作，获得牧民的认可。但9月份起义还是失败了。之后盛世才又开始进行分化政策。乌斯满发现盛世才不可靠，就拒绝交枪。一部分牧民听从乌斯满的话，也逃出去了。第三次起义由乌斯满领导。这时苏联发现乌斯满反压迫反剥削，就对他给予支持，派人力、援物力，也让达列力汗回来了，这样牧民起义就有了组织，起义有了方向，不断发展壮大了。之后，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家乡。

盛世才调至南京后，吴忠信来到新疆。但国民党仍旧是国民党。三区革命最早是在富蕴爆发的。从1944年开始，三区成立了革命军。1945年9月6日阿勒泰解放，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成立三区阿勒泰临时政府，乌斯满是专员，达列力汗是副专员及军队司令。

乌斯满没有上过学，是个牧民，所以他搬到阿勒泰城镇后不习惯。他对达列力汗也有怀疑，怕达列力汗受到苏联的影响推行共产主义。1946年5月，乌斯满偷偷地搬到富蕴去了。达列力汗几次派人去请他回来，但乌斯满都没有同意。乌斯满要求行署设在富蕴的牧场。

达列力汗和沙力列克一起去富蕴做乌斯满的工作，还给他授予了一个勋章。戴上后乌斯满说：“我不是个女人，不戴这些东西”。达列力汗他们在富蕴待了十几天，后来发现乌斯满准备对他们下手，就赶快返回。从此，达列力汗与乌斯满分道了。

这时，国民党发觉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派贾尼木汗去做乌斯满的工作，劝乌斯满不要同三区合作。因为如果走共产道路的话，乌斯满他将一无所有，包括妻子和儿女。

1946年12月开始，乌斯满先到富海，将牧民的牛羊、财物都掠走，达列力汗保护了福海。乌斯满先后来过三次，规模越来越大，双方于是就打起来了。国民党派了2个团，供应武器装备，提供了通讯设备和人员支援乌斯满。

盛世才曾与苏联有协议，允许苏联人挖矿。但乌斯满不同意，他认为苏联是共产主义。达列力汗认为开矿是两个国家议定的事，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但乌斯满认为阿勒泰是自己的家乡，不能让外人来挖。当时，乌斯满没有祖国意识，甚至不知阿山地区还有别的县，他的部落、他的清河、富蕴就是他的祖国。

1947年夏天，乌斯满借国民党军力一直打到了阿勒泰。当时阿山的三区军队驻防分散，没有准备，很快就被乌斯满攻占了。达列力汗向三区政府求援，但三区来不及派军，在这期间达列力汗一直战败。达列力汗从吉木乃出去后，又把三区民族军组织起来，10月16日攻下阿勒泰，之后将乌斯满赶到了北塔山。

第一、二次牧民起义时，外蒙是反对的。第三次起义时，外蒙受了苏联影响，开始支持牧民起义。

乌斯满后期的活动给阿山牧民带来了灾难。从清河、富蕴出发时2000多户，到甘肃只有100多户。乌斯满强迫驱赶牧民，还对富蕴、阿勒泰的牧民实行抢掠。跟随乌斯满的大部分人和他是同一个部落的，其他部落的人也有。

乌斯满的思想很狭隘。国民党和美国领事馆给他教的都是反共的，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跑。他把富蕴的2000多户赶到甘肃等地，那些牧民也吃了不少的苦。



乌斯满想在甘肃将马、驼等养壮后再往西逃。贾尼木汗的儿子逃到印度后还专门来接乌斯满。但乌斯满说：“这里还有我的45户牧民，所以不能走。我还想打回阿勒泰”。

这段时间给乌斯满当参谋的阿勒巴斯穆夫提，是从苏联过来的，对乌斯满的影响很大。这个人很反动，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卡哈勒巴斯和贾尼木汗这两个人对乌斯满的影响也很大。

达列力汗受过系统教育。1941年4月19日在苏联领事的帮助下去了苏联，躲过了盛世才的迫害。达列力汗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东方大学上了两年半的学，1944年6月从外蒙回到了阿勒泰，参加了第三次牧民起义。达列力汗是真正的革命家，他较早参加了蒙古人民党的活动，思想开阔、作风开明，是哈族中突出的革命家。乌斯满离开后，达列里汗是阿山专员，他在阿勒泰实施的政策很好，态度很积极。(0101020168)

对乌斯满和达列力汗这两个人我不太了解。在工作中或多或少知道一些。

说乌斯满为土匪，是针对他的作为的概括。这是个总的结论，是组织上的定论。同情他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部落，人数不会多。因为他的罪过大于功劳，许多人死在他的枪下。给他巴特尔称号是民族情感，是小范围内传出来的。(0201030670)

整个阿山地区，有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乌斯满是人民起义过程中涌现出的普通牧民。他是个两面人物，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牧民起义开始时，他是首领，人们视他为英雄。但他文化程度很低，基本上是文盲。后来他参加三区革命时和达列力汗一起干革命。苏联支持达列力汗，达列力汗与苏联交往的过程比较复杂，他曾多次进出苏联。

1944年，伊犁人民开始起义。阿山人民起义是三区革命的准备阶段。但三区革命的总部在伊犁。三区革命暴发在尼勒克，领导人是艾克拜尔·赛依提。那次革命与苏联有关，从苏联购买了武器。在尼勒克起义开始时，参加起义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群众：塔塔尔族的帕提克，维吾尔族的海那穆，还有俄罗斯族。但是以哈族牧民为主。

乌斯满带领人民起义，但他也有匪气。三区占领阿山后，三区政府任命他为阿山专员，也是联合政府成员。达列力汗是民族军的副司令员。但是大概从1947年开始，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主要是宋希濂，开始拉拢乌斯满。因为乌斯满对三区不满意，所以转到国民党的立场上去了。他不满意的原因包括：

1. 国民党的拉拢；

2. 哈族上层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政策的认识，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和苏联会消灭民族文化和宗教；

3. 乌斯满自身认识的局限性。

乌斯满在1947年后就离开了革命队伍，开始反对三区革命。1949年又受到国民党宣传影响，开始反对共产党，这主要是受宋希濂和马克南的影响。乌斯满与马克南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一直受到马克南的煽动。

乌斯满的命运涉及到王震。枪决乌斯满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打击面太广，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情况必须进行纠正，所以中央把习仲勋派来，召开了新疆分局的扩大会议。(01020170)

乌斯满是一个打来打去的人物：有个传言，盛世才是六角星，共产党是红五星，乌斯满看到五星标志时说：“这么多年来，我打来打去，难道就消灭了一个星吗？”(01020442)

1941年6月，富蕴来了很多人开矿。我的哥哥是副县长，他和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发现来开矿的人其实是士兵，前前后后有1000人。这个消息传出去后，副局长就被抓了。后来政府就开始抓人，一共有14人，有7人死在狱中，包括我的父亲和哥哥。那



时乌斯满并没有投降。他说：“政府先放人，我们再投降”。后来，从狱中逃出的和其他一些牧民就加入他的队伍中。

1943年7月，我们跟着乌斯满在山里躲避，还有一个叔叔哈比也是领导人。我们逃亡的大概有100人左右。

我们中有一个留胡子、中等个子、穿着较差的人，我猜测只有乌斯满知道他的来历，后来发现他是外蒙派来了解情况的。他走了后，从外蒙来了一个和乌斯满同一个部落的人，叫哈姆哈西。这个人带来一封信，内容是支持乌斯满这边革命的。这个人走时带走了一封信，内容是说我们需要并接受帮助，在信的后面盖了乌斯满和哈比的印章。之后乌斯满就与外蒙交了朋友，外蒙给我们提供了武器、枪支、游击队、顾问，还有飞机。1944年5月，达列力汗来了。当时达列力汗说，他在阿勒泰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哈密劳动；后来他翻墙找了匹马逃到了外蒙。他以前是切鲁氏部落的台吉，现在愿意来给乌斯满当顾问，乌斯满同意了。

三区政府在阿勒泰建立行署后，达列力汗将乌斯满的亲信都清除了，任职的全是从苏联派回来的人。达列力汗出了一个文件，说要将乌斯满队伍中的武器都收上来，乌斯满对此不满。乌斯满：“说这些武器是我从外蒙拿的，要交也是我交，为什么你在背后发文件？”

当时，伊宁已经建立东突政权，军队的副司令就是达列力汗。当时乌斯满发现达列力汗先前去苏联是受训，他说的经历是假的，事实上他是苏联派来的人。建立阿山地区行政机构时，只有乌斯满和富蕴县长是当地人，其他都是达列力汗的人。大家意识到达列力汗是苏联人，东突也是苏联建立的。但达列力汗已经掌握了军队，他的军衔上写的是俄语。他的地位是苏联给的，不是中国给的。

1946年，乌斯满与达列力汗之间开始出现分裂。他们规定阿勒泰是归属于东突政府的一个地区。达列力汗找乌斯满去履职，乌斯满也去了，但他说什么，达列力汗都不听。之后乌斯满就转向国民党的了。达列力汗是借助苏联的力量获取了阿勒泰的革命果实。乌斯满说：“我迷路了，东突派达列力汗来这是苏联的事，中国的合法政府是国民党，我要归属国民党。”1947年，乌斯满占领阿勒泰，达列力汗逃往苏联。10月份达列力汗从苏联带了军队和武器装备，又夺回了阿勒泰。当时达列力汗的军队太强大了，乌斯满没有与他们打，而是退到当时的乌鲁木齐地区，转向了国民党。

一直到解放，我都与乌斯满在一起。1949年9月底，乌斯满和我住在同个阿吾勒。乌斯满说过：“我原来与国民党打过，后来与国民党合作了。不知新的共产党如何对待我？如果他们接受我做老百姓，我就做老百姓，我准备去巴里坤”。当时我说：“这些事等以后再商量。我不确定我的人会不会跟着我。”当时乌斯满心里不高兴了。不一会儿，新政府派人送信来说第二天要开会。第二天我到县里后，才知道已经解放了。

后来乌斯满带100人左右去了巴里坤。1950年2月时，新政府派我去劝降乌斯满，承诺说不会追究他的既往。乌斯满说：“我在巴里坤等着，只是想知道新政权对我的态度”。所以派了一个手下和我一起回乌鲁木齐。贾尼木汗也派人一同回到乌鲁木齐。因为这件事，政府还奖励了我几块砖茶。后来政府又派了一个原国民党军官、一个是原新疆报社副社长去见乌斯满，他们也都是哈族。再后来，就听说乌斯满和解放军打起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乌斯满的消息了。

听说是一个叫哈巴斯的人打死了一个司令。东突的一个人说是乌斯满干的，就带着东突的军队去打乌斯满。

我们当时对东突政府和对达列力汗很不满。我不懂政治，但当时不应该枪毙乌斯满。富蕴的阿塔什根对我说过：“1951年时参加人民大会，阿勒泰来了八、九个人，团长是



帕提汗。他们给政府写了封信，说要代表阿勒泰人民要求枪毙乌斯满，乌斯满给人民带来很多灾难，若不枪毙乌斯满，阿勒泰人民不满意”。听说这些都是东突的人要求的，应该不是王震的过错。(0101010480)

王震 1983 年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过话，说：“乌斯满是民族英雄，是爱国者，没有乌斯满，北塔山被外蒙分裂走”。听说 1992 年中央要恢复乌斯满的名誉。会议开了半个小时之后，就说中央来电话，要求把文件收走，通知此文暂不要发。

马克南去过北塔山，也去过乌斯满家。他说：“美国支持你这样的民族英雄，我们欢迎你到美国去”。乌斯满回答说：“我哪儿都不去。野驴都舍不得离开它生长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人，舍弃自己的故乡，难道我还不如野驴！”(0101040375)

1949 年解放的时候有问题。在阿勒泰反对盛世才的革命期间，盛世才脱离苏联后，苏联派顾问到阿勒泰帮助阿勒泰人民反对国民党，蒙古国也派来了顾问和武器。以前苏联派军队支持盛世才镇压阿勒泰革命，盛世才脱离苏联后，苏联又支持阿勒泰革命反盛世才，派来顾问有 12 人。蒙古的总统乔巴山与阿勒泰的领导人见面后，提供了 200 支枪，20 支机枪等轻型武器；还派了 100 多名在外蒙古的哈萨克人前来支持。当时，阿勒泰的领导人是乌斯满，他对阿勒泰的解放有很大的贡献。但在解放军入疆前，乌斯满投向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所以他以前的功绩都付之东流。乌斯满本来是个英雄。1945 年阿山解放，苏联顾问在组建阿区政府时，苏联方面的人占了主导，乌斯满不高兴。乌斯满有这么大的功绩，但在共产党进疆时，因为没有投诚，就被枪毙了。

原来乌斯满和达列力汗是一起战斗的，以后就分开了。乌斯满靠国民党支持，达列力汗靠苏联支持。分开后，导致两边的哈族打仗，死了很多人。至于分开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中央可能清楚，但现在还不是讨论的时候。(0101040279)

第六章 谁是乌斯满——基于纠结表述的多元分析

(一) 结构差异与历史记忆

1. 历史文本与族群记忆的比较分析

当时盛世才军队是现代化的正规军，这边的军队不能与之相比。乌斯满走后，盛世才抓了乌斯满的家人，派往可可托海矿区（原来的县城所在地）。当时游击队占优势，当盛军撤退时，将乌斯满的 4 个女儿、2 个儿子杀害。当时乌的游击队已包围可可托海，乌斯满的弟弟达列里汗也死在国民党手里。(0101030548)

阿山地区牧民第二次暴动又被盛世才镇压下去，但是，暴动头目之一乌斯满并未投降，他带领少数亲信逃至布尔根河。乌斯满是可可托海哈萨克族莫尔合部落人，他参加了第一次暴动并隐藏下了一批武器，因此有一定实力。第二次暴动失败后，他仍然保存一定实力。1942 年以后，得到苏联和外蒙古的支持，力量逐渐壮大。(陈慧生、陈超，1999：388-389)

历史文本与族群记忆在传承主体上的差别使得“谁是乌斯满”存在着民间与官方的不同解释。由于族群记忆是经由人们口传相称，人们在记忆历史时，往往难以达到官方记忆中所彰显出的时代进程与结构张力，对于历史真实或历史人物的描述更倾向于感性的个体层面。所以，人们在关于乌斯满的历史描述中会糅合进较多的个体情感，或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构建作为群体内部成员的乌斯满。

2. 两种历史文本间的比较分析

阿山区的乌斯满和达列力汗等率领的武装力量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下日益强大，不断打击驻守阿山各地的国民党军队，迫使新疆国民党军事当局于 1945 年



2月24日下令，从富蕴、乌河设治局、大布逊等地向奇台撤退。当时，正是冰雪封冻的严寒季节，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步行撤退，粮食给养十分困难。加之阿山区的哈萨克族武装力量沿途拦截和追踪追击，撤往奇台的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富蕴、乌河设治局、哈拉春柯、二台、大布逊等地即被阿山哈萨克族游击队占领。（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1998：76）

因哈萨克族素以劫掠为习惯，乌斯满获得胜利后，横征暴敛，暴虐情况胜于汉族人统治阿山百倍，还不仅如此，达列力汗被俄国人培养后，其劫掠贪暴更甚于乌氏。还有外蒙的军队，犹如穷困中的土匪，遭受虐待的不独是汉族、而维、回各族也遭到迫害。（张大军，1980：6362）

乌斯满在民国时期与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记忆分野，并不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进程。在以公元为通例的时间记忆过程中，基于宗教、政党、文化等差异，不同的地区和族群也会采用自身认为是合理的地方性时间。地方性时间象征着与其相对应影响因素的客观存在，而不同群体间的差异选择，代表着他们对于自身归属的认同；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多元化认同势必会形成多元的历史记忆。

（二）同质历史记忆的多元分析

1. 同一文献内的纠结表述

（1943年，）由于哈萨克人头目乌斯满在阿山组织暴动反对盛世才的统治，盛世才虽然派属下柳正欣师长率兵坐镇阿山镇压，但已无法控制阿山局势，国民党乘机以平乱为理由派大批部队进疆。（陈慧生、陈超，1999：368）

乌斯满是在阿山牧民反抗盛世才统治的暴动中出现的一个哈萨克族头目，省联合政府成立时，乌斯满成为省府委员兼阿山专员。（陈慧生、陈超，1999：423）

历史记忆的书写受到一定的社会政治因素影响，在历史文本记忆产生过程中，不同的结构需求与书写诉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产生的过程。由于历史记忆结构产生的记忆诉求不同，在乌斯满、暴动、头目这三者之间呈现出纠结互动的表述关系。乌斯满何时成为头目？谁是引起暴动的头目？这些问题决定了乌斯满在历史记忆中的身份归属。

2. 同一时间历史真实的纠结表述

历史记忆是由反映着每一次历史真实的记忆积累而成，但同一历史真实在“当下”的表述中亦会存在差别。

蒙疆北塔山事件真相大白 蒋军越界侵犯蒙古被蒙古陆空军驱逐出境

【新华社陕北十七日电】塔斯社广播：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十五日就六月五日发生之北塔山事件发表声明称：“六月九日，中国‘中央’社发表报导谓：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营于六月五日攻击新疆省东部北塔山（蒙古名为北塔克·波格达）山脉附近的中国军队，据称并有苏联标帜的飞机四架参与此事。该社嗣又散布报道谓：蒙古军队伸入中国领土二百英里的内地。六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代表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论及中央社此项报导时，不但没有否认中央社所称蒙古军队伸入中国领土的谰言，反确定北塔山脉乃位于中国领土之内，远离蒙古人民共和国疆界之说法。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声明：关于上述蒙古军队在苏联标帜飞机掩护下伸入中国领土之中央社报导及中国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的声明，是全属谬误，并显系为了挑衅目的而捏造的。这些声明的谬误，可由下面事实见之。北塔克·波格达山脉（中国称北塔山）并非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咬定的是位于中国领土上，而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至于六月五日在蒙古——新疆边境所发生的事件，其事实如下：中国军队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在离国界的十五公里的塔歇尔图拉（白塔克、波格达山脉）东北的红即尔蒂克·哥尔河附近扎营，并开始挖掘及构筑工事，同时侵袭常驻该区的蒙古边疆哨岗。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司令



部发觉中国军队非法侵占本国领土时，仍希望防止冲突，并考虑到现存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即派交涉员至中国军队指挥官处，要求他们完全撤出蒙古领土。中国指挥官不但拒绝这一合法要求，而且违反国际公认之惯例，中国方面竟将蒙古交涉员予以扣留。同时，中国军队继续深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鉴于此种情况，蒙古边防军被迫采取行动，以便驱逐侵犯军出国境。蒙古边防军当在几架蒙古飞机掩护下，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境。在这一行动里，外蒙军队并未越界进入中国境内。在中国军队离开蒙古领土之后，六月九日，在他们设营的地方，发现蒙古交涉员的尸体。从尸体可以看出：蒙古交涉员是在受了酷刑之后被杀死的，手脚都给烧了，肚子也被扒开了。另外还捡到四个蒙古边防卫士的尸体，眼睛都给挖了。以上都是实际情况，而为中央社及中国外交部官方代表所故意歪曲，且意存挑拨者。中国军队强暴地侵入蒙古国界，并且违反公认之国际关系的原则，用野蛮手段杀害蒙古交涉员，已使蒙古人民无不义愤填胸。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向中国政府严重抗议，并保留权利要求中国政府严厉惩办侵入蒙古国境及惨杀蒙古交涉员和边防卫士的罪犯们，及要求赔偿蒙古军共和国因中国军队之挑衅行为而遭受之损失。（《人民日报》，1947年）

【本报讯】新疆府委鲍而汉氏，昨午后于寓所，接见记者，就新疆军政有关问题答问如此：一、外传苏联军队两队开入伊犁之消息，正确性甚少，盖苏联若举进病伊犁，则为严重之国际事件。本人从未接获新疆方面任何消息，唯相信不可能有此类事件发生。二、关于白塔山事件□□如何，本人不知道实际情况，不便奉告。惟白塔方面原系外蒙军队，与此项传为苏联军队恐系两件事。三、报载阿山有军事冲突情形，本人为新疆籍，略知内情，此实系种族之争，该地原为乌斯满驻守，去年一度退出，最近又打了回去。四、阿合买提·江失踪之传闻，也很使人怀疑，恐怕误传，至于伊方已否答复张治中主任五点询问，本人尚未获得新消息，因离开新疆已快一月也。本人眷属日内飞京，对新疆近况，届时当可藉之一、二。5. 新疆五年建设计划，需待政务会议提付讨论后，交国务会议审议，政府要办之事太多，一时尚未及此，不过本人相信中央有决心建设新疆，因此乃蒋主席之诺言也。（《新民日报》，1947年）

对于北塔山事件而言，由于存在着民国36年与共和国1947年两种不同的历史时间表述。所以，即使是产生于同一公元时间节点的历史记忆表述也不尽相同；二者记忆的重点与诉求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在民国与共和国之间，不同的表述代表着不同的国家认同取向。

3. 历史记忆与时间进程

新疆省政府和伊宁和平条约成立后，乌斯满被中央任命为阿山专员。那时某国以宰制伊宁的姿态，想操纵伊宁、塔城阿山等地区，但是乌氏坚决表示反对，三十五年八月间，苏联人在阿山区内采掘金矿的要求给他拒绝了，外蒙方面派几个武馆到阿山游历，让他保护，他也拒绝了，同时他又派亲信哈拉提巴依到迪化进谈张兼主席治中，请求援助，并表示倾向中央的赤诚。后来又派鱼苏尔巴依携带一个“统一阿山计划”来，请张主席帮助他实现，张氏向主和平，虽然承认他计划中收复富蕴、吉水等是阿山专员分内应做的事，但又恐因此引起伊宁方面误会，所以除了资助他一些军火枪支外，却力戒他不可操切此事。

乌斯满是英雄，蜜蜜姑娘也是英雄，英雄碰着英雄不是你死我活的打，就是披肝沥胆的惜，至于性别不同的英雄相遇，那就是怜惜多而想打少的了，乌斯满和蜜蜜姑娘，能够做夫妻，是完全建筑在惺惺相惜的上面，不过有许多传说是神话式的，现在附带写一写。（叶淑渝，1948b: 7）

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发展也会产生变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随历史记忆主体的利益诉求而改变的。民国时期的乌斯满，因为经历了与国民党在不同时期的选择转变，所以在北塔山事件之



后，也成为民国英雄。这种“英雄主义”形象塑造的背后暗含着民国政府对于边界、国家的政治需求。

（三）族群记忆的多元差异

1. 族群内的代际差异表述

族群记忆在群体内部传承的过程中，存在代际差异。不同世代的成员将自身对于历史的记忆镶嵌在民族史/国家史范式的历史叙述之中，从而确定其自身在民族史/国家史中的归属。

乌斯满家族对于父亲乌斯满及爷爷乌斯满的记忆均形成于 1949 年之后，因此他们的记忆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共和国时期的印迹，以及对于新中国的认同。

乌斯满被抓后，被安排在敦煌，三个哥哥都逃出来了，一直逃到阿勒泰地区。他们 1952 年与共产党达成有条件协议。9 月 15 日，有手下的士兵。当时达成协议的人叫何家新（注音），是当时驻阿军官。条件有 11 项：1、乌斯满活着的话要回来，死的话要尸体；2、要把留在甘肃的家属带回；3、要把因为是乌斯满手下之名而进监狱的人都释放；4、要宗教自由；5、要恢复正常的生活方式，建毡房，分家畜，有草原；6、要知道我们的完全信任共产党，否则不交武器；7、不追究我们的过去，可以开始新生活；8、与国民党、东突征战时因供给困难而抢了一些牧民的羊、马，此事不追究，怕很多人出来追究等。

我们的党很伟大，这些都接受了。当时共产党的一个条件是，过去的事情不追究，对新的问题加重罚治，如果有新的反对政府的行为，就会追究过去。（0101010555）

看到乌斯满被押回来，人们全都出来。乌斯满骑在一个大马上，没有被绑着，在解放军的包围中过来了。大家都哭，乌斯满说：“不是谁抓了我，是安拉的意志。你们不要怕，这个党不会让你们死。”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0101030548）

但由于个体成长经历及社会环境存在着时间向度上的差异，所以他们对于当下的利益诉求及现实理解又存在着代际区别：成长于建国初期的儿子更注重乌斯满为了祖国统一而做出的个人努力；而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孙子则强调乌斯满与“东突政府”之间的差别。

当时，在维、哈中有一个建立东突厥斯坦的运动。到 1946、1947 年时，他们开始向我的父亲宣传这种思想，但我父亲反对建东突政府。为了祖国的统一，他重新与国民政府和好，暂时搁置私仇，一直合作到 1949 年。

国民党 1943 年在富蕴清枪，把乌斯满的 5 个子女扔进井里，还有一个失踪了。这是他与中国国民党的血仇。1948 年他放下血仇，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打击外蒙。当时斯大林有把新疆分离出去的阴谋，所以乌斯满与三区开始作战。当时他与国民党作战时，外蒙给了飞机、武器及军官，其中两个人是莫尔合部落的，乌从这两人口中知道了这些。斯大林支持的东突政府将他任命为阿勒泰专员。阿力汗曾对那两个外蒙军官说，一是要说服乌参与东突政府，如不能说服，就谋杀之。哈勒哈拜依将情况告乌斯满说：我亲眼看到您所做的一切，谋杀您，我做不到。您自己要小心。之后，乌斯满就撤出了阿勒泰，搬到山上去了。（0101010555）

当时国民党在奇台为乌斯满提供了武器、装备，组织了一千多人。47 年乌斯满打回阿勒泰，达列里汗逃往苏，过一段时间又打了回来。当时在下阿勒泰有一个坚铁克依的胡勒台部落支持乌斯满，达列里汗带苏军杀死这个部落的人，死伤 300、400 人。这时，乌斯满与三区的冲突达高潮。当时的三区政区是东突人民政府。据说当时有一个阴谋，达列里汗的军队穿民族服装在塔城等地做土匪行径。因为如果下阿勒泰人民也一致反对乌斯满的话，达列里汗为什么要打杀胡勒台部落？（0101030548）

2. 族群内的部落差异表述

关于乌斯满的资料很少，达列里汗的资料多，因为达列里汗是台吉，也是政府官员、



部落头目。达列里汗与苏联有关，是在苏联怀抱中的人，这是乌斯满与达列里汗冲突的原因。乌斯满和苏联没有关系，与别的政府也没有关系，但他有一种思想，就是要维护信仰宗教。苏共领导的时候，与宗教作对、反对私有制，乌斯满不喜欢这样。他没有读过书，没有特别的理解。但他相信安拉的存在和古兰经。乌斯满会念经、也封斋，阿合提讲经时他听得很认真。他是巴特尔，死都不怕，跟盛军作战时面对强敌，敢于以寡乱众甚至孤身奋战。贾尼木汗、哈德万与乌斯满不一样，他们是向国民党投降的人，乌斯满是与国民党打仗的。(0101010586)

达列里汗受过系统教育，1941年4月19日在苏领事的帮助下去了苏联，躲过了盛世才的迫害。达列力汗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东方大学上了两年半，1944年6月经外蒙到阿勒泰，参加了第三次牧民起义。达列里汗是真正的革命家。较早参加了蒙古人民党的活动，思想开阔，作风开明，是哈族中很突出的思想系统的革命家。乌斯满之后，达列里汗是专员，在阿勒泰的政策很好，态度很积极。(0101020168)

在现代社会交往互动过程中，哈萨克族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部落认同。部落作为哈萨克群体内部认同的基础单位，在国家、民族等结构之下，对于解决内部事务、产生认同归属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社会群体的划分层次细致到部落层面之时，哈萨克群体内部成员会以部落归属作为确立与他者互动关系的首选。因此，族群内部产生的历史记忆会在部落层面产生差异。

(四) 关于“土匪”乌斯满的不同逻辑分析

历史记忆作为“我们”共享的叙述表达，为“我们”在历史之途上进行了归属定位，区分了“我”与“你”、“他”之间的差异。这种社会化的历史记忆差异，塑造出不同的集体性认同，成为“我们”得以存在的权力基点。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中，我们把时间、行动、事件等因素自由组合，微妙灵活地重新进行排列并产生历史记忆，最终达到了强化“我们是谁”的目的。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历史记忆成为一种权利功能工具，以“历史”的名义描绘出一幅幅现代性图景。

事件的发生是按照一定的次序顺序结构而产生的，并非是杂乱无章地共存于一个平面的心理图景之中(埃利亚斯, 1998)。我们对于历史记忆的选择与塑造，不是凭借一种天赋的认知能力，而是在长时期的历史进程发展之后的结果。历史真实的意义在于历史事件的客观发生与逻辑顺序的单向不可逆转，所以已发生的历史事件成为了历史真实得以存在的前提。在有关乌斯满的三种历史记忆中，关于他是不是“土匪”的身份之争成为塑造出不同历史记忆的叙述前提。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哈萨克族群在尊重历史记忆的客观真实性基础之上，对乌斯满进行差异性“再记忆”，并采取不同的叙述策略以保证叙述的合理性，塑造出了符合自身价值诉求的“乌斯满”。

作为“土匪”的乌斯满在三种历史记忆中均有所体现：

乌斯满从1943年7月到1956年7月这三年中，以十来名的小股土匪发展成为独霸阿山地区的巨寇，自称为哈萨克王。1946年8月，投靠了国民党。(拉提甫, 1979: 103)

因哈萨克族素以劫掠为习惯，乌斯满获得胜利后，横征暴敛，暴虐情况胜于汉族人统治阿山百倍，还不仅如此，达列力汗被俄人培成后，其劫掠贪暴更甚于乌氏。还有外蒙的军队，犹如穷困中的土匪，遭受虐待的不独是汉族、而维、回各族也遭到迫害。(张大军, 1980: 6362)

乌斯满从普通百姓那也抢了东西。什么都没有的穷百姓，他不会抢，抢的都是富人。他起义时，哈族中的富人很少，有赞成起义的也有反对的。对反对的人，乌斯满就抢他们的。那些赞同他的都是自愿捐物。那些被抢的富人称乌斯满为强盗、贼娃子。

(0101040547)

三种历史记忆中对于“土匪”乌斯满的回忆都包括抢劫、掠夺、暴动等典型匪行，乌斯满的土匪身份在三种历史记忆中理应是统一的。但在共和国时期、民国时期及族群记忆中，为何却形



成了关于乌斯满的三种差异性形象呢？

我们首先简短讨论下什么是“土匪”。“土匪”的定义和内涵是衡量历史记忆差异的标准。“土匪”首先强调的是“土”，也就是一种地域性，或可称为本土地域关系属性，其所涵盖的是与主体族群具有相同活动区域的共生性要求。这是与遭受外来势力侵入相对而言的，正如“洋鬼子”、“红胡子”被用来指代对中国进行骚扰的外部力量，“土豪”、“土匪”是那些产生于本土的反抗力量。“匪”是相对于“我”而言的，凡是与“我”的利益、目的、行为相反的群体，均可称为“匪”。因为“我”对于自身的存在具有天然合理性，所以“匪”就意味着反动、倒退，甚至是暴行，而杀、烧、劫、掠、抢等往往就成为“匪”的主要标准。在中国历史上，“匪”扮演着与“中央”、“地方”等政治权威相抗衡的角色，匪帮匪行对“中央”造成骚扰、对人民造成伤害。但“匪”也不是天然就有的，通常源于“揭竿而起”的弱小力量，在不断的劫掠财物及俘虏民众之后，势力得以强大。所以，“土匪”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区域性军事力量，是与“叛徒”、“汉奸”具有本质差异的。土匪之所以为匪与国家转型、政治博弈等宏观社会背景极其相关。

“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的历史记忆，往往采用“倒叙”手法进行“国家”、“民族”的权力知识构建。所有的历史真实以民族、族群、国家、认同为线，交织成一张意义之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力量，以增强我们的认同归属。这种历史观下的历史记忆，是以国家性质为前提的对历史事件的追溯与创造。

关于乌斯满，之所以会形成共和国与民国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是因为在历史记忆产生之初，他就已经被赋予了某种可以支撑国家性质合理性存在的标签。

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指示哈萨克族败类乌斯满进攻三区，企图重新奴役三区各族人民。乌斯满本是阿山区富蕴县克烈部的惯匪，1940年曾混入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反抗盛世才的暴动队伍中。1941年暴动失败后，乌斯满率领一批土匪，到处抢劫，杀人放火，无所不为。1943年以后，又混入三区革命的阿山起义部队内，进行破坏。（《当代新疆简史》编委会，2003：48）

哈萨克英雄乌斯满出现，正是盛氏极权的克星，也是新疆六七年来纷乱的扮演者，自从得苏俄支援后，北疆乱局日益蔓延，影响所及，整个全疆的哈族几为之蠢动。（张大军，1980：5187）

为了保持自身的合法化，民国与共和国在结合历史真实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首先明确了乌斯满的历史定位及政治属性，继而以倒叙的方式从“我”的立场进行历史记忆的塑造。这种“性质先决”的历史观，使得历史事件成为一种目的性的存在，并以构建“当下”为主要任务。而对于历史真实中的具体进程，只会选择性地回忆。

对于族群记忆而言，个体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或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往往很难达到“国家”层面的宏观理解与宏大叙述，只是片段化的个体记忆。但作为国家、社会、集体的一分子，个体记忆的形成又势必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形成了一种在“国家”与“我”之间平衡协调的族群记忆。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土匪”乌斯满进行研究，并不是要去考证乌斯满的社会身份，而是要以不同语境下的差异为切入点，探讨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历史书写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华民国（ROC）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作为两个连续的历史进程阶段，在时间延续的基础上完成了国家政治转型。因此，在民国与共和国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框架下，理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纠结互动、理解民族国家的历史表述与族群记忆之间的关系、理解当代语汇中“民族”（minzu）与“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两个概念的含义和关系，认识传统意义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以及这些模式所蕴含的历史政治文化意义和现实影响，是“中国人”（chinese）在现代转型时期实现自我认同首先需要理清的历史思考路径。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梳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历史记忆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我们理解和评估当代中

国的民族建构、族群认同、现代身份体系等提供借鉴。

因此，乌斯满在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及哈萨克族群三者之间、在“中华民族”与哈萨克族群二者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历史记忆。三种历史记忆对于乌斯满“匪行”的时间逻辑安排是支撑乌斯满究竟是“土匪”、“英雄”还是“巴图尔”的思考路径。也就是说，乌斯满何时为匪、何时非匪的叙述结构成为产生三种历史记忆的差别划分标准。在这三种记忆之中，我们得以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看到民族与族群的多元表达、看到社会连接不同群体的制度机制。这些都反映着“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追求与认同取向。

“谁是乌斯满”究竟是一个历史问题，还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是与乌斯满有关的每一个学者、哈萨克人、政治家都应该思考的。事实上，历史记忆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反思现代知识生产框架的路径。伴随着现代国家体制的成熟，工具理性的政治经济视角不应该继续影响现代知识的产生；我们在保持“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凝聚力以保证国家统一完整的同时，应该跳出传统意义上历史书写的局面，在历史真实面前，完成对于“我们是谁”的认同归属。

第七章、“我”的乌斯满

在历史记忆构建的过程中，每一个记忆的承载者都勾勒着自身记忆之海中的“乌斯满”。乌斯满是“匪”还是“巴图尔”，已不仅仅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脉络中、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变化，更是在“民族国家”这幅宏大的历史图景之下，每一个个体进行认同归属选择的记忆表达。也许在记忆的汪洋中，每一个“我”的心中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乌斯满”。

尊敬的乌斯满先生：

我通过此信向你致以同志般的敬意，愿真主保佑你！

你了解我们这边？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人民赋予的工作，过着平安的生活。这边人的生活比你们在的时候好得多了，这一点，也许你是有所了解的。过去，由于你有种种误会，我们的和平日子遭到了破坏，而你带领部分牧民迁到了外地他乡。现在我以同志的情谊，希望你为了不要使人民再受流离之苦，带领他们返回热土家园吧！

……

为了不再使人民遭殃，你要亲自带领他们返回家乡！只要你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坦白忠诚地立功的话，人民政府是会欢迎你的，谅解你的。俗话说的好：“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保证一定保护你，使你不受任何惩罚。我以同志身份向你写最后的一封信，希望你充分考虑，并为实现我上述希望而努力！

此致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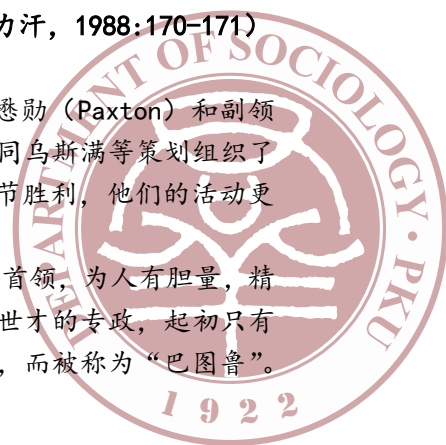
上将：达列力汗

1949. 8. 20

（达列力汗，1988:170-171）

乌斯满、贾尼木汗的反共叛乱，有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克南（Mackenan）在背后做主谋。早在1948年，马克南便同乌斯满等策划组织了一个所谓“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们的活动更加嚣张了。（包尔汉，1994:350-351）

乌斯满生于阿尔泰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领，为人有胆量，精于骑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1937年起，他就反对盛世才的专政，起初只有7个伙伴，以后得到阿尔泰区多数哈族人的拥护。因他骁勇善战，而被称为“巴图鲁”。



盛世才曾几次派兵去剿他，由于他地形熟悉，加上他那时得到外蒙的支援（一开始，外蒙曾援助过他，以后不知何故决裂了），盛世才消灭不了他。1944年11月7日爆发了伊犁事变，乌斯满参加了这一运动，到1945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相继脱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统治。

.....

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曾写一封信给迪化行政专员哈德万。这封信是对全国同胞及伊斯兰教徒发的，在这封信中有如下的语句：“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首先举起了革命的旗帜，我乌斯满在8年以前就领导着哈萨克族的优秀青年与盛世才暴虐的黑暗政治奋斗到现在，我们以为和平条款签字，民主的新疆省政府成立，我们革命的目的，就算成功了一半，其余应该努力的一半，就是在和平保障之下，实施各项建设。岂知我们的革命就在此时变了质，为革命而牺牲奋斗的哈萨克同胞反而成了被清除的对象。现在已经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强大武力，自本年2月1日起开始向我们阿尔泰区进攻，我乌斯满被民主的新疆省政府任命为阿尔泰区的专员，我是国家的官吏，有守土的责任，为了执行和平条款，为了奉行施政纲领，保障国家领土，拥护张兼主席建设新新疆的政治主张，我们阿尔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坚决对一切破坏国家统一，摧毁宗教的恶势力，予以严重的打击……希望全国同胞，尤其是伊斯兰教胞，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给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以最大的援助。”

这封信曾译给张治中看过，他不许发表，因为恐怕刺激伊方，引起和平的破裂。同时他更恐怕刺激苏联，因为信中说到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强大武力”，似系影射苏联。（宋希濂，1986：237-244）

不同的族群团体、政治集团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我”在不断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寻找、塑造着“我是谁”的记忆。人们力图寻找在多元群体划分的边界中，“我是谁”。

人们关心“我是谁”，本质上是在寻求着自我认同的基础。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这种基础是通过“我”与“他”互动、反思而建立起来的。只有理解了“我是谁”，才能明白“他”是谁；通过明确了“他是谁”，才能真正揭开“我是谁”的意义。

在关于乌斯满的历史记忆中，人们一直在界定“谁是乌斯满”，似乎乌斯满是决定着这些历史记忆承载者的关键。当我们讨论乌斯满是谁的时候，也许我们更需要思考：乌斯满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意是乌斯满是谁，还是我们是谁？

如果说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家史的叙述在构建着国家的“合法性”存在及发展的基础逻辑，那么在宏大“国家”背景下的个体，就是在塑造“我是谁”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合理性存在不断嵌入于国家“合法性”的过程；也只有选择遵循于“法”，“我”才得以存在。

但社会之所以多元，就是在寻求“合法性”过程中，每一个“我”又千差万别。族群归属、政治面貌、教育背景都影响着“我”塑造记忆的过程。

也许，对于“我是谁”这一个人们苦苦追寻的命题，是我们在经历时无法回答、只能由后人来进行评述的。“谁是乌斯满”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种证明自身存在的符号，是在复杂交错中自我的定位与象征。

| 姓名 | 民族 | 出生地 | 生卒日期 | 政治面貌 | 教育背景 | 社会身份 | |
|-------------|------|------|-----------|------|----------------|-------|--|
|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 | 哈萨克族 | 新疆阿山 | 1906-1949 | 无 | 1941年赴苏联阿拉木图学习 | “三区”时 | 阿山游击队总指挥，阿山专署副专员、专员、民族军少将副总指挥，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卫生处长，新盟中央委员。 |
| | | | | | | “三区”后 | 无 |

| | | | | | | | |
|-----|------|--------|-----------|-------|--------------------|-------|---|
| 包尔汉 | 维吾尔族 | 俄国喀山 | 1894-1989 | 中国共产党 | 1929年柏林大学政经系 | “三区”时 | 新疆省民政厅副厅长,迪化专区专员,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国民政府委员、新疆省政府主席。 |
| | | | | | | “三区”后 | 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 宋希濂 | 汉族 | 湖南省双峰县 | 1907-1993 | 中国国民党 | 黄埔军校一期 | “三区”时 | 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参谋长,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
| | | | | | | “三区”后 | 1959年1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年8月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总顾问。1984年2月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
| 陶天白 | 汉族 | 安徽省长丰县 | 1916-2007 | 中国国民党 | 黄麓乡村师范学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三区”时 | 张治中私人秘书 |
| | | | | | | “三区”后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委员、奎屯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伊犁师范学院奎屯校区副教授 |

八、讨论

“民族国家”的产生使“民族”得以以“国家”的形式存在,“国家”在政治、历史、文化及族群关系等维度上强化着对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共同体,在历史之途上不断地进行融合与吸收,协调与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国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合理性存在,“中华民族”通过历史记忆的塑造不断丰富着自身对于“中华”的认同与归属;其内部各族群在“中华化”的进程中,也保存着这种归属进程的记忆。

历史文献与族群记忆在各自历史记忆形成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回忆与还原均以真实性为基础,在宏观结构与发展进程上描绘出了我们当下所能把握的历史真实的全部面貌,二者在事件还原与陈述逻辑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但这两种历史记忆的生产主体、存在形式又有着官方与民间、文本与口述的差别,所以在塑造记忆的选择性表述过程之中,详略不同,轻重有异。

任何一种历史记忆只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每一种历史记忆都力图自身最能够代表历史真实。如果说历史是由不同主体、事件、过程纠结互动而成的,那么多种历史记忆的交织深处就隐藏着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在不同主体的表述之下,产生出对于记忆以及与记忆相关的环境、社会、人物、情感的差异。历史文本与族群记忆之间不仅仅是存在形式的区别,而是个体、族群对于历史属性、自身归属的选择差异。谁的“历史”是历史?谁的“历史”才是历史真实的体现?这些思考基于人们对于自身社会性选择的一种反思,也影响着他们眼中历史的价值归属。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列强凭借“船坚炮利”不断逼迫中国割地赔款,使中国逐渐从一个“天朝大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得不接受西方政治文化中“民族国家”的理念及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从“天下主义”中孕育出“民族主义”(孙隆基,2004:6)。但是在已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十分曲折,在扭转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的同时,对内也需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且需要在社会意识中培养对国家、政府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共和国时期的中国经典族群史研究是以共和国初期的民族构建为概念基础的。共和国初期的民族构建通过从历史根源以根基化族群、由语言分类来区分并系统化族群、以文化风俗描述来典范化各族群并由现代化程度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形成了今天“56个民族”共同繁荣的局面。可以说，在斯大林的经典“民族”概念下，通过找寻、分析典范化的族群文化历史，创造出了今天的中国多族群结构，这与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存在着认识论上的巨大差别。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族群与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五族”到“56个民族”的变化是历史进程和不同时期国家形态的历史诉求表达。

因此，“民族”、“国家”这两个基础性概念既是相关知识生产的动因与手段，也是知识生产的目的地与结果。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记忆对于“民族国家”的表述也存在差异。今天，我们运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记忆，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呈现中国社会现实、追溯中国历史的时候，势必会陷入与民国时期的历史记忆差异、甚至矛盾的境地。

在族群多元的现实背景与国家政治统一的合法性诉求之间，“民族”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殊性与地域边界性使得“多民族”的差异性现实很难与“国家”的政治追求达到和谐。因此，在中国运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实现国家的维系，必须以承认历史记忆的多样性形式与合理性存在作为前提。正如杜赞奇所说，“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杜赞奇，2003：16）。历史的主体并不会因为政治转型、经济发展而产生结构性的本质变化，他们只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不同的阶段中，因为不同的现实诉求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记忆。“什么是中国人”、“谁是中国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中人们产生归属与认同的核心问题，历史记忆的延续与差异是找到答案的钥匙之一。历史记忆是对中国社会基本构成和文化表征的理解方式，是我们在认识和解释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发生、渗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各种亚群体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社会边界（social boundary）的变动时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王明柯，2006a、2008；马戎，2008：41-46）。

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进程，充斥着利益、关系、矛盾、竞争的位置转换。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会因自身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知识体系理解上的深化、现实利益诉求上的转变而产生变化，在发展协调之中，历史记忆不断修正着自己的面貌。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历史记忆背后暗含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诉求，与时间、场域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在历史记忆与“民族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历史记忆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根源性、知识性的基础，“民族国家”为历史记忆进行生产的可能性提供了外部环境保障。

如果说，国家利益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选择的前提，那么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出发点就是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经历了以“民族识别”为代表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各少数民族的认同与接受、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各少数民族的保护与发展等民族清晰化过程；现在又进入到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主旨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不同时期国家民族的利益诉求，对历史、民族等基础核心概念的界定，对转型时期的政治力量关系、内部族群归属以及历史进程性质的讨论与思考也会产生多样化的解释。

参考文献：

- 阿尔帕德·绍科尔采，2008，《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埃利亚斯，1998，《文明的进程》，上海：三联书店。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2000，《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上海：三联书店，1998.256。
白振声、鲤渊信一主编，1992，《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1980，《中国现代史（1919-1949）》（内部资料），北大历史系印。



- 蔡锦松, 2005, 《盛世才外传》,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 陈超, 2009, 《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陈慧生、陈超, 1999, 《民国新疆史》,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杜赞奇, 2003,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费孝通, 1989,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第1-19页。
- 福柯, 1998, 《疯癫与文明》. 上海: 三联出版社。
- 富蕴县史志编纂委员会, 2003《富蕴县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郭廷以, 1972, 《俄帝侵略中国简史》, 台北: 文海出版社。
- 纪大椿, 1993, 《新疆历史辞典》,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菅志翔, 2007, 《民族的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 《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第22-31页。
- 菅志翔, 2008, 《族群: 社会群体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工具》, 《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第138-146页。
- 李国栋, 2007, 《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李新、陈铁建, 2001, 《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厉声, 2006, 《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刘阿荣, 2006, 《社会学与现代社会》, 台北: 威仕曼文化。
- 刘昶, 1987, 《人心中的历史: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马克斯·韦伯, 2000,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马戎, 2004, 《民族社会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戎, 2008,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第41-46页。
- 苗普生、马品彦、厉声, 2006, 《历史上的新疆》,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莫里斯·哈布瓦赫, 2002, 《论集体记忆》,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诺曼·K·邓金, 2008,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1986, 《关于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几个问题》(内部资料), 全国政协文史办印。
- 萨林斯, 2003, 《历史之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赛福鼎·艾则孜, 1993, 《赛福鼎回忆录》,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宋希濂, 1979,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台北: 李敖出版社。
- 孙隆基, 2004,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田卫疆、周龙勤, 2009, 《民国时期的新疆》,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王珂, 2001, 《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明柯, 2006a,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明柯, 2006b,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台北: 允晨文化公司。
- 王明柯, 2008, 《游牧者的抉择: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1994,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1998, 《新疆三区革命史》,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58, 《哈萨克族简史》,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0, 《新疆简史》,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杨策, 2007, 《近代新疆史事述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杨建新、马曼丽, 1990, 《西北民族关系史》,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尤尔根·科卡, 2006, 《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 上海: 《海外中国学评论》, 第21-32页。



- 页。
- 袁德金、刘振平，2003，《西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张大军，1980，《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
- 张君超，1995，《民国时期新疆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张宪文，2005，《中华民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北京：中华书局。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钟民和，2009，《一个真实的新疆》，北京：人民出版社。
- Benson, Linda and Svanberg, 1998, *Ingvar. China's Last Nomad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Kazaks*. London: M.E. Sharpe.
- Benson, Linda. 1990,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London: M.E. Sharpe.
- JING Jun, 1996,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David D., 1999, *Clouds over Tianshan: essays on social disturbance in Xinjiang in the 1940s*, Copenhagen: NIAS.

文史资料类：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1. 艾买提·瓦吉地，《第一次安抚乌斯满部的经过》。
2. 陈希明，《新疆起义二三事》。
3. 杜学增，《新疆和平起义前后的几点见闻》
4. 拉提甫，《我所知道的乌斯满》。
5. 李唐民，《回忆新疆和平起义》。
6. 吕 器，《乌斯满和北塔山事件》。

《阿勒泰文史资料选辑》：

1. 阿克兰别克·贾帕拜，《三区革命记事》。
2. 阿斯哈提·满凯，《阿山“革命临时政府”的建立及其它》。
3. 白特克·都依色拜，《解放前阿勒泰市大事记》。
4. 比达合买提·木海，《俄国白军给阿勒泰带来的灾难》。
5. 杜根成，《献身民族解放运动的光荣战士》。
6. 阔兵·阿斯哈尔，《爱国人士哈那皮亚贝子和布哈提贝子》。
7. 阔兵·阿斯哈尔，《沙里福汗·阔格岱也夫》。
8. 斯灭开·胡夏巴耶夫，《乌斯满土匪第一次被逐出阿勒泰纪实》。

《伊犁文史资料选辑》：

1.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在阿勒泰庆祝‘11.12’解放革命胜利4周年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2.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达列力汗给乌斯满的一封信》。
3. 哈吉也夫，《三区革命中塔城的地下活动与武装斗争》。
4. 哈再孜·阿合提，《1940年富蕴暴动经过》。
5. 莎·吾列习，《回忆爷爷达里力汗二三事》。

